人文家国 历久弥新



人文历史

NATIONAL HUMANITY HISTORY

2014/04/15/第8期/4月下 人民日报社 主管主办

迁都的抉择

葛剑雄：北京是天然的首都

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共衰

两京制的成本与风险

王明：红色政坛的黑色流星

公投独立的外蒙古样本

不忘本的马来西亚华人

"高干社区"南锣鼓巷

纳粹乌克兰VS红色乌克兰

钱理群：出书本身是一种赎罪





ISSN 2095-5189

RMB 15.00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封面文章

- 20世纪以来迁都国家示意图
- 巴西利亚岂能偏安？
- 直隶总督署见证“半部清史”保定：来来回回的河北省会
- 分属父子俩的南京北京两京制的成本与风险
- 葛剑雄：北京是天然的首都
- 心未动，身已远世宗：逃离炮口下的首尔

段子

- 段子

编读

- 编读

书情

- 书情

题库

- 题库

外刊

- 外刊

读书

- 读书

话题

- 苏联一手操纵全票赞成公投独立的外蒙古样本
- 镀金时代的扒粪运动揭露黑幕推动美国走向进步
-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占16人　抗战捐款占华人赈捐2/3不忘本的马来西亚华人

旅行

- 金色大厅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 南锣鼓巷曾经的“高干社区”

美丽城镇

- 吴中木渎乾隆六下江南必游之地

年历

- 年历

人物

- 科特·柯本逝世二十周年“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 《我的家庭回忆录》拒绝遗忘和回避钱理群：出书本身是一种赎罪
- 朱德群游走中西的艺术“剑客”

尚武

- 一个民族两个阵营纳粹乌克兰VS红色乌克兰

视听

- 反乌托邦电影播撒自由的种子

图志

- 中法建交50年

唯物

- 一年就为这几天探访2014欧洲艺术与古董博览会
- 毕加索版画展，你看懂了吗？
- 江西古代文物精品展赣水流韵 辉耀千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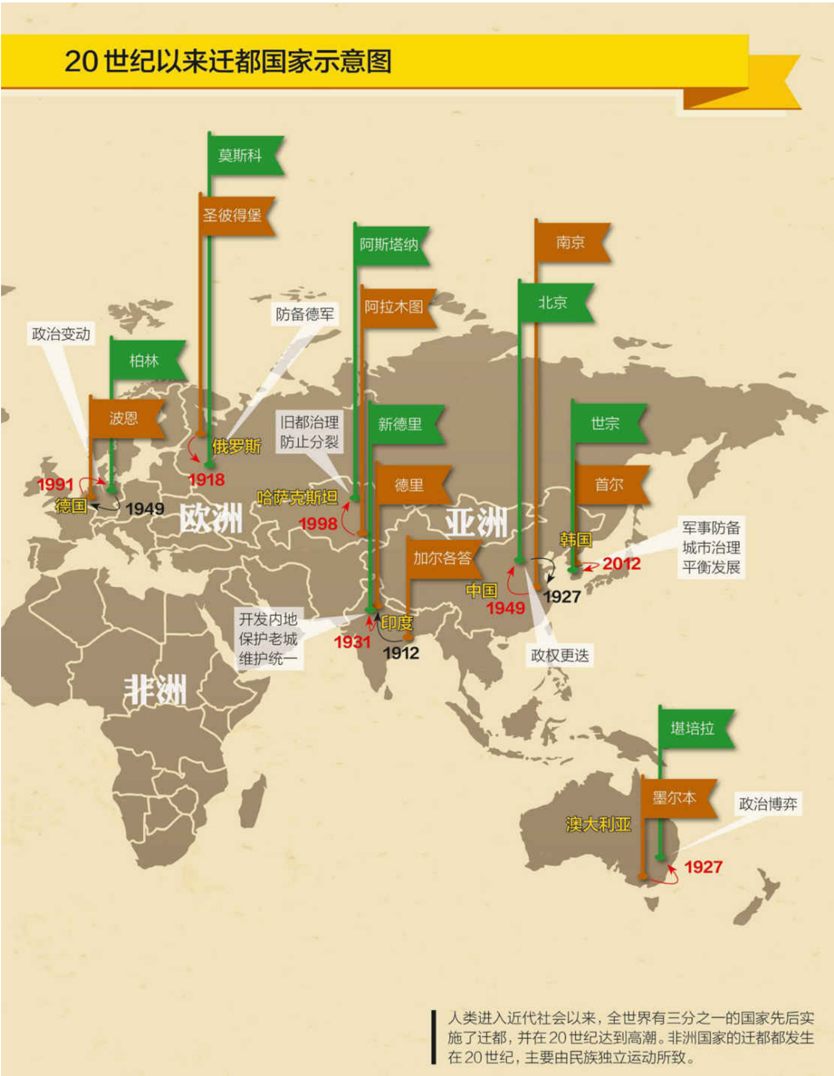
专栏

- 乌合之众何以可能
- 合作时代
- 政改主将袁世凯

专题

-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纪实（下）
- 红色政坛的黑色流星《王明年谱》寻找失意者的历史

20世纪以来迁都国家示意图



国家	年份	迁都
亚洲		
土耳其	1923	伊斯坦布尔 → 安卡拉
巴基斯坦	1959 1967	卡拉奇 → 拉瓦尔品第 拉瓦尔品第 → 伊斯兰堡
不丹	1961	普那卡宗 → 廷布
缅甸	2005	仰光 → 内比都
菲律宾	1976	奎松城 → 马尼拉
印度尼西亚	1945 1949	雅加达 → 日惹 日惹 → 雅加达
美洲		
伯利兹	1972	伯利兹城 → 贝尔莫潘
欧洲		
立陶宛	1940	考纳斯 → 维尔纽斯
阿尔巴尼亚	1920	都拉斯 → 地拉那
非洲		
摩洛哥	1912	非斯 → 拉巴特
毛里塔尼亚	1957	圣路易 → 努瓦克肖特
塞内加尔	1958	圣路易 → 达喀尔
马里	1908	卡伊 → 巴马科
尼日尔	1903 1911 1926	金德尔 → 尼亚美 尼亚美 → 金德尔 金德尔 → 尼亚美
尼日利亚	1991	拉各斯 → 阿布贾
几内亚比绍	1941	博拉马 → 比绍
喀麦隆	1909	布埃亚 → 雅温得
乌干达	1964	恩德培 → 坎帕拉
科特迪瓦	1934 1983	大巴萨姆 → 阿比让 阿比让 → 亚穆苏克罗
刚果（布）	1958	黑角 → 布拉柴维尔
斯威士兰	1902	曼齐尼 → 姆巴巴内
赞比亚	1935	马兰巴 → 卢萨卡
马拉维	1975	松巴 → 利隆圭
肯尼亚	1907	蒙巴萨 → 内罗毕
科摩罗	1975	藻德济 → 莫罗尼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先后实施了迁都，并在20世纪达到高潮。非洲国家的迁都都发生在20世纪，主要由民族独立运动所致。

巴西利亚岂能偏安？

作 者:蒋波

“那是最美好的年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那是个睿智的岁月，那是个蒙昧的岁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心四起的时期；那是希望的阳春，那是绝望的穷冬……”

——《双城记》

上帝的名城

一直以来，巴西人相信，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然后在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里约，这座夹在“两山一滩”之间的城市，虽偏处一隅，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巴西的国家中心。

“Rio de Janeiro ！”感谢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这位葡萄牙的航海家在1502年1月20日航行到瓜纳巴拉湾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奋力高呼“一月的河口”，里约热内卢由此得名。

在大航海时代，里约热内卢一直是欧洲人进行海外贸易的优良港口。当麦哲伦的船队小心翼翼地来到此地补给时，发现法国的商船早已把这里当作走私木材的大本营了。早在1555年，法国海军军官尼古拉·迪朗·德维盖尼翁带领载有600人的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入瓜纳巴拉湾，在巴西建起了第一个欧洲人的永久居住地。与后来在北美建起的魁北克城一样，这个当时被称为“France Antarctique”的城市，主要由在法国国内遭受迫害的雨格诺派徒与瑞士加尔文教徒组成。

1565年3月1日，腥风肆起，葡萄牙人为了争夺里约热内卢，同法国人殊死拼杀。两年后，葡军胜出，成功占领此城。在随后的三百多年里，巴西境内丰富的黄金和钻石资源让里约一跃成为南美最繁忙

的港口，满载财宝的帆船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航向欧洲及世界各地。里约热内卢的城市地位日益凸显，最终葡萄牙于1763年将殖民地的行政权力中心移到此处。当拿破仑大军在欧洲大陆东征西战时，葡萄牙王室甚至一度将首都迁移到这里，里约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在欧洲以外地区设立的首都。

正是基于种种区位和传统的考量，佩德罗一世在1822年宣布巴西独立时，也顺理成章地将里约热内卢定为国都。

首都的重担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里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在这片面积不到巴西总面积1%的区域内，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都高度集中在此。经济的腾飞让里约的魅力日显，好莱坞的影星和全世界的名流们纷纷来此，赌场、舞厅和夜店内灯火霓裳、夜夜笙歌。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来里约，因为这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将让他来里约，因为这里是地狱。”一片轻歌曼舞，却难成里约热内卢的“遮羞布”。如同全世界所有的大都市一样，里约也换上了严重的“城市病”。

“法维拉”（favela，即葡萄牙语“贫民窟”）渐渐地在里约的海滩上肆意蔓延，正如巴西著名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莱雷在《华屋与茅棚》和《富人与陋室》中的论述，经济上的分化，已造成了巴西社会的对立。196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两个巴西”的言论持续走热——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一个是灯红酒绿、四通八达、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里约，一个是茅檐低小、道路泥泞、缺衣少食、破败不堪的里约——贫穷、暴力和毒品交易事件在后者频发。

环境问题，也如溃烂的痈疽一般，在里约的海湾持续扩散。1950

年代，里约人口数量已达250万；30年后，里约的人口猛增至1350万。庞大的人口数字让瓜纳巴拉湾的生态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给住房、就业、医疗、交通等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里约热内卢，这个六旬的老翁，早已不似昔日的壮汉，无法肩负首都的重担和压力。

1956年巴西大选，颇负声望的社民党总书记儒塞利诺·库比契克获胜。新总统上任伊始，就宣誓自己“五年要办五十年的事”。为此，政府加大了全国各地区的开发和规划组织的力度，里约的城市规模被严格控制。但雄心勃勃的库比契克总统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动一个大手笔——迁都！

巴西的奇迹

除了宋高宗赵构外，没有任何人会乐于偏安东南。将首都放置在大西洋的海岸线上，早已让巴西人惶恐不已，为此，巴西人将迁都的决心写进了宪法。但是，往哪里迁，却一度让巴西人彷徨无措。

好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巴西人将目光从海洋收回、转向内陆时，广阔的中西部草原和亚马孙平原成了他们眼中的娇子。这里物产丰富、地势开阔，可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雨量不均，自然环境造成了中部地区的先天落后，历史上又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开发，与东南的繁盛形成了强烈反差。首都理应迁此，库比契克的想法很长远——迁都后，巴西以新首都为基础，可以探索出一条在稀疏草原上发展科技的新道路，进而改变国内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新首都营建工程就此拉开，为了确保新首都日后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政府要求城址的选择必须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靠科学的方法确定；气候、水源、地形、土质、能源、交通、风景资源等等都要成为考量的因素。于是，科技工作们忙碌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巴西广大的内陆地区，空中摄影、实地考察、测定数据、比照条件，最终的五个地点脱颖而出。多学科专家组就此展开大规模的论证，选定了戈亚斯州

高原的巴西利亚作为新首都地址。

面对这块崭新的“风水宝地”，设计师西奥·科斯塔挥毫泼墨，用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思维，为巴西利亚设计出“飞鸟”形的城市规划方案。从高空俯视，整个巴西利亚的形态由垂直交叉的两条轴线组成，如同一只展翅朝向西南的大鸟。

巴西利亚主轴线长6公里，宽350米，主要做行政用途；商业区与住宅区以教堂和学校为中心分布在四个扇形区里，沿着20公里长的横轴线，也就是鸟翼拓展。两条轴线的交叉点宽度是其他地方的两倍以确保高效的交通管理；在“鸟首”处，是由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构驻地组成的三权广场，也是巴西总统府、联邦最高法院和议会所在地；后部是运动区、文化区及汽车站和仪器加工、汽车修配等工业区。科斯塔的隐喻很明显，他希望巴西利亚像自由的鸟儿一样，展翅高飞。果不其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巴西奇迹”。

另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在巴西利亚践行他的“自由形式的现代主义”风格，为这座城市设计出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议会大厦和参众两院办公楼——形象地说，像“一双筷子和两个对扣着的碗”——议会大厦由两座240米高、并排而立的大楼组成，中间有通道相连；至于“碗口朝上”的联邦众议院办公楼，有人说是象征“民主”，倒扣其上的参议院，象征“集中”。尼迈耶的另一代表作是巴西利亚大教堂，教堂使用16根抛物线形状的混凝土支柱来承重，仿佛印第安酋长冠上成束的羽毛，视觉冲击力直指人心。

经过三年零七个月的工期，1960年4月21日，在一片红土荒原上，拥有八座卫星城、占地5800多平方公里、人口120万的新首都巴西利亚拔地而起——这是巴西人，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城市。20多年后，这座充满现代理念的城市，以及被包含其中的构思新颖的建筑和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橄榄枝，成为最年

轻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数十年来，因为巴西利亚，巴西国内巨大的区域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这座漂亮的城市贯通南北，并把繁荣带到了中西部，仅巴西利亚至贝伦的公路开通以后，沿线人口数即由10万猛增至200万。巴西政府从1940年就倡导的“西进”运动，直到巴西利亚兴起后才真正发生效应。

原首都里约热内卢并没有成为一蹶不振的“明日黄花”，相反，她的“文化之都”的功能和形象反而得以加强。如今，作为巴西的三大中心城市，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分别承担起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职能，各司其职、各具特色。

乌托邦的噩梦

巴西人最终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20世纪最大的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巴西利亚的营建屡屡被人指责。在新首都的建造过程中，媒体铺天盖地的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反对党也批评这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至于建造新首都到底花了多少钱，巴西政府从未公布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1956年开工，到1960年落成，在42个月的建造过程中，巴西的货币贬值了三倍！

1960年新首都刚刚落成时，连很多政府部门都对这片“不毛之地”充满抵触，他们怀念散布在里约热内卢街道上的杂货店和咖啡馆，路边摊上的甜美椰子，海滩上的足球男孩和桑巴舞女，南大西洋的阳光和海风，以及在这过程中的日常交往仪式；而在巴西利亚，这些全是奢望。

城市规划方案也并非完美无缺——“一个乌托邦式的噩梦”——澳大利亚的著名建筑评论家罗伯特·休斯毫不掩饰他对巴西利亚的憎恶。在这个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中，清晰整洁、简单有序的功能分区，让巴西利亚数百个格局完全一致的“超级小区”，如同托马斯·莫尔在《乌

托邦》里面虚构的54个与世隔绝的城镇，那是一个没有差异、没有贫富、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然而，斯科特试图通过改变城市空间来改变社会结构的伟大理想并没有实现，贫富分化问题在现实中的“乌托邦”依然存在，甚至在巴西利亚竣工前，贫民区和富人区就已经自发形成了。

这种极端的、绝对的功能分区也让巴西利亚产生了内部的分离：这是一个没有市中心的城市，某一类功能的建筑和另一类功能的建筑往往相距很远，建筑间的巨大空隙使得行人极易迷失自我。在这里，没有街道和行人，只有公路，以及不得不驱车穿梭于城市的各个区间和冰冷建筑间的市民。

直隶总督署见证“半部清史”保定：来来回回的河北省会

作 者:黄金生



/ 1875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

京

津冀一体化的区域规划被坊间称为“一号工程”，在此背景下，保定将成为“政治副中心”的说法开始流传，不久之后消息就被“辟谣”。3月26日，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其中对保定的定位是：“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对此，看好保定者认为，在地理位置上，保定和北京、天津构成了等边三角形，京津保构成了所谓的“金三角”。保定同时又是石家庄和北京的中心点和整个河北的中心点，所以对河北的经济拉动作用更大。也有论者认为保定的基础服务配套不够，尤其是对外交通。在河北众多城市中，保定相对的政治地位一直在下降。不过，有一点双方都承认，保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厚，其地位也确曾显赫一时。

拱卫京畿七百载

说起历史，保定没有理由不骄傲。据说当年在评审历史名城时，河北报来了邯郸、宣化、山海关 ， 保定是后来补送的， 结果经过多次评审，得到众多专家一致通过的只有保定。

保定是传说中的尧帝故乡，春秋、战国时期燕、中山都在境内建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明弘治版《保定郡志》记载，燕昭王曾于今保定城东五里建广养城，俗称空城，为放牧战马之城，保定始有“燕南赵北”之称。可见，保定最初出现城镇，就是为保卫燕国安全所建立的。

保定西依太行山脉，东为冀中平原，北控三关，南通九省，素有“天下通衢”、“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宋辽之际，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北宋建立后，太祖太宗一直把收复幽燕作为其战略目标，对河北军事防御

十分重视。北宋政府在当时的清苑县置“保塞军”，意为保卫边塞。公元981年，升为保州，寓意永保安定。由此保州与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市）形成一道由西南向东北的军事防线。宋朝常在此屯兵驻军，把保州作为北部边防要塞，著名将领呼延赞、杨嗣等都曾驻保州。

金元定都北京，保定提升为顺天节度使，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自此，保定“拱卫京畿七百载，掌控省府二百年”，号称“都南屏翰，冀北干城”。1275年元朝改保州为保定路，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这就是“保定”之名的由来。

保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担负起了拱卫京畿的重任，由此也形成了这座军事重镇尚武的性格。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两位保定人田光和高渐离就谱写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绝唱。处士田光，荆轲刺秦的谋划者，在举荐荆轲之后，在燕太子丹面前自刎赴义；而侠士高渐离则比荆轲更执着悲壮，他在被秦王熏瞎双眼后，用生命中的最后一掷完成了义士形象的永久定格。其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就发生在保定下属的涿州。

到了宋朝，经过“陈桥兵变”完成黄袍加身的赵匡胤为防历史重演，在全国大力营造“重文轻武”的氛围，但保定却成为“武术特区”。辽军直接入侵中原的线路是今易县——遂城——满城——望都一线，保定是辽军入侵的门户，但抵御二十万辽军扼守咽喉要路的杨六郎只有三千兵马。为此，他在保定大力倡导全民习武、全民皆兵，一地有战、各方来援，并积极鼓励各村成立武术结社。慑于杨六郎的军事谋略和保定军民之彪悍顽强，屡遭重创的辽军南下宁可绕行数百里，也不敢犯保定界。

这座城市尚武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保定习武的人多，出了很多武术大家，其中不乏一等一的摔跤高手。据说保定人摔跤爱勾别人的腿，而且这招很厉害，所以就有了“勾腿子”的说法。明清时期，北京

的王府多，各个王府多用保定人看家护院。王公大臣互相间若有什么矛盾，两家的家丁一见面，都是保定人，甚至是同门师兄弟，矛盾也容易化解。所以就像师爷多用绍兴人一样，保镖多是保定人。照老百姓的看法，给老爷做事、服务的人，就被称为“狗腿子”，所以“勾腿子”也就演变成了“狗腿子”，这样就有了民间所传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之说。

“半部清史”

1386年，明朝改保定路为保定府。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后，设保定巡抚署，崇祯十一年（1638年）设保定总督，同时置保定总监军。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雍正二年（1724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自此保定成为直隶省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直隶，因其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清代直隶辖区广阔，囊括河北、北京、天津，加上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直隶总督权重位显，集军事、行政、盐业、河道及近代的北洋大臣于一身，其权力已大大超过直隶省范围。更因直隶地处京畿，亦成为清代省府第一衙。

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直隶总督署，建于清雍正七年，至清宣统止，历经清朝八位皇帝。历任总督多为朝中重臣，如修建莲池书院的李卫，一代廉吏唐执玉，有兴农治水被列为“乾隆五督臣”之一的方观承，更有清末名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其中李鸿章在此任职时间最长，达25年之久，他和直隶总督署一同达到了权力的极盛时期。这些清史中的风云人物，在直隶总督任上书写甚至左右着大清历史的走向。

说起保定在历史上的地位，除总督衙署外，不能不提的还有莲池书院和保定军校，这就是保定文化的“三宝”——“一文、一武、一衙

署”。

莲池书院因莲花池得名，古莲池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为元代汝南王张柔所建。莲池书院，又称“直隶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奉旨创办，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高学府。直到1903年停办，莲池书院先后存在长达170年之久。乾隆皇帝曾三次“幸临”书院并赐匾题诗勉励师生。莲池书院学者名流荟萃，清末状元刘春霖、清史馆总纂王树楠以及民国风云人物冯国璋等均曾在此就读。毛泽东曾莅临莲池，他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

1900年10月，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侵入保定，纵兵抢劫3天，造价千百万两白银的莲池古园，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亭、台、楼、阁化为灰烬，一片断壁残垣。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又将莲池修复为慈禧的行宫御苑。1908年，直隶提学使卢靖，重新把莲池建成治学之所，成立了最早的图书馆。建国后，屡经修缮，莲池才恢复了妩媚绚丽的风光。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保定创办了北洋陆军将弁学堂，1906年建保定陆军军官学堂，1909年更名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陆军预备大学堂迁到北京，袁世凯在保定始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俗称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

保定军校在历史上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那座见证半部清史的直隶总督衙署，形成民国军事史上与“黄埔系”齐名的“保定系”。军校于1923年停办，前后共有9期近7000名毕业生，其中成为将军的就有1000多名，被誉为“将军的摇篮”。从保定军校（包括其前身）走出的名人有：熊秉琦、靳云鹏、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王承斌、蒋介石、张群、李济深、陈调元、叶挺、董振堂、邓演达、熊式辉、黄绍竑、张治中、傅作义、唐生智、郝梦龄、秦德纯、顾祝同、陈诚、白崇

禧、钱大钧、刘峙、薛岳、蔡廷锴、蒋光鼐……

民国建立后，沿清代直隶省建制。1913年直隶省会迁到天津，撤保定府。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降格为河北省会，河北省府官员迁至北京办公。但两年后又迁回天津。1935年6月6日，国民政府又屈于日本的压力，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此后日本在天津成立伪河北公署。1937年9月24日，日军侵占保定。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由天津迁保定，使之成为河北省日伪军政首脑机关驻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由北平迁保定，1947年10月迁回北平。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12月6日成立保定市人民政府。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市宣告成立，保定成为河北省省会。

保定、石家庄、天津，省会选哪个？

保定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却阻止不了近代以来其地位的不断下降。

1840年以前，保定一直担负着拱卫京师的政治角色，鸦片战争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1870年11月，清廷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归属直隶总督”，同时谕令“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行馆，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这样，清廷明确规定了直隶总督由保定、天津轮住制。直隶双省会制是全国首例，也是特例。

以后，随着海防洋务日益重要，天津逐渐成为直隶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其重要性超过保定，到清末，直隶总督基本将行在转移到了天津，同时随着铁路的修建，石家庄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也迅速崛起。保定日渐失去其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随之带来的是城市发展的滞缓，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种状况直到1935

年国民政府将河北省政府迁到保定才稍有改变。

1949年建国初，天津成为直辖市，政府虽将保定作为河北的省会，但不久，省高层就将注意力转向石家庄。

石家庄是铁路枢纽，交通便利。1948年5月9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其政治中心地位初显。1954年1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请示中提出：河北省自建省以来，省会就设于保定市，该市虽经几年来的恢复与发展，但由于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将来也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而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有计划建设时期，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向城市特别是转向工业城市。省会设于保定，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我省的石家庄市，地处平汉、正太两铁路干线的交点，工业比较发达，也将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之一，且为军事要地，在国家建设发展中，该市势必成为全省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领导工业，推动全省建设工作，特呈请将省会迁往石家庄市。请示上报后，经华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同意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但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1955年8月，省委多次研究决定：为贯彻中央“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集中一切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省会暂缓迁建。

1958年2月6日，国务院决议将天津改为省辖市，归河北省领导。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河北省委认为河北“仅依靠中央调拨和我省现有工业，不能解决生产大跃进的需要，有天津这样一个大工业城市作为依托大有好处，1956年春合作化后，没有省级大城市的依靠是很困难的；农业跃进，工业也要跃进，合并一处，工农业可以更好地同时并举”。遂决定将省会迁往天津。这样，河北省省会又由保定迁往天津。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鉴于此， 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迁出天津迁回保定。因为天津市地处沿海，

是国防一线，一旦打起仗来， 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省会迁回保定， 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尽快把粮食生产搞上去， 以便于执行“备荒”的方针。

1966年5月，河北省委、省人委和省直机关及河北大学等单位陆续搬回保定。当时制定的搬迁原则是：大分散，小集中，省委的几个部，省人委的几个委、办，省军区搬回保定市，部分厅局搬到保定周围各县，其余部分搬到所属基层事业单位。省委、省人委在保定，省直各单位分散于保定周边20多个县，其中省教育厅在定兴县，省交通厅在安新县，省卫生厅在高碑店，省商业厅、省供销社在定县，省水利厅在安国县，省粮食厅在徐水县，省直属机关工委在任丘县，甚至有的远在张家口和邯郸。1967年1月，中央决定天津市又改回直辖市。

一场“文革”，保定失去省会地位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掀起文化大革命。

保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迅速成为“文革”中的重灾区。1966年12月25日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被部分造反派在保定戏校批斗。1967年1月21日，保定部分县及市郊区数万农民进城，与戏校、保师等单位红卫兵组织发生冲突，22日上午，在体育场召开两万多人的批斗大会。省、地、市领导人被指控为“1.21”农民进城事件的后台而被揪斗，在体育场强行揪斗省委书记刘子厚等领导干部，然后游街示众。1月23日，在保红卫兵和保定各造反群众组织纷纷夺权，使省、地、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陷于瘫痪，一夜之间，造反派夺了省地市各级党政大权，这就是“1.23”夺权事件。

之后，保定连绵不绝的武斗开始，社会秩序大乱。反观此时的石家庄却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一直稳中有增，为支援京津做出了贡献。在各省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 1968年1月28日，北京军

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石家庄。

因为有的领导依然考虑省会还是设在保定为好，因此省会的位置并未一锤定音。1970年9月29日，毛泽东路过石家庄，找省革委主任李雪峰谈话间问河北省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李雪峰出于战备考虑，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被揭露后，同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华北会议进行批陈整风。李雪峰因“陈伯达案”被撤职并被江青在会上点名，说李雪峰把河北省省会从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子厚出于这种情况，向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好。但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总理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至此，河北省省会才一锤定音，一直留在石家庄至今。

分属父子俩的南京北京两京制的成本与风险

作 者:十年砍柴



/《皇都积胜图》局部，纵32厘米、横2182.6厘米，描绘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况，被誉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局部，图卷末署有明人仇英制，描绘南京市井三月的生活场景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距崇祯煤山自缢已经16个春秋了。

尽管南明永历帝的流亡政权还存在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但大多数士民相信：大明朝是真的亡了。

这年秋天，大儒顾炎武在江宁（南京）城，写下了一首风格凄凉的诗《重谒孝陵》：

旧识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

春谒长陵秋孝陵。

明亡后，以遗民自居的亭林先生数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郊外的陵寝孝陵。这一年他更不同寻常，春天在北京城北郊的昌平拜谒埋葬明成祖的长陵，秋天又赶到南京孝陵来谒太祖。

孝陵和长陵，对南京和北京而言，极具象征意味。这两座大明的都城，可以说分别是属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都城。

北京：高度“胡化”的土地

不知道顾炎武在孝陵前，会不会回忆起春天在北京城看到的人与事。皇都尚在，衣冠已非，紫禁城里住着的已经是来自关外的满人爱新觉罗氏。而江宁府城南京，虽然仍是东南膏腴之地的中心城池，但已非前明时的留都地位。它与北京不再是分据南北要津的两大都城，在政治地位上，和其他的名城如杭州、苏州、成都一样，必须仰视北京。

满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族而入主中原。对中华的士民来说，满清皇帝是征服者，满清朝廷是外来政权。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和蒙古人一样，他

们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一视同仁皆是其新占的地盘，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而明朝则不一样，这是赵宋灭亡后近一百年，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江南，才是他们的根本重地，是朱明王朝的发祥地。而且，当明朝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收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四百余年。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明朝的“两京制”，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其直接的原因乃是朱明王室的一场内讧——燕王朱棣取代了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

定都问题是朱元璋的心病

在元末群雄并起时，朱元璋从自己的老家淮河流域一带经营，一点点向南扩充，取应天（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南京附近的州县是其取得天下的根据地。他建都南京后，扎稳基本盘，进而挥师北上是明智的选择。

南京对朱元璋而言，在削平南方群雄后建立政权的初期是最合适的政治中心。一旦北伐成功，将蒙元皇帝逐到漠北，从西北嘉峪关一带，到关东白山黑水之地，都属于大明朝时，处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城便不是合适的都城。

从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朱温灭唐前，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

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据点。汉族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朱元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要维持一个疆土远超宋朝、不亚于汉唐的大帝国，南京并不是合适的首都。在位三十一年内，定都问题几乎成了朱元璋一块心病。历鉴前朝，凡定都金陵者，多是偏安，且国祚不久，朱元璋很忌讳这点。南京距离北部边疆千里之遥，天高地远，鞭长莫及，难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且南京附近的吴越之地比外省太过富饶，反而容易使皇帝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视边患为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明朝军队刚刚从元朝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明朝开国功勋集团来说，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然而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很不适宜。

朱元璋甚至想把首都迁到故乡濠州钟离——明朝建立后，皇帝故乡作为龙行之地升格为凤阳府，将凤阳定为中都，派官员督民工在此进行多年营造宫殿，把老家建设得富丽堂皇。但营建凤阳府不过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实现一种“富贵还乡”的人生理想而已，和外地发财的

人回老家买地、建豪宅一样，精神层面的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定都南京，对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来说，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终其一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南京：朝廷的备份

朱元璋死后，被葬在南京郊外的孝陵。从登基到驾崩，南京城深深地打下朱元璋个人的烙印。生前困扰他的定都难题，竟然在其死后，因为叔侄阋墙而得到解决。性格、才略酷似朱元璋的皇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就藩被改称北平的北京城。他和其他几个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兄弟代王（封藩于山西大同）、辽王（封藩于广宁州，今辽宁锦州境内）被朱元璋封在北部边塞重要的城池，就是为了弥补政治中心处在南方的缺憾，替朝廷来防守北疆。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发“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1421年，成祖迁都北京。

北京是朱棣的封藩地，他起兵“靖难”之前，已在此经营二十多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因此等他当皇帝后，北京及周边地区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迁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迁都到北京后第四年，成祖逝于北征蒙古部落的军旅之中。或许，因为得位不正，他羞愧于和父亲葬在一起，所以被葬在北京城以北的昌平，是为长陵，为明十三陵之首。

严格地说，直到明英宗的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此前，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而南京，则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因为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义上的政治地位重于唐代的事实上的“东京”洛阳。但实际的地位却不如唐代的洛阳，因为洛阳和长安相距不远，唐代一些皇帝（特别是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曾长期住在洛阳，洛阳成为实

际上的京师。而留都南京对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征意义。

留都南京，除皇帝不在此城外，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可谓是“朝廷的备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相同，主要管理南直隶（南京周边14个府、州，不设行省，直接由朝廷管理）的相应事务。虽然权力不如北京的官员，但也不能说是闲职。因为南直隶所辖的地区，乃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之区，天下赋税三成多出自于此。

明朝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南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使帝国的南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设想一下，如果明朝长期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南京，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持续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天子守国门”的悲壮

明朝的“两京制”当然也有不利之处。其一是形成“天子守国门”的状态，首都长期处在北部游牧民族武装力量的威胁之下，皇帝和众臣动辄就置身于抗击外敌的最前线。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亲征被蒙古瓦剌俘虏，其首领也先带兵突破长城，围困北京，朝野恐慌，有大臣提议迁都南京，于谦等人顶住了压力，反对迁都，立英宗弟弟郕王为监国（后即皇帝位），打败进犯的瓦剌部，解京师之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带兵突破古北口，包围了北京，明朝坚守京师数日，俺答大肆抢掠城郊后撤离，是为“庚戌之变”。后金崛起于东北建州后，其骑兵越过长城，骚扰京畿，直逼京师，屡有发生，如崇祯二年的广渠门之战。但“天子守国门”的另一面也让明朝君臣长期有一种忧患意识，对北部的威胁不敢稍有松懈。

“两京制”另一不利之处则是使统治成本剧增。明朝的经济是南重

北轻，北京周边的经济欠发达，朝廷通过漕运数千里从南方富庶地区运来粮食及其他物品供养京师。明朝前期，征运漕粮食的地区主要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其中大多处在南方。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一百万至二百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粳糯米。数千里漕运，损耗巨大，加重百姓的负担。但总体说来，为了维持一个帝国一统，保持南北平衡，这样的成本支出也是必要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又一支劲旅突破居庸关，包围了北京城。这次进犯的不是草原上的“蛮夷”骑兵，而是崛起于西北的李自成率领的造反军队。明朝君臣这次没有逃过劫难，崇祯以发覆面，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槐树上吊自杀。终明一代，自迁都北京后，历代皇帝代代相承，完成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之举。

吴三桂借满清八旗兵报君父之仇，引狼入室，满清人占领了北京城，成为紫禁城的新主。留都南京的一整套备份版朝廷，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众臣拥立福王称帝于南京，弘光朝仅仅支撑短短的一年，便亡于清兵的铁蹄下。从此，北京和南京两座美丽的城池留给了异族，分别长眠在南京孝陵和北京长陵之下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任由自己的臣民剃发易服，臣服于来自关外的异族。但这两位对南京、北京两城营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父子，连同为社稷江山殉难的崇祯帝，赢得了新朝统治者的尊重。满清统治者对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予以善待。

满清皇帝营建了思陵，礼葬崇祯帝，并设置司香内使（即守陵太监）管理十三陵。对南京城外的孝陵，也是如此。康熙南巡时，特到孝陵拜祭，并题写“治隆唐宋”的匾额，清朝后期国门大开后，来南京的洋人越来越多，有司还专门在孝陵前竖立用六国文字书写的石碑，

提醒洋人不要乱写乱画，尊重陵墓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

正因为如此，遗民顾炎武拜谒前朝帝王陵墓时，还能碰上守陵的“旧识中官”。

葛剑雄：北京是天然的首都

作 者:纪彭

迁都的抉择

现在迁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稍微考虑一下实际操作的那些细节，就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一部分首都功能从北京分离出去

把一部分功能分离出去

当媒体报道“保定被选为首都政治副中心”的消息时，保定概念股，甚至是河北概念股应声大涨。3月26日，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证明了“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北京这座身患大城市病的超大型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中央有意要为北京瘦身早已不是秘密，京津冀一体化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了重大国家战略。大家不禁要问，怎样的首都适合我们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或多个政治中心的时代吗？现代中国如何破解首都难题？

带着这些疑问，《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的葛剑雄教授。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 ）：隋唐时代，似乎有两个首都——长安与洛阳。皇帝经常半年待在东都洛阳。大运河修通之后，洛阳连接江淮，便于资源调配，而长安则资源不足，难以供养庞大的朝廷。请您谈谈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与大运河的联系？

葛剑雄（以下简称 ）：隋唐时代，长安与洛阳还谈不上经常性的

双中心。你刚才提到了运河，也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实际上，长安、洛阳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关东，到唐朝后期逐渐依赖江淮漕运，江淮就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从这个角度，运到洛阳的交通条件比较方便，而再从洛阳到长安，顺黄河而上，要经过天险，然后还要经过渭河，交通条件更加不利。所以从隋朝开始洛阳附近就有大量的仓库，把粮食藏在那里进行储存。每次碰到灾害，经常出现皇帝带领文武百官，从长安到洛阳来就食。这种是特殊情况，虽然具备双中心的特点，但不能成为真正的双中心。

这种双中心除了物资供应的原因之外，控制关东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长安过于偏西，对于全国的统治不利。武则天时代曾想迁都洛阳，洛阳为首都，长安为陪都。由于军事上考虑，这个计划落空了。洛阳是个“四战之地”，对于军事防御很不利，“安史之乱”时，洛阳很快就被攻破。军事因素在和平时期倒是不用过多考虑，况且今天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传统的地理约束，在飞机、导弹面前早已失去了意义。

：明朝有南北直隶，明成祖北迁，建立了今天北京的基础。与隋唐不同，明朝是南北双中心，您怎么看这样的制度安排？有什么道理？

：明朝的南北直隶被视为“双中心”其实是一种误解。朱元璋建都南京只是权宜之计，当时全国还没统一，北方还在元朝势力手中，不得已建都南京。当朱元璋把元朝势力驱赶到大漠之后，就已经意识到南京作为全国性的首都过于靠南，有偏安一方的弊端。他在位时就考虑迁都西安，经过研究之后，西安非常残破，已经不适合当首都。他又考察开封，发现开封原来的河道已经淤塞，水路运输断绝，物资根本过不去。最后，朱元璋还考虑建都老家凤阳，并修建了中都，规模比南京还大。可是凤阳的基础条件很不理想，平原地区，无险可守，又经济困难，最后这个计划也终止了。

等到朱棣夺得皇位之后，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军事上考虑，北元尚在，虎视眈眈。把首都放在战略前沿，有利于边防。同时，朱棣当藩王时封地就在北平，他自然是想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地盘。

朱棣得位不正，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就很刺耳。朱棣为了表示继承太祖遗志，不改祖制，虽然迁都北京，但是北京不敢叫首都，而是叫行在，也就是皇帝临时住的地方。真正的首都还在南京。甚至于到了明仁宗即位后，一度宣布要迁回南京。正因如此，明朝始终保留"两京"，"北京"是一般老百姓的说的，真正的称呼是"京师"。而南京一切照旧，南京皇宫保留着，还有各种机构。但南京的政府机构是礼仪性的、安置性的，级别很高，实权比不上北京。因此，明朝的南北两京仅仅是形式上的双中心。

：民国建立以来，似乎是继承了明清旧制，南京和北京成为首都的主要争夺者。您能谈谈南京和北京的优劣吗？

：孙中山建都南京，面临着和朱元璋一样的困境，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时大局未定，清廷尚在北京，武昌正被北洋军进攻，革命党人手中比较稳定的大城市就一个南京。南京离上海近，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就住在上海租界里。租界是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租界内有外国法律保护，不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南北的议和，就是在租界里秘密进行，甚至连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也是在上海写好送到北京修改。

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首都也带有临时性。等到民国建立，革命党人邀请袁世凯到南方就职，希望袁世凯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这样的要求有点不现实。即便袁世凯真心愿意，也不现实。首都是一个政治中心，有很多的配套机构，当时整个政府办事机构在北京、整个对外交往中心在北京，包括联系全国的电报、铁路网、金融系统也全在北京，显然南京不可能一下子具备首都的功能。因此，袁世凯把首都放在北京，还是比较合理的。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建都南京，情况与辛亥年间有些类似。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打到南京已经是不容易了。从全国来讲南京是偏安南方，而对于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而言，南京已经是势力所达的最北方了。从军事上讲，蒋介石始终没能真正地统一中国，南京已经是国民党军的战略前沿，北京基本就是后北洋时代地方军阀的天下。从政治上讲，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在上海，因此定都南京比北京要合适。从经济方面考虑，国民党最大的经济支持是江浙财团。从交通条件看，长江水路运输十分方便，津浦铁路贯穿南北，南京作为一个交通中心初具规模，何况蒋介石能控制的就是苏皖浙赣数省而已。南京的气候条件不佳，太热是个大问题。当初蒋介石邀请孙科来南京就职，孙科不肯，借口就是怕热。蒋介石特意造了一个房子，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房顶上每半小时自动更换一次冷水降温。这才把孙科大少爷请来。由于南京太热，为避暑，国民政府将庐山变成第二个政治中心，在庐山开会、发表谈话，这个习惯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庐山如同大清朝的承德避暑山庄，共和国的北戴河，有第二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

1949年，毛泽东选择北京，与朱元璋、孙中山、蒋介石有着共同的考量，也就是全国尚未统一。筹备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时，南京还在国民党手中。同时，北京从来不是国民党势力范围，这里原来的主人是北洋军阀、日本人、李宗仁、傅作义，从来就没有国民党的事儿。现在共产党来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够不着。为什么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点钟？为什么不选择早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从台湾起飞的轰炸机，由于航程限制，须借道仁川机场，且不能夜航，如果三点钟到达北京上空，返航很成问题。除了军事安全和政治稳定之外，定都北京的另一个考虑就是苏联援助比较方便。当时中国最大支撑是苏联，最有力的工业基地也在东北。

：近些年，北京城市越来越大，很早就有人谈迁都问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议论？您觉得如此庞大的北京，大城市病很严重，如何缓

解现在的压力？

：现在迁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稍微考虑一下实际操作的那些细节，就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不得已，不会迁都。有人建议“两会”不要在北京开，我觉得这不现实，我们只看见“两会”期间大量的人涌向北京，忽略了开会的大多数人，尤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就在北京，如果要到其他省份开“两会”， 一大批高官浩浩荡荡出北京，谈何容易？

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一部分首都功能从北京分离出去。比如，国家民委，主要管少数民族问题，这个部门何必放在北京呢？可以安排在新疆嘛！许多部委都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分离到北京之外的地方。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和钱都在中央手里，地方都来跑官、要钱。如果真的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那样，把行政权下放，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北京的臃肿自然就能得到缓解。

这就有了保定被谣传为“政治副中心”的事情，我想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曲解。实际上，我们早就提出过搞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从前没人注意到天津。当初，天津设为直辖市有点仓促，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这是什么道理呢？天津是袁世凯一手建立起来的，民国时地位很高，以后天津的地位一直在下降，到五六十年代天津成了省辖市。1967年1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初，把天津变为直辖市，这个决策有点怪。如果建第三个直辖市，广州、武汉、沈阳、西安都比天津合适，怎么会轮到天津呢？那时候决策也不经论证，中央一道命令就改，其实这是毛泽东对北京市委不放心，虽然打倒了彭真及其北京市委，但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就把天津升格为中央直辖市来牵制北京。

因此，天津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很尴尬，要彻底解决天津问题，现在比较合理的方案就是把北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联合，搞一体化发展。面对北京的种种问题，中央似乎是下了决心，要搞京津冀协调发

展。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有各种猜测，有各种利益的追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搞京津一体，河北就得不到多少利益，还要把京津之间的一些地方交出来，自然很不划算。所以，有些人有意也好，误读也罢，就搞出一些说法。

从平城到洛阳

鲜卑帝王的“中国”梦

文｜李夏恩

彼

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皇帝吟诵《黍离》时的惆怅感伤，甚至感动得自己也涕泪交流，没有人记录下他周围侍臣见到此情此景时的感受，但面对眼前场景，诚然让人不禁有古今之悲。

洛阳，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词语，对久已浸淫在史籍旧典中的人来说，吟诵它，就像吟诵一段诡奇的咒语，会在脑海中唤醒一种辉煌灿烂的光景，那是《东都赋》中“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汉世旧京，那是天子垂拱居中，“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的煌煌帝都。

此刻，这座城市还记得西晋灭亡时的惨烈情景，匈奴人的铁骑彻底终结了辉煌数百年之久的奢华幻梦，三万余人的血肉被践踏在匈奴战马铁蹄下，异族的弯刀饱饮了公卿高贵的血液，作为中华象征的晋

朝皇帝也沦为异族的阶下囚。从此，辉煌时代的象征被埋进了荆棘和荒草之中。

这一切，几乎就是《黍离》这首诗中哀戚叹惋的悲惨命运的再度上演——一千二百多年前，礼治天下的周王朝的都城镐京被异族犬戎攻破，王室被迫东迁洛邑，即后来的洛阳，一位自洛邑来到旧都镐京的无名臣子，在看到了黍稷满布旧日宫城后，哀伤地吟下了《黍离》这首诗，哀悼被异族攻陷的镐京，繁华不再。

千年之后，这首诗又被行经洛阳的另一位皇帝吟诵，来悼挽同样被异族攻陷毁坏的洛阳。不过，命运似乎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吟诵这首《黍离》的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身上流淌的并非汉族血液，而是一个被称为“鲜卑”的异族血脉。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鲜卑与毁灭洛阳的匈奴人乃是同宗近脉，而早年毁灭镐京，引发周室旧臣《黍离》之悲的犬戎大军，后来又被证明是匈奴人的祖先——征服者的后裔吟诵着被征服者的诗句，慨叹他的祖先肆掠后的悲凉景象——这着实是一个古怪的轮回。

对临幸洛阳，并吟下《黍离》诗句来表达自己无限神伤的北魏孝文帝而言，他显然并不认为毁灭洛阳的匈奴族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就在他吟诵完《黍离》这首诗的第二天，他还特意去洛阳汉魏时期的太学遗址行幸观览，这一点尤具特殊意义——太学里竖立着刻有汉朝钦定的儒家经典“十三经”的石碑。“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孔子的箴言不是明明白白地被刻在这些石碑上吗？

迁都·往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一直以来有一种浪漫化的叙述方式。493年10月25日那天，洛阳连日阴雨，在皇帝拓跋宏的号召下，从平城浩浩荡荡一路南下攻打南朝的军队，已经有些不耐烦，但孝文帝仍然“戎服执鞭，御马而出”，下诏六军出师。于是，最具戏剧化的一刻

出现了，群臣都跪倒在马前，请求停止南伐这样不靠谱的事情，而皇帝立刻摆出一副“大怒”的面孔，呵斥这些“儒生”，屡次猜疑他的“大计”，并且声言要斧钺伺候，令他们噤声。此时，他的两位重臣，也是他的亲戚，叔祖安定王拓跋休和族弟任城王拓跋澄一起“殷勤泣谏”——在某些文学化的描述中，皇帝的马蹄突然扬起，将拓跋休踢进了泥水里。两位皇亲重臣的哭谏终于使皇帝停下战马，但接下来，孝文帝突然对着群臣发表了一通面谕，大意是出师无功而返，面子上会很难堪，后人记载这件事也说不了好话，不如借机迁都洛阳好了。“王公等以为如何？”

一通“面谕”，就将南征变成了迁都，这也太戏剧性了。皇帝甚至慷慨地让刚刚跪地哭谏的群臣自由选择，“欲迁者左，不欲者右”。但是，他们必须在仓促之间做出决定，反悔的机会已经被剥夺了。除了皇帝的叔祖拓跋休等人站在右边表示不愿赞同以外，其他人都站在了左边，迁都就这样如同一场独幕戏一般完成了。

实际上，这个故事远没有如此简单，言辞举止中处处充满杀机，只消仔细回味孝文帝的面谕，便能感觉到那种出自帝王独断意志的不可违逆的威胁。皇帝在引称祖先迁移故事时，特意用了“违众南迁”这四个字，其意明白无误——先前的每一次迁都皆是违背众议的结果，但最终的结果却“享无穷之美”。至少从历史上来看，真理是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皇帝手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臣子，都是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的庸才。皇帝不过是将自己早已宿构的意志颁布下去而已，至于那场站左站右的自由选择，不过是一场忠诚测试。在短促的时间内，仔细地考虑迁都利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所要考虑的只有一点——是否要借此机会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忠诚。

向南·鲜卑

从北魏追尊的第一代始祖拓跋毛开始，就在不断地迁移，这自然是鲜卑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迁徙本性使然，只有首领，没有君主，

一个固定的都城自然也不重要。每一次大规模的南迁，确实都阻力重重，但迁移一直不绝，拓跋鲜卑的活动也越来越向南，最终与中原，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国”逼近。直到晋代，拓跋宏的先祖拓跋猗卢才在盛乐（今和林格尔）筑城定都，但这个所谓的都城并非人们概念中的都城，只能勉强称为一个据点，让他们在马上挥刀，射狼逐羊，以及南下劫掠后，可以归来有个享受猎物和战利品的地方。

当时确实也有一个“南都”——平城，但这个都城更多是为了邻近南方，作为一个与中国贸易场所，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修筑。直到拓跋猗卢两代之后，拓跋什翼犍时期，族人仍然“逐水草而已”。当拓跋什翼犍打算在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的时候，还被他的母亲平文太后以“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为由拒绝——首先想到的是敌人来了如何逃跑，这显然不是一个帝国应有的气度。

这一切应该改变。

改变，终于在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时代到来。在一连串的征战、阴谋、背叛和杀戮之后，386年2月，拓跋珪终于以武力压服各部首领，坐上了已经虚悬10年的代王宝座，接着又改称魏王，又过了12年，在击败了北方最后一个强劲的对手后燕之后，398年，拓跋珪决定称帝。在选择国号时，拓跋珪与群臣发生了争议，大多数王公都认为应当因循自传承已久的“代”为国号，它不仅仅是拓跋氏原先的封号，更有着代代相传的长久之意；但拓跋珪却否定了所有人的意见，坚持以“魏”为国号，寓意相当明显，他认为自己是承继曹魏的正统君主。同时，一个更为庞大的工程迅速展开，从那个不算是都城的都城盛乐，南迁至平城，这个扼守草原与中国之间的咽喉锁钥，将成为这个新兴的魏帝国的号令天下的都城，而它，将承载拓跋珪承继中国正统王朝的“中华君主”的梦想。

平城·梦想

所有的梦想成为现实，都需要艰辛的实践，打造帝国的新都城，同样耗费巨大。从406年7月开始，平城在荒芜中被创造出来，到孝文帝拓跋宏的时代，这里已经作为北魏六位君主的都城长达百年，历朝历代的北魏君主和他的子民都在这座都城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富、人力、时间还有几代人的生命，城外他们祖先坟茔丘墟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即使是孝文帝本人，在最开始时，也不能说他没有希望将这座城市作为自己梦想的试验场，打造成自己希望的与中华君主相配的模样。488年，他修建了宣文堂和经武殿，用以彰显儒家的文武之道。第二年，他在京师建立了祭祀孔子的庙宇，490年，他又修建了代表君主与上天相通的合法性象征——明堂，直到他决定迁都的一年前，他还修建了太极殿——仿效汉魏朝会宣扬君主威权的正殿，甚至在迁都的九个月前，他在太极殿宴飨百寮。平城已然是一座合格的帝王之都，但就在短短的九个月后，这位年轻的皇帝突然宣布将要放弃这座都城，迁都洛阳。在投入了如此多的心血和财富后，他突然离它而去，在此之后，拓跋宏只回来看过两次平城，这座曾经蕴含着中华君主的梦想的都城，就这样消失在魏帝国的历史深处，留下的只有那首在迁都四年后由宗室彭城王元勰所写的《悲平城》之中：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

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洛阳·暑热

“河洛暑热”与“阴山常晦雪”的平城相比，新的都城洛阳确实令习惯迎面吹来草原上的北风的游牧民族感到难受。拓跋恂就是这些不耐暑热的人之一，但他的特殊身份在于，他是孝文帝拓跋宏的太子，帝位的继承人。

对拓跋恂的父亲、孝文帝拓跋宏来说，迁都洛阳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就像《悲平城》里所说的那样，恶劣的天气，北方的苦寒，还

有难以承载的人口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翻开史籍，你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饥荒的记述。无论哪一项，都足以将这座城市带入悲惨的深渊。而且，在平城，这个鲜卑贵族耆旧聚居的都城里，昔日迁都平城时的新鲜风气，已经沉淀为一种固执的习惯，任何的改变，都会遭到阻扰。尽管它修建了如此多步追中国的宫殿，但这座都城本身的鲜卑积习却已然根深蒂固，难以改变。需要的，乃是一场革命。

尽管孝文帝强制性定下了迁都洛阳的计划，但却无法让众人心服口服。此时的孝文帝，本人留在洛阳，车驾一直不肯北还。甚至在洛阳城的兴建任务上马之前，孝文帝宁可住在洛阳一角，待在魏晋时期幽禁失宠妃嫔的金墉城里，也不愿回到平城的宫室。而对平城王公官僚宣布皇帝迁都旨意的任务，也落在了拓跋澄身上。

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平城已经成为了一锅沸水。与其说是孝文帝将都城迁出平城，倒不如说他是在躲避平城。他深知自己的猝然决定在那里引发的肯定不仅仅是“惊骇”，还有同样强烈的憎恨。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对他憎恨者的最重一击，居然就是他钦定的太子，拓跋恂。

洛阳的暑热，只是拓跋恂憎恨洛阳的一个方面，正史中的拓跋恂是一个典型忤逆不肖之子，对孝文帝所颁布的一切法令都加以憎恶。在迁都后，孝文帝迅速将他的一揽子革命性计划付诸实践，从改革官职，到禁绝鲜卑语言，到改易旧俗，甚至到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就连皇帝本人的拓跋氏也改成了元氏——孝文帝真诚地相信自己是黄帝的后裔，黄帝以土为德，而土为万物之元，这样，就将自己纳入到那些古代圣帝的伟大系谱当中了。而在他身后，抛下的是一座“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的平城，还有他出发南征时，留在平城的太子拓跋恂。拓跋恂在迁都时，年龄只有10岁，平城保守势力的主要人物拓跋丕，就将这个孩子视为他们恢复鲜卑旧俗的奇货。

冲突在迁都刚刚两年时爆发，元丕联合另一位保守派重臣陆叡，借孝文帝祖母的弟弟，太师冯熙在平城的死亡，表请孝文帝车驾还北临丧。这显然是一个阴谋——将孝文帝诱到北方，再临以刀兵胁迫，将迁都计划彻底摧毁。

孝文帝不希望因此与平城保守势力完全决裂，于是，拓跋恂就成为了自己的替代品。趁着孝文帝临幸嵩岳之时，这位年仅14岁的少年，杀死了被孝文帝视作迁都重臣的高道悦，轻骑奔往平城。这场冒险甚至没出宫门就画上了句号。“骇惋”，这个复杂的词语成了孝文帝听说此事的第一反应，他赶回洛阳，亲手杖责这位不肖逆子，打累了又让重臣拓跋禧接着打，“百余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余”。次日，拓跋恂被废。

这场家庭悲剧并没有震慑住保守派势力反叛，平城的保守势力陆叡、联合穆泰、元隆等人打算起兵造反，但这场叛乱就像拓跋恂的出奔一样，未果而终。这场未及发动的叛乱，反而成了孝文帝打击守旧势力的利器，留在北方没有迁往洛阳的王公勋旧几乎都被当做“同恶”牵连在内，大规模的清洗既残忍又冷酷，再没有人敢公开反对皇帝的意志了。至于拓跋恂，他被软禁在河阳，重兵把守，供给这位昔日太子的饮食，只能“粗免饥寒而已”。最终被父亲赐饮毒酒。

金色·死亡

根据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京师东西四十里，南北十五里”，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从规模上看，甚至超越南朝的都城建康。如果杨衒之不是刻意自我吹捧的话，那么其书中记载的南梁使臣陈庆之的赞叹，可以被当做这座魏帝国京城辉煌盛景的写照：“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这座宏伟都城的成立，终于成了北魏皇帝中华君主的梦想。

金色的辉煌，蕴含着死亡。如果仔细考察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就会发现，这座经常以辉煌壮丽形象示人的都城，其实是最不适合作为都城的地方。以形胜来讲，它不如长安拥戴山河，在大运河修建之前，交通运输也不能说绝对的方便，自周至汉的千百年间，已经耗尽了这座城市的地利。选择定都洛阳，意味着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供养这座都城的体面，这是一个倾全国之力的面子工程，而沉溺于其中的繁华，又会使人忘却远方的忧患，它更适合作为一个升平年代粉饰太平的副都，而不适合作为一个总领天下的首都，特别是一个外有南北强敌窥伺，内有忧患的帝国首都。

对远在北方的人来说，这种忧虑尤为明显，驻扎帝国北方的鲜卑部族军队，长期以来在边地苦寒之中，守卫着帝国的边陲，但现在，他们发现洛阳只顾着自己繁华，却忘了他们的存在。他们选择发动叛乱，用刀兵和献血来表现自己的存在。而此时的洛阳，也成为了一场权与血的华丽舞台。就像迁都洛阳城的孝文帝，一直受到文明太后的压制一样，孝明帝也受到其母把持朝政的灵太后的挟制，儿子想要制服母亲，但却被母亲毒杀，之后，灵太后居然将一个女孩儿拥上帝位，又很快声称自己看错了，将其废黜。叛乱的镇帅中，一个叫尔朱荣的契胡将领杀进洛阳，在处死了灵太后之后，血洗了这座华丽的帝国都城，尔朱荣用武力震慑着所有其他和他一样觊觎权力的人。但他不久又死在被他拥立的孝庄帝手里，三个月后，孝庄帝又被尔朱荣的从子尔朱兆仇杀。尔朱兆则被之后进入洛阳的高欢逼死，等等。而这一切，距离孝文帝迁都洛阳，不过40年。

死亡最终战胜了金色，洛阳又一次被抛弃。杨衒之笔下孕育着中华君主之梦的洛阳，乃是一场由回忆的残章断简拼成的旧梦。547年，在孝文帝迁都洛阳53年后，杨衒之从东魏的都城邺城前往洛阳，“城郭崩坏，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昔日都城，已经再一次沦为丘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诗句，又一次回响在他的耳畔。

长安与洛阳相互竞争

东西二都的并立与共衰

文｜押沙龙

长

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有一个安全的地形。

安全固然重要。但作为首都，还必须有战略上的考虑。长安并非是帝国的经济中心。虽说关中过去比较富庶，但其实远在汉朝，全国经济中心就已转移到河北河南一带。隋唐后更是往江南转移，总趋势是离长安越来越远。那么是否应该放弃长安，将首都转移到经济中心呢？那也不见得。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帝国，必须考虑全国的均衡，避免畸轻畸重。经济中心最好和政治中心错开，这样能让经济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这个道理就算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成立。如果中国现在将首都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北方连一个一线城市都没有，完全缺少辐射中心，整个国家的区域失调会更加严重。

此外还需要考虑敌人的位置。在汉唐时期，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其是西北。汉唐把首都定在长安，全国物资向西北大量涌入，确保了西北经济的繁荣，使汉唐不仅能抵御匈奴和突厥，还有余力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东汉放弃长安，间接导致西北经济凋零，带来羌族的动乱，更种下了董卓之乱的祸根。

但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外部威胁开始向东北方转移。契丹、女真、后金相继从东北崛起，西北方倒相对安全。中国的首都也由西向东神龙摆首，从长安变为北京，其间正呼应着这种变化。压力所向，正是首都之所向。因为首都之所向，也就是全国物资财富之所向，也是全国注意力之所向。

隋朝的都城选择

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并不在现在的西安，而位于它的西北方。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身上。关陇集团这个概念最早是陈寅恪提出的，现在还有细节上的争议，但大体已经得到史学界的公认。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既然是个荒淫无耻的人，建造新都城、修建大运河当然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荒淫无耻。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毕竟不是个神经病，不会不惜代价修一条打通全国的大运河，就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我觉得他所作所为的背后，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也才会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从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事实上关陇集团的力量一直还在，所以李渊起兵后马上急吼吼地直奔关中，争取这个集团的支持。也正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李唐王朝才能扑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统天下。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长安恢弘洛阳奢丽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从江南到洛阳一段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问题都不大。真正的问题出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所以危险还没暴露出来。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国并不缺粮食。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堆积如山，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好在粮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去。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

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随皇上逃荒去洛阳的扈从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饿死，沿途倒下了许多饿殍。

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这肯定说不过去。于是，洛阳城再度成为一个有诱惑力的选择。

说到这里，首先要对洛阳做个介绍。隋唐时期的洛阳论规模远远比不上长安。隋文帝的第二长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阳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阳城不够险要。它周围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临黄河，东临洛水，周围还有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等八个关口，也算是形胜之地。但黄河平原毕竟是个大平原，再怎么形胜也没法和关中相比。洛阳的防守难度要远远超过长安。

洛阳最大的优势，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职贡所均，水陆辐辏”。关于长安和洛阳，哪个更适合做首都，这是个很悠久的辩题了。总体来说，古代知识分子认为长安有山河之固，适合应付变乱；洛阳有中土之美，适合德化天下。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如果你担心变乱，最好还是定在关中比较安全。但是据说仁者无敌，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变乱，定都洛阳就比较好。唐朝的帝王弑兄杀弟、扒灰通奸之余，很聪明地拒绝把命运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他们选择了长安。

当然，这是古代的话语逻辑。按照现代人的动机分析，隋唐定都长安背后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需要依靠关中的军事力量。关中不仅有关陇集团，还遍布府兵，已高度军事化，将首都迁离关中危险很大。但是话说回来，长安在经济交通上的劣势又摆在那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帝王对首都定位都颇为犹豫。

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

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位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武则天这么做，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有人说她害死了皇后和萧妃，长安宫殿里闹鬼；有人说她喜欢洛阳的繁华富丽。从武则天害人杀人的劲头看，她神经强健得很，应该不会太怕鬼。洛阳的繁华倒可能是个因素。当时长安以恢弘取胜，洛阳以奢丽见长。从个人审美而言，武则天无疑更偏爱洛阳。但武则天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如此肤浅。她更深层的动机还是摆脱关中的影响，抹掉唐朝的痕迹，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国。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武则天一手策划了关陇集团的破灭。

陈寅恪在学术上眼界独到，气象宏大。但像这种开创架构的一代宗师，在细节上往往颇有可商榷之处。他对武则天和关陇集团的分析也是如此。不过洛阳确实是在武则天手里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也没有过这样的辉煌日子。

长安的粮食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按理说，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义正言辞的。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以前也不是没做过努力。

尤其是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很多人都曾设法改进。比如将作大匠杨务廉就想过一个办法，他开凿了砥柱旁边的三门山。船过砥柱时不需要改牛车陆运，直接从开凿的山路上用纤夫拉过去，绕开砥柱。但是代价非常惨重。这条山路极其危险，纤夫往往从山上坠落，动辄死亡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纤夫的哭声震动山谷，骂杨务廉为“妖人”。

后来还是靠一个叫裴耀卿的人解决了漕运的问题。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特别有名，但对唐朝的贡献，其实还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认识到了按照当时的技术手段，三门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碍，只能走陆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点在其他环节上改进。美国有过一个著名的企业管理家泰勒，他创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将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后将每一道工序设计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运分成几个环节，在每个节点上都建好转运仓库，设计好衔接时间，由不同的专业人员实施。运粮船什么时候进入黄河，什么时候到洛阳，什么时候走陆路，什么时候入渭水，什么时候到长安，裴耀卿都精心设计，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减到骨头里。

这个方案没有牵涉到工程技术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但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几个继任者又做了进一步完善，结果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帝国的辉煌就奠基在这四百万石粮食上。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两都的末日

安史之乱是一个绝大的历史关键点，影响的绝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它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所谓的中古时代。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可这样的破坏在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北魏的崩溃很残酷，隋朝的崩溃也很残酷，但每次长安和洛阳都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

可安史之乱不同。这主要在于它发生的时机。从汉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还是占优势。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当时差不多是三比二。但这个比例还在变化。安史之乱前夕，这个比例已到达了一个关键点：一比一。安史之乱的爆发骤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时，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经翻转为二比三。

这背后当然有各种深层原因：战乱、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气候的改变。传统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二十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候要比今天高些，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这个力量也许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强大，更加无可抵御。

在这个大背景下，长安和洛阳双双衰落了，这两个失败者再也不用辩论谁更优秀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依旧将首都定在长安。此时帝国内藩镇割据，长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输入。从地图上看，这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东南的身子伸着一个上千里的细长脖子，供养着西北的一颗头颅。

漕运萎缩到了每年几十万石，而且供应线岌岌可危。这条细长的脖子太容易被斩断了。最大的威胁来自运河沿线的军阀们，相比之

下，三门砥柱倒不算什么了。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活矣！” 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也就是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漕运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漕运体系，从地图上看是两条大折线。第一条折线是从南到北，连接江南和黄河。第二条折线再从东至西，通过黄河将物资运往关中。现在第二条东西折线被斩断，只留下了第一条南北方向的折线。这条折线后来又向北延伸到了北京。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长安和洛阳被放弃了。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的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从长远看也无法实行。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心未动，身已远世宗：逃离炮口下的首尔

作 者:刘瀛璐



八 / 世宗大王，朝鲜第四代国王李祹

在建立“行政首都”的执行问题上，韩国终于可以毫无争议地说，他们动作很快。按计划，2014年底，韩国36个政府部门和国营机构将完成从首尔市到世宗市的迁移。从“提出”到“落地”，与韩国纠缠了10年之久的迁都大业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等待它的，将是现实对理想的检验。但不难猜测，“两地分居”即便是对一个国家而言，从心理准备到实际行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尔离三八线那么近，韩国知道吗？

从地图上看，“三八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往北128公里是朝鲜首都平壤，往南40公里就是韩国首都首尔。4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从首尔市中心骑自行车出发，以20公里每小时匀速骑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板门店了。可军事分界线不是旅游景点，板门店是地雷埋设密度居世界第一的地方，而分界线的北边，就是放话“一小时内把首尔变成火海”的朝鲜。

2005年之前，“首尔”在中文里还被叫做“汉城”，不仅是韩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历史上作为首都时间最长的城市。1394年，朝鲜王朝建立者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将时为“汉阳”的首都改名为“汉城”，开始了它作为首都600多年的历史。从风水上来看，汉城三面环山，一面有汉江环抱；秉承着“王城居中，左祖右社”的理念，历经三年建成太庙和宫殿群；地位相当于中国紫禁城的“景福宫”就坐落在风水穴上。定都此地，从选址到修建，天时地利人和，理由充分又不失正统，就连日本都曾对其有过觊觎。甲午战争后，日本对韩国进行殖民统治，“日韩合并”。关东大地震使日本颇为担忧，曾计划将首都迁往汉城（时称“京城”），即“京城迁都”计划。但还没等将迁都一事真正提上日程，日本就在二战中溃败，朝鲜半岛人民不仅要为实现光复欢呼雀跃，还要庆幸战争的结束保住了古城。如果没有1948年“三八线”的出现，定都汉城看起来非常完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三天攻占首尔，百姓向南而逃，韩国

也曾一度把总统府迁至陪都釜山，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支援下，又重新把首都迁回原址，就显得不那么让人容易理解。毕竟，“三八线”就在那里，不管韩国是否在意，朝鲜已经跃跃欲试。轰动一时的“青瓦台事件”就是朝鲜的第一次出击。1968年，朝鲜派遣了一支31人组成的武装敢死队，暗中穿越军事分界线悄无声息地来到汉城市北岳山路，执行刺杀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的计划。40公里，对于训练有素的特种兵根本不算难事。如果不是被当街遇见的警察识破了野战军服是“冒牌货”，这也许就要成为朝鲜历史上“伟大的行动”了。最终，警察和特种兵的枪战惊动了驻军，朝鲜人的刺杀行动失败，朴正熙这才躲过一劫。经历了“青瓦台事件”，朝鲜不仅表现出了“去你家很方便”的姿态，更深深地拉了一把仇恨。朴正熙和韩国中央情报局在仁川外的荒岛“实尾岛”建立了秘密基地，培养特工人员，也期待着哪一天到平壤“回访”，取下金日成的人头。电影《实尾岛》讲述的就是这段故事。

除此之外，朝鲜一直执着地“接近”着首尔。韩国曾经发现，“三八线”周围约有近20条建成和在建中的地道，其中几条方向直指首尔，最宽的一条，可以并排通行两辆坦克。1974年到1975年，第一、第二地道陆续被发现，分别距离首尔60公里和100公里，地道里布满电线、轨道甚至还建有地下广场。而最有名的第三地道，在1978年被发现，离首尔只有50公里，总长1635米，能在1小时内通行1万名武装士兵。尽管现在很多地道里已经竖起了韩国设立的大铁门，对外开放成为了游客观光地，但“用或不用，地道就在那里”，始终是韩国的一块心病。

朝鲜外宣网站“我们民族之间”曾上传一段题为“三日攻陷首尔，劫持15万美国人”的视频。在视频中，朝方称可以在30余分钟内向韩方发射25万发炮弹和1000枚地对地短程导弹，让首尔成为一片火海。可是专家迅速证明，这只是一个笑话。先不说韩国的防御力量和反应速度不可能坐以待毙，就算按照45公里的射程，朝鲜能驾驭的武器，

也只有M-1978式170毫米榴弹炮、M-1985和M-1991式240毫米火箭炮三种，这三种火炮的总数量，朝鲜总共不超过330门。所以，对首尔的军事打击是可能的，但效果并没有朝鲜说的那般夸张。

历史上，只有首尔做过整个朝鲜半岛的首都，在朝韩多年的恩恩怨怨中，首尔的象征意义也许要多过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实际意义。把首都放得离“三八线”那么近，韩国是有一些傲娇；但脱离实际的“攻击理论”也让朝鲜显得有些浮夸。在经历了朝鲜战争的硝烟，望向40公里之外的三八线，韩国人对于迁都这件事，也多少有一点动心。

南迁之“难”

20世纪60年代后，首尔经济迅速发展，借用当时描述西德在二战后迅速复苏经济的“莱茵河奇迹”，首尔的迅速转型也被称为是“汉江奇迹”，成为了大部分韩国人奋斗向往的地方。像北京在中国的引力一样，韩国也出现了不少“北漂”。

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占着全国12%的面积，却承载着50%的人口。80%的行政机关、65%的大学和70%的经济力量，超高的人口密度，让首尔成为了“城市病”的典型患者。随之而来的超高房价、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大大降低了运转效率和生活“幸福指数”。火遍全球的《江南style》描述的是首尔富人区生活，江南是首尔乃至全国房价最高的市区，均价可以达到每平米3000万韩元（相当于70000多元人民币）。尽管韩国也有“限购”政策，但仍然免不了疯狂的地产投机。虚高的地价，大量资源和人力的涌入，让首尔和首都经济圈的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出现了巨大的悬殊，为了给首尔减负，平衡区域发展，“迁都”一事渐渐浮出水面。

“迁都”从1971年开始便被韩国各届政府提及，但直到2002年卢武铉竞选总统时，才作为工作核心正式亮相。卢武铉当时“许下承诺”：在当选总统后将首都迁移到忠清地区，建立一个将人口控制在

50万以内，各行政机关占地230万平方米的新首都。他宣称迁都目的有二：让首都远离军事分界线；让全国各地区均衡发展。但更多的人觉得这只是政治阴谋——卢武铉只是想争取南部地区的选票支持而已，迁都是不靠谱的事。更有人在国会大厦悬挂了一条巨幅标语："誓死反对首都迁移！"警告说"如果迁都得以落实，汉城将荒废"。迁都差一点又一次昙花一现。

不过不管迁都一事是否能实现，卢武铉确实因为争取到了大量的南部选票在2003年成功当选。当选后，卢武铉并没有放弃迁都大业，随之承诺汉城不会荒废，而是可以建设成为像纽约一样的经济、金融中心，新首都和汉城将分别成为韩国的"华盛顿"和"纽约"。也是在同一年，他主导韩国国会强行通过了《新行政首都特别法》，决定将韩国行政首都从首尔迁往中部地区。2004年，政府确定"迁都"选址：在首尔以南120公里，位于忠清南道的燕岐郡与公州市交界处。而宪法法院裁定，《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未通过全民决选，实属违宪。卢武铉不得不又将计划修改为在忠清南道建设一座"行政城市"——将一部分国家部委（九部二厅二处）和部分公营企事业单位迁往将要建成的行政城市。并以"行政特别市"、"行政中心城市"、"教育科学研究城市"等三个后续方案争取支持。经过各派反复争论，2005 年 3 月，韩国国会通过《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法》，执政党实现了建设新行政首都的目的，而在野党也保住了首尔作为首都的存在。"建设新的行政中心"的计划尘埃落定，日后韩国将形成实质上的两个首都。

2006年12月21日，韩国决定将新行政首都命名为"世宗"。2007年正式开工建设，2012年开始搬迁，预计2030年建设完成。

当李明博2007年竞选总统时，许诺会按原定计划推动世宗市建成，但真正上台后，却又对世宗若即若离。于是，前任和继任在是迁"都"还是迁"行政中心"的问题上较起了真。当时李明博政府的最大理由是：迁都世宗，没有考虑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后的情况，毕竟，首尔在地理位置上才是朝鲜半岛的中心。

2010年，“世宗市建设官民设计委员会”经过九次会议后，公布了韩国政府的《世宗市建设规划修正案》，准备“废弃迁移九部二处二厅的原案，改为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综合教育科学与经济的城市”。可是此时，2007年开始动工的世宗市各项建设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民众不仅低价转让了土地，还满怀期待地借此机会振兴当地。此时修改原案，无疑给利益相关的各界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新案公布后的几天内，忠清地区十万民众集会，发起了谴责“世宗市白纸化阴谋（即让原案泡汤）”的市民运动。到处都是诸如“死守原案，不得修改”、“违背承诺，不利于地区均衡”的抗议标语，有些极端的民众还不惜削发明志；忠清道知事也辞职抗议。新的修正案就此被否决，热闹的迁都之争也渐渐平息，到世宗去，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到世宗去

“世宗”是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李祹的庙号，选择人名作为城市名，在韩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不仅因为李祹对朝鲜贡献之多，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尊敬，而且“世宗”也意味着“世界之最”，相对于首尔市的标语“soul of Asia”（亚洲之魂）而言，丝毫不逊色。

2012年7月，世宗市宣布正式成立，一万名公务员也陆续开始搬迁来此地办公。世宗市由燕岐郡全域和公州市、清原郡的部分地区合并而成，位居国土几何中心，大部分韩国国土都在距离世宗市 200公里辐射区内，两小时内基本可达。2002年，卢武铉政府给出的最初迁都预算是50亿美元，待迁都计划正式确定时，官方又给出了380亿美元的数字，而专家估算却高达1000亿美元。反复的政治谈判，让迁移机构规模随之减少，最后确定迁往世宗的为“9部 2 处 2 厅”等36 个机构，预计2030年总人口达50万。而总统府青瓦台和韩国国会等重要国家机关仍然驻于首尔。作为韩国第 17 个区域自治体，人们期待着世宗的出现能够缓解首尔首都圈的臃肿现象，寻找新的发展活力。

但是，迁都一事并非人人叫好，反对者依旧表现出深深的担忧。

第一，世宗市缺乏私营投资机构，无法实现人口目标。韩国明知大学经济学教授曹东坤甚至说："世宗市由一些害怕说'不'的民粹政客创建，将作为一个巨大灾难留在记忆中。"第二，短期内无法配套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将造成大部分公务员"两地分居"的现象，工作日之外，世宗很有可能将变为一个空城。一分为二的政府，使得从世宗到首尔往返一次要两个小时，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将大幅度下降。

从首尔到世宗，"双城生活"一波三折。到2014年底，完成全部搬迁工作的新行政中心将开始彰显自己的作用。韩国的首尔像中国的北京，但保定会不会变成世宗，还有待观望。

段子

散叶

一碗粥换来六品顶戴

1900年8月14日慈禧逃出北京城，其后两日里滴水未进，粒米未沾。直到两日后到河北怀来，县令吴永冒雨奔波几十里在榆林堡接驾，进献了一碗小米绿豆粥、五颗熟鸡蛋，让慈禧涕泪交加，那时吃饭连双筷子都没有。吴永三天磨穿一双靴子，为其忙前忙后张罗。慈禧终于从生存线上挣扎出来。吴永在慈禧西行中一路相伴，颇受慈禧器重。就连曾经给吴永做饭的厨子周福，因为一碗扯面，一盘炒肉丝做得颇对慈禧胃口，也被慈禧挖去做了御厨。午饭时，周还是县衙一名厨子，傍晚已赏六品顶戴，供职御膳房。

赫鲁晓夫喜欢凯迪拉克

赫鲁晓夫1956年上台后，把国家领导人防弹车的生产任务交给了吉尔汽车厂"尔"代表厂长利哈乔夫。赫鲁晓夫对外国名牌汽车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礼品照单全收。吉尔汽车厂多年间一直生产以帕卡德为原型的改型防弹车。不过赫鲁晓夫最为心仪的还数美国的凯迪拉克。1959年9月访美，当他看见这种美国生产的名车时不禁大吃一惊，以至于回国后念念不忘，做梦也想拥有一辆。于是他下令"利哈乔夫汽车厂"照葫芦画瓢，设计出吉尔-111G型轿车。1963年，该车试制出来以后，曾被人戏称"苏式凯迪拉克"。但赫鲁晓夫管不了这么多，经常开着它四处乱跑，后来成了他最钟爱的轿车。

鲁迅理发

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有一天路过一家上等理发厅，就随意走了进去。理发师见他身穿一件褪了色的长袍，脚穿一双布底鞋，头发

乱蓬蓬的，心里看不起他，便很随便地剪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理好了。但出乎理发师的意料，鲁迅随手抓了一把钱给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这些钱竟比规定价格多了好几倍。过了一个多月，鲁迅又去这家理发厅理发，正巧又碰到那位理发师。鲁迅还是那身打扮，却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招待。理发师又递烟又敬茶，足足干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发理完。可又令他惊讶的是，鲁迅这次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抓一大把钱给他，而是认真地按照价格数好铜钱付了账。理发师不解，问其缘由。鲁迅笑着回答说："上次你胡乱给我理发，我就胡乱给你钱；这次你给我理得非常认真，我自然就要认真地按价格给你钱啦！"理发师羞得满脸通红，以后再也不敢"看人下菜碟"了。

梁实秋最爱八宝饭

晚年梁实秋因患糖尿病，不能食甜。一次和刘墉同桌吃饭，冷盘端上来，梁说，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里面加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最后，端上八宝饭，梁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他笑着说，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

蔡元培的续娶条件

1889年，22岁的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王昭去世时，蔡元培33岁，很多人给他说媒。蔡元培贴出了"征婚启事"：第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娶妾，不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1920年底，第二位夫人黄仲玉病逝，蔡元培挥泪写下《祭亡妻黄仲玉》。蔡元培55岁时决定续娶，再次提出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声音

陶铸

20世纪50年代末，陶铸曾指示中山大学为陈寅恪配备一台好收音机，当时学校未照办，陶铸极为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中山大学党委问为何要对“中右”分子优待时，陶铸怒道：“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生活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陶铸被打倒后，红卫兵问为什么要庇护陈，陶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别尔面阔夫

1950年7月30日，苏联向溥仪等人下达了回国通知。溥仪仍不死心，向收容所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在苏联的意愿，但别尔面阔夫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

西哈努克

1972年初，西哈努克回到中国。在抵达当晚由张春桥主持的欢迎宴会上，西哈努克问张春桥：“尼克松到上海时，用的什么菜？”张春桥连忙说：“给尼克松上的菜比给亲王上的菜差远了！”没想到亲王继续追问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提供尼克松的菜谱？”张春桥尴尬万分，因为给尼克松上的菜与给亲王上的菜都是完全一样的。

彭德怀

1951年2月2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希望国内要全力支援朝鲜前线。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些干部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声在居仁堂回荡：“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

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微言

@吴钩：读宋朝士大夫轶事，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清朝人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不是对老婆发脾气，也不是对下属发脾气，更不是对平民发脾气，而是在皇帝面前，也有脾气。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cxterm2002：所谓世大夫，绝大多数就是古代的公知。遇到软的，他就蹬鼻子上脸。碰上硬一点的，就跪地磕头。宋代皇帝软，外族强，所以投降派特多。清代皇权集中，对皇帝磕头的就成普遍现象了。后来又对西方顶礼膜拜，无非是欺软怕硬。

@不见青山缘自到：嗯嗯，严于律皇帝，宽于律自己。一边开口闭口皇帝应该不要与民争利，一边又肆无忌惮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土地；一边严厉打压国内有骨气有血气的军人，说什么“东直门外，以状元唱名者方是好男儿”，一边自己又打不了胜仗只会挑别人错误；这样的宋朝士大夫确实有脾气。我呸呸呸！

@新浪历史：【冯玉祥为筹军费有新招】冯玉祥接管了京绥铁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军政要员免费乘车的特权。接着冯军控制的铁路货运价格猛蹿了三倍。此外，北京各旅游景点卖票的大规模实施，就是从冯玉祥主政北京开始的。他还创造性地定下了根据广告牌大小，按月征收广告税的创收模式。

@历史之碎：【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实质上是三大自由！第一是民族自由，民族主

义的诉求是，国内求各民族平等，对外与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二是政治自由，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皇权专制，争人权和自由；第三是经济自由，民生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

编读

@缪斯波：在本期《特洛伊古城》的文章看到了一张写是海伦画像的配图。之前在读策拉姆的《考古学传奇》时书中配图写的原话是“这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首饰，由发掘者的夫人——索菲亚·施里曼佩戴着海音里希·施里曼于1873年在特洛伊发现的所谓普里阿摩斯宝藏中最具华彩的部分”。根据文章推测这个“海音里希·施里曼”应该就是本刊文章中的“亨利·谢里曼”。文章中也提到了他在特洛伊古城挖到一批珠宝饰物然后断定自己发现了特洛伊古城，但是其实他发现的饰物比特洛伊古城早很多。这个图片上就是他的夫人戴着他挖出的这些首饰。并不是所谓绝色美女海伦的画像（如果原著配图没错的话）出处：三联书店《神祇，陵墓与学者》作者C.W.策里曼　张芸、孟薇译

值班编辑：多谢您的指正，一张图片背后有如此多的渊源和故事，历史神奇之处正在于此。

@谁的阳光：看了贵刊4月上的《杜拉斯：我把生活当做神话来过》。很少有人能像杜拉斯一样将激情贯穿81年。将人生的苦难、爱情、信仰、酒精统统变成养分踩在脚下。所谓女子当如是！今晚就去书店找《情人》。

值班编辑：小杜拉斯38岁情人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她比我更年轻，她猛冲猛杀，什么都不在乎……我不再是我，是她以强大的威力使我存在。” 有人认为，杜拉斯对于女人来说不是一个好榜样，因为太折腾太动荡。也有人说像杜拉斯那样把生活当做神话来过才不辜负。没人敢说哪样的人生更加值得，因为幸福如人饮水，只能请每一个读者自己去品读《情人》。另外，该文作者友情提示，强推王道乾的译本哦。

书情

在巴黎混出来的日本艺术大师

《藤田嗣治：

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

刘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3月

巴黎画派是少数几个以地名命名的流派，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为非主流，他们都是无可争议的大师，却不容于当时的主流艺术界；二为异邦人，成员绝少法国人，多为来自欧美各国的犹太人，唯一的黄皮肤就是藤田嗣治。（从广义来讲，中国的赵无极、潘玉良、常玉也算）。

藤田在中国没什么名气，这本评传可能是唯一一本。但在日本他名气很大，他的作品是各种拍卖会、商业画廊最高价格的艺术品，但也赝品不断。毕竟藤田君是从1910年代就在巴黎和毕加索、夏加尔等老炮一起混出来的艺术大师。

书中收录了大量藤田大师的画作，现在看来依然非主流，有股劲儿劲儿的劲。

《鸟儿歌唱》

李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2月

鸟儿歌唱取自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的一句话。书中，“革

命”作为关键词多次被提及，不过，李零在自序中说：“我要谈的只是我的‘文化立场’，一个普通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徐贲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

虽然这个社会已经没道理可讲，但以理服人还是更多人的选择。当然，人类文明是需要慢慢进步的，公共说理，在徐贲这里成为问题，他给出了一些建议和历史参考。

《共和中的帝制》

张鸣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年5月

民国之初，中国社会面临着两难的选择。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中国制度还极不健全，执政者在弥补制度漏洞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毕竟都没经验。共和中的帝制经历着国际国内的各种考验。

《自由主义批判史》

（意大利）洛苏尔多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3月

在世界语境中，自由主义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本书唱了反调，揭示了自由主义的诸多矛盾，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无力践行自身理想的意识形态，并把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分别批评了一通。

《来世今生》

朱天衣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2月

朱家三姐妹都好文采，挨个喜欢了一遍，最近更喜欢老幺朱天衣。和她两个作家姐姐比，天衣的经历更丰富，她尝试了很多职业，最终才回归文学。这本随笔漫谈了她的生活碎片和朱家往事。

《田园之秋》

陈冠学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2月

牟宗三弟子，曾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及台湾地理研究，正当事业高峰期突然辞去教职，而后隐居田园三十年，晴耕雨读，写了很多自然文字，尤其对南台湾的田野有动人描写，成为自然文学经典。

《蓝天作镜》

刘绍铭 著

中华书局 2013年12月

香港学者刘绍铭也是我喜欢的散文名家，我编副刊时曾有幸得他持续赐稿，他的稿子特别适合报纸，短小，有料，文笔优美，没有多余的话。看似随手而就，实则有深厚的学养内涵。

《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樊尚·考夫曼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德波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之一，从事电影、评

论、冒险和革命等，他既落后于时代，又走在时代前面，他重要的代表作是《景观社会》。这部传记把一个复杂的德波写得真实清晰。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丛小平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2月

这本书从师范学校变迁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从教育改革与现代化转型的复杂互动，来看师范学校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它对师范学校研究有重大突破。

《建筑的意境》

萧默 著

中华书局 2014年1月

看这本书才知道，萧默先生已过世。曾编过萧默先生的采访，后与萧先生一直保持联系。本书应该算他最后一本书，是他对建筑的一些见解和理解。

《听水读钞》

陆灏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年2月

陆公子的史海钩沉是很独特的，有传统文人的雅趣和笔调，又有传统编辑那种广博与认知。书中二百篇读钞，一口气读下来，收获很多有趣的历史佐料。去过他的“听水斋”，是非常别致的书房格局。

《摇滚天堂》

（英）罗伯特·迪默里 布鲁诺·麦克唐纳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3月

这本书为我们呈现的是摇滚史上最著名的120个死亡。作为摇滚人，他们的人生本来就异于常人，而他们的最后时光，也与众不同。

题库

TA出生及成长于芝加哥南部，由于家庭的良好教育，从小的学习成绩就很好。到六年级的时候，加入天才班。之后，学习了三年的法语和两年大学的生物课程，甚至研究过光合作用和老鼠肌肉标本。

官僚政治指机能专业化、讲资格、按规章办事、权力分等级等特点的系统行政管理。贵族政治指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是（ ）

A.分封制的推行 B.“皇帝”制度确立

C.郡县制的确立 D.三公九卿制的确立

今日有关保定即将成为“政治副中心”的传闻使保定备受关注，保定号称“都南屏翰，冀北干城”。“保定”之名开始出现于（ ）

A.汉 B.唐 C.宋 D.元

据《与公肃甥书》记载：“忆昔时邸报，至（明）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对“活版”理解正确的是（ ）

A.活版技术从明代开始使用 B.活版之前信息传递均用手抄

C.活版最早使用的是木活字 D.活版在四大发明中出现最晚

1950年，法国提出欧洲应该超越国家的藩篱联合起来。这一提议得到联邦德国等国家的支持，但英国等一些国家反对成立超国家的机构，只有法、德、意等六国实现了联合。六国率先实现联合的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 ）

A. 屡遭战争重创 B. 社会制度相同

C. 发展水平相似 D. 历史上关系紧密

七国集团近日宣布不参加原定6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同时考虑追加制裁俄能源、银行、国防等经济部门。俄罗斯正式加入八国集团是在（ ）

A. 1975年 B. 1991年 C. 1997年 D. 2002年

应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31日至4月1日访问了欧盟总部，这是中欧建交40年来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访问。欧盟标志为（ ）

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某报报道："如果中国成功地按美国政府的模式建立起一个联邦共和国，由在欧美留过学的具有西方观念的人任领导，日本将不再是东方最西化的国家。"此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该报道的设想相符的是（ ）

A.临时政府基本按照美国政体原则架构

B.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

C.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D.民国临时大总统都有西方民主观念

有轨电车初入上海之时，上海人都说电车乘不得，偶一不慎，就要触电。电车公司即刊文发表"大众可座、稳快价廉"等字样，以资号召，并且说明妇女可出三等车资而坐头等座位。此后，上海市民逐渐接受了方便而价廉的电车。这段材料主要说明（ ）

A.传统交通工具遭到抛弃 B.大众传媒推动出行方式变化

C.有轨电车最早进入上海 D.妇女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属于新版的苏俄新经济政策。这一认识的依据是两者都（ ）

A.处于相似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B. 面临着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C. 巩固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

D. 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有结婚当然也有离婚，在一份道光年间的离婚档案上，一个名叫王德盛的男子立出了“甘愿休妻改嫁”的文约，原因竟是“年荒”让他穷得养不活老婆。文约上同时提到，两人离婚属“夫妻友好协商”。但道光四年，名叫蒲洪福的男子则是以妻子“不守妇道，不孝公婆，不敬夫主”为由离婚。材料反映了（ ）

A.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观念也在变化

B.晚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男女渐趋平等

C.鸦片战争后，西方平等意识的影响

D.鸦片战争后宋明理学统治地位动摇

1561年，斯·史密斯爵士鄙夷地说：“在英格兰，绅士的名分大大贬低了，凡是无所事事的非体力劳动者，只要具有绅士的举止风度，承担绅士的职责，就可以被视为上等人。”这正反映了（ ）

A.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被消除

B.无所事事的非体力劳动者成为绅士

C.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

D.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地位的变化

明朝张瀚称：“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则百工之事，皆足为农资，而不为农病。顾低昂轻重之权，在人主操之尔。”这段话反映的经济主张是（C）

A.农业仅赖百工 B.百工亦为本业

C.农工比重适当 D.农工任其消长

在苏联，1928年1公担稞麦可分别交换35米印花布、75公斤砂糖，到1952年只能分别交换1.5米印花布、0.9公斤砂糖；1953年，谷物的义务交售价格仅为成本的10%，牛肉价格为成本的5%，猪肉价格为成本的6%。这段材料反映出这一时期苏联（D）

A.农副产品质量差、价格低 B.农产品过剩造成价格下滑

C.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完善 D.工业化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将以下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与其所在都城连线

1.前燕 A.平阳（今山西临汾）

2.南燕 B.龙城（今辽宁朝阳）

3.前赵 C.襄国（今河北邢台）

4.后赵 D.广固（今山东青州）

题酷答案

TA是：米歇尔

选择题：1、（C）2、（C）3、（D）4、（A）5、（C）6、（D） 7、（A）8、（B）9、（B）10、（A）11、（D）

连线：1.B 2.D 3.A 4.C

外刊

合同工拯救苏联

不要以为合同工是属于中国的专利，他们在苏联乃至所有工业国家曾经举足轻重，其发展之路也与中国有几分相似。俄罗斯的合同工诞生于18世纪的乌拉尔地区，当时这里刚解除军事要塞地位，于是当地的农民便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无私贡献，他们领着低价的薪水，住着简易窝棚为当地建设各种军工企业。农民的生活到了苏联时期并没有太多好转：由于农民们拿不到自己的护照（相当于身份证），他们平常甚至无法离开集体农庄，违者要受到巨额罚款甚至刑事处罚。然而随着各大城市工业化的建设，人力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因此对于农民的限制开始放松，他们可以通过登记前去大城市以与工厂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打工”。

第一批苏联合同工参与建设了苏联第一条地铁——莫斯科地铁。现在我们必须以尊敬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还修建了莫斯科机场，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走上了前线，数十人因此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其中也有不少能人——有农民工对铁锹提出了技术改进意见，大大提高了莫斯科地铁的进度。

名噪一时的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讲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莫斯科的三个外来合同工的辛酸苦辣：高考落榜的卡捷琳娜在莫斯科的金属服饰厂找了份工作，却遇人不淑，未婚先孕，经过奋斗终于考上大学走向成功，并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她的两个朋友——油漆工玛丽亚家庭幸福美满；柳德米拉也是雄心勃勃，虽然碰壁不少但依然不悔初衷。

不过也要指出，当时莫斯科市民与“外来户”的关系有些紧张：莫斯科市民认为合同工们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并认为他们不知礼节，合

同工则认为莫斯科人是群“酒囊饭袋”。巨大的压力使他们与本地人摩擦不断，但就像电影里的歌曲所唱的：大家“谁也离不开谁”，莫斯科的魅力市容，正是一个个合同工的勤劳双手所创造。

揭秘全球最大私人军队

从石油重地苏丹，到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从冲突仍频的刚果，到英国废旧机场，凡是正规军队不屑做、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情，它们就会来接手。全球最大的保安公司G4S，这家总部在伦敦的公司已经上市，其雇员超过62万，数量是英国正规军的三倍。在全球私人企业里头，规模仅次于沃尔玛和富士康。虽然大多数G4S员工主要充当低级保安，但越来越多的军事专家正参与近来。比如被派往南苏丹的拆弹专家布瑟先生，每月薪水是1万美元。他的主要任务，是到冲突现场拆除未引爆的炸弹。他的拆弹小组有七个人，四人负责拆弹，一个司机，一个公关经理，还有一个是医务兵。

G4S的触角遍及120多个国家。G4S这样的保安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反映了时代的转变，特别是政府治理能力在科技进步和社会碎片化面前的无力。哪里有空当，保安公司就会涌向哪里。

亨利八世的六个女人

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身边的六个女人，不仅对亨利八世的生活，而且对英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影响。谈论她们，没有比当时的西班牙驻英国大使乔比更合适了。他的书信留下了对亨利八世私生活最真切的观察。

亨利八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按辈分是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姑姑，她多次生育，但只养大了一个女儿。结婚20年后，亨利八世同凯瑟琳的侍女安妮·博林偷情，并执意要离婚。乔比这时候充当了国王夫妇的调解人。

亨利八世迎娶凯瑟琳的表妹霍华德时，一般人都认为凯瑟琳·霍华德美丽、聪敏，乔比注意到她的性格中还是有和亨利八世不和的因素。结果，两年后，她因通奸罪被斩首了。1543年，到亨利八世第六次结婚时，整个欧洲都无动于衷了。这时候的亨利八世年事已高，严重肥胖，四年后即告去世。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凯瑟琳·帕尔得以善终。

破解飞机失联黑洞

马航MH370失去联系已有数周，各国联合搜索没有明显进展。它也成为航空史上最离奇的谜团，在一个智能手机能告诉人们去哪里吃饭的时代，一架价值2.6亿美元的大飞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尽管技术日新月异，飞机甚至实现了自动驾驶，航空管理系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仍然照顾不到所有飞机，特别是大量远途飞行、跨越大洋的飞机。当前商用飞机的跟踪系统主要还是靠雷达，这个二战技术的缺陷是覆盖范围小，只有200海里。其次，尽管需要掌握技能，飞机上几乎没有什么设备是不能被主动关闭的，包括高频无线电通信系统和其他通信系统。

雷达的基本原理是发出声波，然后等它碰到飞机反射回后，分析飞机的位置和距离。这样得到的信息依旧有限。所以还需要二次雷达系统，即地面雷达和飞机上装载的应答机相互通讯，进一步明确飞机的位置。马航MH370失去联系的时候，它仍处在200海里雷达覆盖范围内，所以专家判断是飞机上有人故意关掉了应答机。

因为在海上无法安装雷达系统，实时监测越洋飞机的难度极大，空管方面需要飞行员定时用无线电汇报位置。近年来，一些航空公司开始使用自动相关监视系统（ADS-C），飞机上的电脑通过卫星获取四维位置信息，然后传送到地面接收和处理系统。这套系统还可以传送ACARS（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数据。马航客机上的这个系统是传送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发动机信息的，但也被刻意关闭。

可能只有卫星才能确保24小时实时监测飞机。两年前，飞机导航系统开发商加拿大导航公司同铱星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从明年起发射66颗通讯卫星，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全天候实现飞机监测。丹麦、意大利和爱尔兰的导航系统公司也都加入了合作。不过，这套系统最早要到2018年才投入商用。

西班牙流亡者

1936年至1939年的内战是西班牙现代史中的重要一段，共和党人在内战中的失败导致成千上万人在战争结束后不得不离开西班牙进行流亡，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法国和其在北非的殖民地，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奥德赛之旅。

尽管法国政府对于接收大规模的西班牙战争流亡者并不十分愿意，但当局仍然在1939年1月27日和28日向西班牙平民开放了边境，并在1月31日允许伤员入境。西班牙战败者的流亡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77年6月21日。当时在法国的西班牙流亡政府正式宣布解散政府，原因是6天前西班牙举行了1936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数十万西班牙人40年的流亡生活正式结束。

宗教旅游的兴起

圣周——既是一个纪念耶稣受难的痛苦的日子，也是一个音乐、艺术、色彩和游行汇聚的时节。目前西班牙有23个城镇的圣周纪念活动被评为了国际旅游推荐地，每年这些地方的圣周活动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除了圣周外，西班牙还有一些其他节日具有旅游开发潜力，比如长达40天的封斋节，这是在圣周之前的节日，这一节日在西班牙具有很悠久的传统，但目前还没有得到商业开发。今年塞维利亚市政府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今年专门为宣传其封斋节庆祝活动制定了一个计划，市政府在塞维利亚各处摆放了100个宣传板，联合酒

店和餐馆推出了一系列优惠和节日套餐，积极宣传推广。

根据统计，欧洲每年有约3000万天主教徒会利用其假期进行朝圣或者参观重要宗教场所，宗教旅游潜力巨大，正在成为西班牙城镇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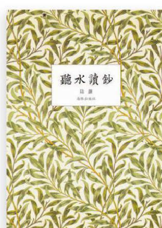
读书




今生来世
台湾山居生活札记
朱天衣 著


蓝天作镜
刘绍铭 著
中華書局


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1897-1937
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
Xiaoping Cong


聽水讀鈔

读何帆《若有所失》

那些被忽视的历史偶然性

文 |严杰夫

何帆在其随笔集《若有所失》的开篇便围绕“金本位制的兴衰”这场世界经济史上的大戏而展开。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金本位制在英国的诞生还与牛顿有关。在学生查尔斯·蒙塔古的推荐下，50多岁的牛顿告别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成为皇家铸币局总监。由于工作出色，牛顿不久又被提拔为皇家铸币局局长，这相当于今天的中央银行行长，管理的是整个国家的货币供应。然而，在牛顿任职期间，恰逢英国面临严重的银币流失现象。由于当时英国实行银本位制，作为主要货币，银币流失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问题了。1689年，“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英国又对法国宣战，白银外流愈发严重，英国内阁不得不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起初，英国内阁采纳了经济学家约翰·洛克的意见，铸造新的银币，让新银币的面值和其实际的金属含量正好等值。但这一方案实施不久，牛顿就发现，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造币厂已无银可铸。开始时，牛顿是银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但随着铸币遭遇挫折，他慢慢从一个白银捍卫者转变为怀疑者。

1717年，牛顿提交了一份货币报告，建议将铸造金币的价格降低，令黄金价格固定下来。议会采纳了牛顿的建议，正是这个建议间接加快了白银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黄金正式与英镑挂钩逐渐成为主要货币。从实质上来说，英国至此已成了金本位制国家。此后的两百多年，英国就一直实施金本位制。黄金天然就容易唤起人们的崇拜心理，自从金本位制诞生以来，就吸引了历史上一大群精英分子膜拜在它的脚下。俾斯麦、丘吉尔和墨索里尼都是金本位的拥趸。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伤害了西方经济，也直接摧垮了国际金本位制度。不过，金本位制的影子依旧盘旋在资本主义的上空，久久不愿离去。战后，欧洲国家纷纷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已处于帝国斜阳中的英国，更期望通过恢复金本位制，重现帝国昔日的辉煌。在英格兰银

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和其时担任英国财长的丘吉尔的力推下，1925年英国宣布恢复金本位制。英国硬生生地恢复金本位制，就意味着英镑的汇率将被高估。于是，英国主要的出口行业受到冲击。1929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再度重创西方世界，也给了金本位制最后一击。最终，在1931年9月19日，英国退出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刚刚上台的总统罗斯福也宣布放弃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慢慢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尽管，此后的经济学家曾掰着手指，列数出诸如黄金生产量增长幅度不足、黄金存量分配不平衡等导致金本位制崩溃的因素。但这一切都同历史上的大多数故事一样，黄金这个角色的登场和谢幕，是各种因素偶然碰撞出的结果。无论是金本位制的产生，抑或是最终的崩溃，都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来归结。

正因为历史进程中的这种偶然性，才令何帆关注人类历史上的那些衰退期似乎更甚于繁荣期。何帆基于这个观察的“历史重现”，重新解释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根由，也重新认识了20世纪末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新兴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何帆并不认为是《广场协议》造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的失误在于，始终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关系。日本在参与国际经济谈判的战场上屡屡犯错，这才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真正原因。

经济学也好，历史学也罢，乃至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人文学科走到最后都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字　“文明”。就这样，在这本思想随笔集中，作者从经济谈到了历史，进而迈向文明和人性，跳出了经济学家很容易掉入的就经济而谈经济的技术性陷阱，为我们理解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提供了更为宽广敞亮的视野。

苏联一手操纵全票赞成公投独立的外蒙古样本

作 者:郭晔旻

1945年，在克里米亚的疗养胜地雅尔塔，美国、英国与苏联签订了实际将战后世界一分为二的《雅尔塔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经谅解，有关外蒙古……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直到密约签订4个月零9天的1945年6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才奉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蒙在鼓里的蒋介石。曾被吹捧为世界四强领袖之一的蒋介石没有被邀请出席雅尔塔会议。而且迟至此时，那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协定的内容才被通知到案头，这不能不令蒋介石深感屈辱和愤怒。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哀叹，“就只这一些问题，已经是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苏蒙对国民党的让步不领情

弱国无外交。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宣布：“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值得一提的是，负责与苏联谈判的宋子文为了避免在历史上留下放弃国土的骂名，在最后签约前辞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因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是新任外长王世杰。此公替宋子文背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黑锅，以至回国后许多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人拒绝再与其往来。

“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对国民党当局而言，当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在日记里对《雅尔塔协定》大发牢骚的蒋介石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在8月24日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1922）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将放弃外蒙的责任推给了北洋军阀，随后又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出断然的决心，经合法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实际上在“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独立）愿望”之前，国民党政府已经决定承认其独立。

可惜，在反映苏蒙官方意志的，由苏联科学院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里，对国民党方面如此屈辱的让步并不领情，甚至表现得极为不屑。“中国国民党政府关于在进行公民投票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声明，只不过是被迫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公民投票的事实，极明显地说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虚伪和企图再一次拖延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予以形式上的承认”。

外蒙古无人敢忤逆苏联的意志

1945年9月21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宣布，将在10月2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全民公决，并煞有介事地宣布，“凡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年满18岁）皆可参加投票……应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在投票中任何强迫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事实，都认为是破坏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应依法受严厉的处治”——这很快被证明是此次“公民投票”中最大的笑话。国民党政府派出的由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为首的12人代表团于10月18日乘坐苏联飞机抵达库伦（乌兰巴托）观察外蒙公民投票。

代表团抵达库伦时，正值外蒙古当局组织的“号召全体人民来表示是否愿意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的造势活动高潮。在短短一个月

里，外蒙古全境举行了13000多次群众集会，成千上万的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些集会，集会的唯一主题，就是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高度爱国热忱和政治觉悟”，表明自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忠诚，表示要投票拥护自己祖国的独立。组织全民公决的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甚至收到了1525封信、83789份保证书，其中无一例外都表示愿意投赞成票，在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争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

外蒙古民众表态如此激昂，是因为他们完全清楚不这样做的后果。早在1935-193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内防处（相当于内务部）声称破获了一个活动在东南部20多座喇嘛教寺庙里的“反革命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是“在内部发动叛乱，并且在日本的帮助和庇护下恢复国内旧的封建制度”。在带着全套苏联大清洗经验而来的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案件“侦破”工作异常顺利地进行。仅仅是为了延缓不可避免的死刑，有人可以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从而供出无数“同谋”……这一“反革命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阴谋”，并被定性为“根登-杰米德”反革命集团，“这一集团的首领和积极参加者，潜入到党和国家的机关后，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党和国家的工作”。根登是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而杰米德则是蒙古人民军总司令。根据他们的“口供”，又揪出了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 名将领被捕；51个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 36 个被枪决。

蒙古版本的“大清洗”的尾声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外蒙古当局奉命全力投入对苏联的物资支援而无暇他顾才告终止。这一年，同样担任过总理的阿玛尔与人民革命党建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多格桑木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的罪名成为大清洗的最后一批牺牲者。历时数年的大清洗中确切的死亡人数，目前尚无定论，遇难人数有3.6万至10万人不等，而当时外蒙古的总人口不超过80万人。无论

如何，在五花八门的“反革命组织”都被肃清之后，至少在表面上，外蒙古已经没有人敢于忤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与苏联的意志了。

连“公投”形式都没走的唐努乌梁海

不过，在背地里，无孔不入的苏联驻外蒙的克格勃人员却发现，有些蒙古人认为“公民投票是在莫斯科倡议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随后占领蒙古，并将它并入苏联”。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921年夏天，苏俄红军以“支援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名义进入了位于外蒙古西北部的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用刺刀扶植起一个亲苏政权。当年12月12日，唐努乌梁海大呼拉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正式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人民的国家”，国名定为“唐努图瓦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不予承认。1926年11月24日，“唐努图瓦共和国”大呼拉尔宣布将国名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大会通过的宪法的序言和句法结构，与1918年7月的苏俄宪法、1924年11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经过长期准备的秘密兼并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发生了。

1944年8月17日，由大约30人组成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全境7万居民“请求”加入苏联，甚至连形式上的“全民公决”都没有举行。同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这一“请求”。苏联当时对此事秘而不宣，官方未发表声明，塔斯社也不置一词。直到1948年3月17日，苏联广播电台宣布：“图瓦人民共和国并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图瓦自治省”，这一次静悄悄的合并才为世人所知。

百分之一百的投票拥护蒙古独立

为了保证1945年10月20日公投结果的“圆满成功”，外蒙古当局在全民公决的具体操作中无所不用其极，简直令“狗不如的人间渣滓”希特勒都瞠乎其后。在纳粹德国1936年武力占领奥地利后组织的

德奥合并公投中，“各投票棚的角上都开着很大的裂缝，使坐在几英尺外的纳粹选举委员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们怎么投票”，最后奥地利99.75%的人投了赞成票，甚至比德国本土还高。外蒙古选举当局甚至连这样的表面文章也不做，干脆规定，“每一个列入投票名单的公民在投票的一天必须亲自到指定的投票地点，讲述自己‘赞成’或‘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意见，并签署自己的姓名”。

为了应对万一的“不测”，苏联驻外蒙古的红军也可以随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早在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根据1936年3月12日与苏联签订的《蒙苏互助协议书》“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来蒙。斯大林当然会忠实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37年9月，三万苏联红军就进入了外蒙古。而到了外蒙古公民投票前的1945年8月，为了筹备对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打击，进驻外蒙古的苏军总数曾高达20个师以上。而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全世界仅有的“邦交国”，苏联派驻外蒙古的外交人员除公使及商务代表外，竟有中将1名，少将2名，甚至雷法章代表团住的招待所的负责人也是一名苏军上校。

在蒙古方面的精心准备与苏联红军保驾护航下，外蒙古公民投票在1945年10月20日上午6点粉墨登场，并持续到午夜十二点。作为观察员的雷法章在库伦的投票站看到，每张投票簿上用蒙文书写“蒙古人民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而证实个人之愿望”，落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每张投票簿分有“第号”、“姓名”、“赞同”、“否”、“备考”等5个栏目。凡赞同独立者即在其本人姓名栏之一行内签名于“赞同”栏，反对者则签于“否”栏。每个投票人进入投票所时即由工作人员导坐桌前，查对姓名栏后签字（文盲按手印）。显而易见，没有投票的秘密，就不会有自由的意志。举着各种标语和旗帜、抬着蒙古人民的领袖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画像前来“踊跃投票”的蒙古民众毫无悬念地一律签名于“赞成”栏内，无一人（敢于）在反对栏中签名。

按照蒙古方面事后的说法，“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举行全民投票时，中华民国政府派有全权代表监督全民投票的进行”。但实际上雷法章能做的只是“对代表团在外蒙‘参观’（不是监督！）期间受到的热烈招待至感荣幸，对外蒙20年来努力建设，进步颇大尤感欣慰，并祝苏联国运昌隆，祝外蒙人民幸福”；并回国后哀叹，“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为监视，且甚为严密……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外蒙政府当局与苏联之合作至为密切，每常表示其对于苏联亲切之意念，而于我国则目为邻邦”。

10月22日，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公布全民公决结果。在全国494960名投票人中，实际投票者为487409人，即98.4%。所有487409人，百分之一百投票拥护蒙古独立。熟悉历史的人不需意外，萨达姆、卡扎菲之流100%支持率的奇迹，其实早有先例。

“秋海棠”变成了“雄鸡”

公投结束之后，外蒙古当局迫不及待地宣布，“全民投票完全证实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的愿望，因此中华民国必须根据1945年8月14日中国政府所作的声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事到如今，已然覆水难收。1945年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1946年1月15日以前完成承认外蒙古独立手续。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19日通知国民政府照办。

1946年1月5日，中央社黯然发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外蒙古人民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消息传到乌兰巴托，自

然一片欢腾。1月10日蒙古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就宣布，为了感谢苏联对“巩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方面所给予的兄弟般的帮助”，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勋章——苏赫巴托尔勋章——授予苏联大元帅斯大林。

外蒙古独立在国际法上所需手续就此完成，中国版图也从“秋海棠”变成了“雄鸡”。

镀金时代的扒粪运动揭露黑幕推动美国走向进步

作 者:周斌

报刊不仅能送更多的灵魂升入天堂，也能把更多的灵魂拯救出地狱。——詹姆斯·戈登·贝内特

每

个屠宰场都有杀猪房，每天杀猪房中总会运出一批挂有红标签的死猪，这些猪被发现感染有结核病毒，猪肉中含有致命的尸毒，无论经过何种处理，即使烹煮，尸毒都能存活，并能致命。政府要求把这些死猪放入槽中处理成肥料，槽由政府职员在底部封口，只有槽中的肉被销毁，封印方可取掉。纸面上的规定很严格，但是这些槽总是开着的，从上面扔进的肉从下面出来后被制成了腊肠……在充满蒸汽的装罐车间，地板水平下方有开口的罐子，工人可能会掉入这些大罐中，万一掉入，被捞出来时躯体已所剩无几，有时，他们会被忽略好几天，直到只剩一把枯骨。那些血肉会随着加工的肉类送到公众的手里。

这不是“3.15”的曝光场面，而是1906年美国出版的纪实小说里的文字。25岁的调查记者厄普顿·辛克莱拿着《诉诸理性》周刊提供的五百美元经费以打工的名义潜伏到美国芝加哥的一间肉类加工场，一共七周的调查让他看到了超乎想象的疯狂场面，他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起名叫《屠场》（The Jungle）。

让脚步等一等灵魂

美国史学家亨利·康马杰说：18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区

分了农业美国和工业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全国处在工业化的浪潮中，美国人疯狂地追逐着财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群落在一个接一个生长出来。在企业逐利的本能驱使下，支配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垄断企业越来越多，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到1904年控制了国内石油贸易的80%和石油出口的90%。JP摩根以卡内基钢铁公司为中心，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仅手中的现金就可以支付美国政府1880年的全部开支。垄断企业们组成托拉斯置一切正义、公平、人道于不顾，疯狂敛财。这就是美国的“镀金时代”。

但美国人面对不断刷新的GDP以及这个崭新的时代“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政府的食品监管受贿成风，尸位素餐。整个美国的制假造假之风极为猖獗，食品和药品公司的大幅广告肆无忌惮地说谎。

药品业的问题更加严重，有些制药商利用一些人对阳痿、性病、癌症以及某些妇科病的无知和畏惧，打出了所谓独家秘方。有一家制药商把一种非洲草药“BUCHU”捧成能治百病的神药，以一药治万病，但这种草药实际上在非洲只是一种化妆品，涂在皮肤上能挥发出一种类似胡椒和薄荷的气味，披着种种神秘主义的伪装，药商引诱人们购买，结果使很多病人的病情雪上加霜。另一家药品公司兰多宣称他们的新药中含有镭，功效神奇，但事实上其中的镭含量与自来水差不多。美国一位著名医学家赫尔姆斯曾气愤地说：“假如能将现在所有用的全部药物沉入海底，于人类乃是万幸——而于鱼类则是最遭殃不过的事了。”就是这些假药每年从那些可怜的美国病人身上骗走了五千九百万美元。

美国人对食品卫生业中的假恶丑也受够了，民间流传最好的肉被出口到德国，因为那里有严格的肉类检测标准，而那些不合标准的肉则留在了国内。

“代理处专门寻找年迈的、瘸腿的、病殃殃的牛来制作肉罐头，例如，在附近的草原上，有上百个农场向市场供应牛奶，所有患腭瘤

或因年老而无法产奶的牛到了能装满一车，也就是20头时，就被送往这个地方制成罐头……这就足以使每个人觉得恶心，再想想人们还不得不吃那样的肉；但是他们必须吃，因为罐头厂还在继续生产，年复一年！……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制作‘芳香牛肉’的原料导致了数倍于西班牙子弹数目的美国士兵的死亡。而且，只有军队的牛肉不是用新鲜肉加工的，而是用在地窖中躺了数年的陈肉。”

利益集团激斗揭黑记者

辛克莱本意是想揭示劳工的恶劣劳动条件，“写此书的本意是打动公众的心，可碰巧击中了胃。”书中的文字足以让被恶心到家的美国人再也没有勇气拿起刀叉。

《屠场》对肉类企业的杀伤力，使它的出版过程毫不逊色于书写过程。先是原定的出版商害怕作者的社会主义倾向会惹来意识形态上的麻烦，要求辛克莱修改内容，并承诺如果按要求修改可以保证此书销量至少增长十倍，但辛克莱在职业操守与经济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

在经历数家出版商的拒绝后，书稿感动了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沃尔特·佩奇，他不但买下了版权，而且还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调查核实，最后予以出版。

闻风而动的全美牛肉托拉斯们展开了反击，他们收买一些报刊杂志对这本书进行口诛笔伐，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书中的内容失实、耸人听闻、恶意夸大。辛克莱激怒之下又写了一篇《可恶的肉类加工业》揭露肉类企业的代笔们用贿赂手段使证人撤回证言的事实，还出示了政府部门的报告书，显示一些企业原本就承认过食品掺假行为。糖衣炮弹也接踵而来，一些肉类企业试图拉拢辛克莱，提议以他的名义建立一个“模范肉类加工厂”，而且开出三十万美元的巨额股份作为好处费，他只需签字同意就可以从此名利双收。“可能还会在理弗赛

德·德理弗拥有一幢或者更多的别墅，美女则是想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根本不会有谁批评我。”

辛克莱没有接受这些，反而揪住这些肉类企业又是一通猛打，为多家杂志撰写了后续调查，揭露无良企业对千万美国人的伤害与欺骗。

新闻自由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及法理基础，在金钱与新闻的较量中，金钱逐渐失色。《屠场》顺利出版，而且引发轰动，首发后一个半月卖出了两万五千册，之后一年内始终钉在图书畅销榜的榜尖，并被翻译成十七国文字向全世界传播。

丘吉尔说：“这部可怕的书……刺穿了最厚的脑壳和最硬的心”。有一个广泛传说的段子说西奥多·罗斯福读《屠场》时正在吃早餐，当读到香肠中混进死老鼠等令人作呕的加工环节时，大喊着“我中毒了！”把吃了一半的香肠扔出窗外，从此，总统变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不敢再吃肉。

《屠场》使国内外的肉类产口销量剧减，英德两国向美国发出外交照会，装载美国肉类产品的货船被国外港口退回，美国肉类托拉斯陷入一场灾难。

社会上响起一片改革的呼声，罗斯福总统派了两名纽约市社会工作者尼尔和雷诺兹组成新的调查组，前往事发地暗访，结果证实辛克莱的作品所言非虚。

迫于压力，也为了重振绝望的市场，肉类企业嘴上拒不承认所受的指控，私底下却开始紧急清理工厂，并宣称拥护政府调查和严格管理。

《屠场》也使国会反对派改变立场，1906年，也就是《屠场》出版的同年，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与《肉类检查

法》，要求对所有肉制品都要进行严格检验，美国食品药品从此慢慢安全起来，公众也逐渐恢复了信心。

坏消息更吸引眼球

像辛克莱这样的记者“与政治家和劳工领袖、改革家和鼓动家、教授和牧师以及社会工作者一道，共同影响了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其中，记者是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最大动力。

十九世纪美国的新闻业迈向廉价时代。

大众化的杂志价格更低、内容更通俗、更贴近大众生活。杂志较报纸出版周期更长、篇幅也更长，更适合长篇的揭黑报道，而且杂志一般是全国发行，一旦揭开黑幕比较容易形成全国性影响，从而为杂志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读者订户以及经济效益，是一条迅速上位的成功捷径，因此成为揭发黑幕的主要载体。

这一时期著名的揭黑记者大多供职于一家或几家杂志，他们挖出了美国几乎所有的黑暗与不公正，如“市政腐败、经济垄断、食品卫生、药品掺假、欺诈索赔、雇佣童工等等”，有的是文学型记者，擅长写作动人的故事，有的是专家型记者，有深悉一切的调查能力。他们与报刊等新闻出版业为迎合读者而支持揭黑不同，大多怀着对美国的爱而恨这个国家，立意推动社会进步，“拯救美国”，目标“浪漫崇高”。在他们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快，而道德的血液明显跟不上肌体的需要，看似发达健壮的社会实际上藏着令人发指的罪恶与黑暗，“希望在劝服和勉励的基础上，用良心的告诫鼓励美国民众参与这场有关道德的改革运动”。

贬义的“扒粪者”变成光荣称号

美国新闻界争当“乌鸦嘴”，不当“报喜鸟”，因此从报刊上看美国，民不聊生，遍地狼烟，严重影响了正在崛起的美利坚的形象。作

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天天被报刊指着鼻子骂，不但令友邦惊诧，也扰起了本国人民的不稳定因素。

爱达·塔贝尔抄了美孚石油公司的老底，林肯·斯蒂芬斯写了有关都市政治机器的作品，雷·斯坦纳德·贝克报道劳工问题的文章都曾引发极大的社会反响。1906年 3月号的《世界主义者》发表了菲利普斯的文章《参议院的叛国罪》，点名指责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20多位参议员，使用了“叛国”、“无耻”、“掠夺”、“强盗”等字眼，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骂得太激进，令举国皆惊。

西奥多·罗斯福在公开演说中给揭黑记者、作家安了一个“扒粪者”（Muckrakers）的称呼。这个词出自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其中有扒粪人，“手拿粪耙，目无旁视，只知朝下看；他被赠予天国王冠以替换他的粪耙，但他既不抬眼望天，也无视王冠，却仍继续耙那地上的秽物。”罗斯福的类比让一些知名的揭黑者震怒，但是生动形象的称呼还是不胫而走，更多揭黑者们以此为荣，揭黑运动于是又被称为“扒粪运动”。

“扒粪运动”揭开的社会黑幕，张扬了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甚至是媒体审判，但它完成了一次大众的新闻洗礼，使人们的权利意识“大觉醒”，“进而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

美国总体上是一个法治国家，“衡量社会运动成效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对立法进程的影响。”受“扒粪运动”的影响，“市、州和国家的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这些改革性法案有：宪法第十六、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1906 年）、肉食检查法（1906年）、打击放任自流式经济的《赫伯恩法》（1906年）、联邦储备法（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诸多法律：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官人

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扒粪运动”没有唱衰美国，反而促使底层百姓、中产阶级乃至一些大资本家形成了改革共识，针对社会问题，全社会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权钱交易、有法不依因大批扒粪劳模们的“粪勺”而不得不收敛，推动了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完善了社会制度建设，令“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转型安全“着陆”，使美国成功建立起“民主自由而又井然有序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扒粪运动”开始衰落，战争牢牢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国际问题取代国内问题成为新的焦点，大战面前，舆论自动开始对外，这个时候再枪口对准自己，响应者就寥寥了。

“扒粪运动”虽然逐渐终止了，但在记者中，能以一己之扒粪改良社会的，都会受到同行的尊敬。大名鼎鼎的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的风向标，在历届获奖作品中都能看到揭露性报道的身影。在道格拉斯·贝茨所著的《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一书中写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一向主要是揭露性新闻，它们所揭露的情况是某些政党、尤其是政府所不愿意泄露的。在1917-1990年的580个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扒粪运动”以里程碑式的姿态留在了美国进步史与新闻史的记载中，它为新闻界留下了揭黑传统影响至今。

参考资料：林肯·史蒂芬斯，《新闻与揭丑I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李颜伟，《美国改革的故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占16人　抗战捐款占华人赈捐2/3不忘本的马来西亚华人

作 者:黄金生

马航MH370失联事件发生，触痛了无数中国人的心。3月24日晚，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无一人生还”，但并未找到飞机残骸，未解释失联原因，官方发布隐含的众多问号点燃了一些网友的怒火。梁静茹、曹格、光良等马来西亚籍明星遭到网上口诛笔伐；部分中国明星宣布抵制马来西亚，再也不去马来西亚旅游……不理性的情绪宣泄着对马国政府的不满。

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其一，马来西亚是除两岸三地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二，马来西亚允许华人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华人有着深切的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感。

汉丽宝的后人

马来西亚华人有700万左右，约占其人口比例的25%，今天华人比例超过75%的新加坡也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今天，华人在马来半岛聚居，始于1402年马六甲王朝的成立。马六甲王朝在成立初期，整个马来半岛都在暹罗（即今泰国）的势力范围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派遣内官尹庆到访南洋，将马六甲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郑和七下西洋，就到过马六甲，并帮助马六甲脱离暹罗的统治，使其迅速繁荣起来。

明朝将汉丽宝公主作为和亲使者嫁给马六甲第二代苏丹曼斯·沙。传说中汉丽宝公主乘坐豪华宝船来到马六甲时，带了500个随从，这些宫女们个个肤色皎洁如玉，打扮得非常漂亮。马六甲的市民倾城而

出，观看这史无前例的场面。连怀孕的妇女也跟着人群挤呀挤，别人劝说她回家去，免得肚子里的孩子挤没了。她说：“辉煌的日子不常有啊，孩子是年年都可有。”她们高兴地说：“生儿当如苏丹贤，生女当如汉丽宝。”

当初汉丽宝公主带来的500名宫女多与土著结婚，渐渐学会了马来话并融入当地社会，成为最早的华侨和移民。今天很多马来西亚华人还自称是汉丽宝的后代并以此为傲。

1511年后，马来西亚相继被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占领，到1909年，英国开始取得对马来西亚的全面统治。殖民者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17世纪初，荷属东印度的第一任巴城总督昆彼得就提出掠华人为奴，1619年他们劫掠中国南去的船只五艘，强迫船上的两千名乘客留居马来西亚作苦力。

早期的掠夺活动大多是秘密进行的，发生的次数少，规模也不大，不能满足越来越大的劳动力需求。为吸引华工，南洋诸国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下南洋成为近代史上与闯关东、走西口并列的三大移民潮。

“华侨为革命之母”

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尤其是第一代华人在家国认同上，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身在马来心在汉”，依旧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命运。中国的近代革命，如果没有这些华侨的积极参与，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马来华人社团从发展革命组织、宣传

革命思想、捐助革命活动、扶助流亡人员乃至归国参加武装斗争，在人力、物力方面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不惜毁家纾难、牺牲生命。

马来同盟会于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这是马来华人的第一个政党，随后在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等地成立分支机构。槟城是中国同盟会的南洋总机关部，策划了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这些烈士中，有16人为马来华侨。

余东雄是来自霹雳州的华侨，他攻进总督衙门，搜寻两广总督张鸣岐未获，出署时与清军相遇，激战中牺牲，　年仅18岁，是最年轻的牺牲者。而他的好友，同样来自霹雳州的郭继枚就义时，结婚还不满三个月。来自吉隆坡的华侨工人李晚，为了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中扛着大旗冲锋在前，中弹而死。槟城华侨李雁南战斗中受伤被捕后押上刑场，壮烈牺牲。

今天，在新加坡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入口处伫立着4座黄花岗烈士的铜像。其中两名持刀枪者即为郭继枚和余东雄。

武昌起义前后，还有大批的马来华侨组织敢死队、炸弹队回国，仅在1911年11月初，就有2000名马来华侨“自备糈粮，自备械弹”，参加中国革命。

马来西亚还为起义失败后撤退的革命党人提供避难地。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后，逃亡的革命党人辗转来到马来西亚各地的农场和橡胶园；1908年镇南关和河口起义失败后，600多名起义者分两批来到新加坡，随后又转往槟城、吉隆坡等地的工厂和矿场工作。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发展在华侨中的势力。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马来西亚国民党内的左倾势力被清除出党，在中共代表的协助下，马来西亚共产党在1930年成立，这支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党，后来成为马来抗日的核心力量。

出钱出力投身中国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马来华人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掀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保家卫国”行动的热潮。各华文报刊立即发表社论，声讨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华侨领袖及各华侨社团发表讲话，发出通电，拥护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开展反侵略战争。新加坡各华人社团立即集合，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德高望重的陈嘉庚被推举为会长，开展筹赈救灾行动。接着马来半岛各州槟榔屿、马六甲等也纷纷成立各州筹赈会。为加强东南亚地区华侨筹赈会的领导，统一协调行动，经各地华侨领袖协商，1938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了南侨筹赈代表大会，参加的有英属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暹罗、沙捞越、安南、缅甸、北婆罗洲、香港等地区代表160多人。大会通过决议，选举产生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21人的常务委员会，其中马来西亚占16人，是南洋筹赈总会的主力，陈嘉庚当选为总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办事机构设于新加坡。

1937年11月23日，马来西亚正在施工的日本人子弟学校的一百多名建筑工人实行无限期罢工。12月8日，柔佛州巴都巴辖大铁矿八百多名矿工大罢工。12月14日，丁加奴州日资甘马挽铁矿一百多名矿工无限期罢工。这些企业工人的罢工使日本老板蒙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各大中城市商贸行也配合工人罢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导致抗日战争开始后，马来西亚输入日货大幅度减少。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深入开展，日商在新加坡、吉隆坡经营的商店门可罗雀，纷纷倒闭。

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评述："各地（华侨）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从抗战爆发到马来半岛沦陷前的4年多时间里，南侨总会以义捐、认购国民政府战争公债、向国内亲友寄钱、捐赠药品、募集衣物等形式，为中国筹款达54亿国币之多，占全世界华人赈款的2/3以上。当时四万五千国币就可购军机一架，这些巨款填补了国内近半数的战争开支。据郁达夫主编的《星洲十年》引用的资料，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38年终一年半中，全马来华侨购买抗战公债和献金义捐合计共3270多万元，当时全马华侨总人口210万人，平均每人达15元，按当时物价及实际消费水平，足够一个人三个月的伙食消费支出，足见华侨的爱国热情。

1938年后，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部海岸的封锁，国民政府与缅甸英军合作，修筑了由缅甸通往云南的滇缅公路，但严重缺乏汽车司机与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南侨筹赈总会响应国民政府要求，号召华侨学生、工人回国参加汽车兵与工程兵，到滇缅公路投身抗日。1939年2月18日到9月14日，全马先后有15批共3192名热血青年，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驰骋在滇缅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估计有1000多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机工在修筑滇缅公路中牺牲。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后，华侨也是抵抗日军的重要力量。为肃清抗日力量，切断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资金和人力支持，稳定对新马的占领，日本决定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在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的策划下，制定了"肃清华侨计划"。

日军执行"肃清华侨计划"的方法是，先以盘查和发放"良民证"的方式，将华侨集中，然后集体杀害。凡是被日军"认定"的抗日华人，或被捆绑后推入海中淹死，或被活埋，或被毒死，或被集中枪杀，其状惨不忍睹。许多华人都被当作抗日分子杀死。日军几乎每攻占一个地方，都要进行类似的"验证"，致使槟城、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大中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华人蒙难。在日军进攻马来半岛和统治初期，

日军发动的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有新加坡大检证，吉隆坡大肃清，槟榔屿的两次大检举，马六甲大镇压等等。被屠杀华人总数在15万以上。此外，日军强迫马来西亚华人捐款5000万元（　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西亚货币单位），使他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

马来西亚目前拥有无数散落在各地的抗日纪念碑，最著名的是建于1948年的三保山“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义士纪念碑”。碑柱上刻着由蒋介石题写的“忠贞足式”四个大字。槟城州亚依淡附近还有一座马来西亚华人机工纪念碑。

中马建交，乒乓球牵线

经华人团体马华公会以及马来各界的努力，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向马国元首和首相发贺电，祝贺独立，但未得到对方的回应。11月6日，在马来西亚宣布承认的世界87个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列入其中。

抗战胜利后，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走向对抗，因为马共以华人为主且与中国有相同的意识形态，马方一直怀疑中国是马共的支持者，加之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两国的建交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马关系也出现了转机。为促成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是一位华人，他就是被人们誉为“马来西亚的基辛格”的曾永森。

与当年中美建交相似的是，中马建交也是通过乒乓球牵线。1971年9月，曾永森通过各种渠道，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封内容为希望加强中马体育方面交流的信函。当时中国也希望打开外交局面，于是借鉴中美乒乓外交的经验，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中国决定举办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据当时曾经参加过比赛的世界冠军梁戈亮回忆：“（当时）请亚非拉国家的乒乓球选手来，没有钱，我们给机票，还管吃住。在比赛中，我们还经常让球。”

1972年，时任总理署特别任务部长的曾永森，率领马来西亚乒乓球队到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曾永森后来回忆：“我感到两国的建交过程有点像青年男女刚谈恋爱一样，双方不便明讲，而是小心试探着对方的态度。”比赛后接见各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时，曾永森感到周总理与他握手时显得特别热情，就心想，看来事情正朝着大家期望的方向在进展。

曾永森回国后，经过斡旋和努力，使马方成功邀请中国代表团到马来西亚参加乒乓球友谊赛。1973年，在庄则栋率领下，中国乒乓球队赴马，两国的交往越来越紧密。

1974年5月31日，中马两国正式建交。马来西亚是东盟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四十年来，两国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出访马来西亚时，将两国形容成“隔海相望的邻居、真心相待的朋友、互利合作的伙伴”。

金色大厅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作 者:吕晗子





△/宋祖英金色大厅独唱音乐会的DVD封面

▷/清华大学附中金帆民乐团在金色大厅演出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维也纳金色大厅从神坛上重重地跌落下来。国人纷纷惊呼上当受骗！

“金色大厅是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楼里的普通演奏厅！”“当地华人对金色大厅的赠票不堪其扰。”“场租3万欧元，付了场租，只要你不把楼拆了，在里面干啥都行，还有舞龙舞狮队来这儿表演。”国内媒体对金色大厅展开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就连第一个吃螃蟹的宋祖英也在今年两会上表示自己开了个“坏头”，甚至敦促政府对后来者加以审核。“我们的艺术走出去应该代表国家水平，国家应该有一个规范，是不是国家能控制？用一个标准审批？”有媒体甚至讽刺地罗列，在近年去金色大厅演出的团体中“有无锡新区太湖花园第二社区老年笛子团这样的民间团体，也有温州房地产女老板包下金色大厅举办个人独唱……继专业乐团和歌手之后，由学生、中老年人组成的业余团和农民工、企业家组成的自high团，也纷纷登上了金色大厅的舞台。”

维也纳是欧洲文化交融的中心，本身就带有一种包容的气质。全世界，只有在维也纳才有圣斯特凡大教堂这样独特的教堂。该教堂朝西的正门是罗马风格，尖塔是哥特式，而圣坛是巴洛克风格。有人说这个历经四个世纪才最终完成的教堂就是维也纳的最佳写照。一个如此海纳百川的城市，又怎么会在意一心只想来打个酱油的中国歌者呢？

国内蜂拥而至的团体除了叫国人啼笑皆非，其实并未对金色大厅和维也纳人有一丝一毫的影响。人家开宗明义就说清楚了自己只是“音乐之友协会”的组成部分，从没刻意标榜过自己的清高。既然如此，来的都是客，完全没有摆谱的必要。有人将金色大厅比作国人的卡拉OK厅，也不是没有道理。一直以来金色大厅都并非只有“新年音乐会”那高端的一面。除了他们为了品牌经营考虑，出高价邀请一些“维也纳爱乐乐团”水准的团体来此演出之外，还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合同演出，门票分成，另一种就是如今被国内媒体冷嘲热讽的自费演出。这些都是一个商业演出场所非常常规的运营方式。

事实上，至今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都不曾邀请过任何一个中国团体或个人。换句话说，那些号称自己在金色大厅艳惊四座的报道都是演出者的自我陶醉。金色大厅接受良莠不齐的艺术团体是为了经营需要，而中国团体去金色大厅演出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这本来就是一个愿打愿挨的事。匪夷所思的是，控制自费演出的建议还是来自自费军团的鼻祖。

市场营销的经典案例

与其禁止国人，治标不治本，不如了解金色大厅、探究维也纳。读懂了中国人眼中的维也纳，方知国人的金色大厅情结因何而起，才好治愈。

金色大厅确实有近两百年历史，但它仅是伴随维也纳音乐之友协

会大楼一起存在的组成部分。1863年奥地利国王，著名的茜茜公主的老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将这块地皮拨给音乐之友协会建起了大楼。楼里一共有六个演出厅，分别是勃拉姆斯厅、木厅、玻璃厅、金属厅、石厅以及黄金厅，最后这个也就是如今被人们熟知的金色大厅。金色大厅与其他五厅并无高下之分，也许金色大厅这个名字听起来 “高大上”许多。不得不说，最早将“金色大厅”这一翻译引入中国的译者对于该厅日后在中国的名声大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仅仅是翻译家还不足以将金色大厅的人气推至今天的高度。金色大厅热与电视的发展息息相关。30年代末期，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在电视里播放影片和转播实况。金色大厅搭上了“新媒体”的顺风车。从60年代开始，金色大厅每年都会邀请以高水准著称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这里举办新年音乐会，并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转播。金色大厅由此声名鹊起。所有的演出场地都会邀请成名团体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新年音乐会”的构想无疑是各大剧院的市场营销案例中最成功的一个。有人批判金色大厅是一个人造的“音乐圣殿”，其实只能说，金色大厅的运营官成功地营造了高雅氛围。他们从未标榜自己有“音乐圣殿”的官方地位。如今，观众又怎能将自己的误读怪罪在金色大厅身上？

1987年，央视对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转播让金色大厅这个名字随着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交响乐一起深深地留在了国人脑海中。从此中国人不自觉地将金色大厅的水准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关联到一起，更增添了金色大厅的分量。

当然，自我包装并不是金色大厅的专利。一向善于学习的中国人很快了解了其中的法门。1998年，中国民族乐团在国内推手的安排下首次让民族乐“走向世界”，回国后更不忘大肆吹捧，经过这一次后，中国民族乐团的身价一下子涨了不少，升至20万一场。这个价格对于几个月前还为乐手工资发愁的“贫困”团体而言无疑是质的飞跃。只不过，在当时，自费去金色大厅的“秘籍”还未被更多人知晓，同行们也

只能望洋兴叹徒有羡慕。

但随着2003年宋祖英登上金色大厅，这个秘密一传十十传百，正式将金色大厅热推向巅峰。自此国内大小团体和个人，源源不断地前往金色大厅镀金。2013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称当年1月至8月中旬，国内各类团组在金色大厅共租用场地27场，至少有133个院校和团体参加了在这里举办的各类音乐会和演出。随着惊人数字的曝光，国内媒体对维也纳的过度报道终于也从最初一边倒的歌功颂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某娱乐媒体的采访时算过一笔账：“按照金色大厅3万欧元的租金，租一次能安排10个团演出，1个团人数按平均30人算，每人花一千元钱就能在金色大厅开唱了。这样一个欧洲多国游的10天团，费用大概在2.5万元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3000元。签证、机票、住宿、演出……旅行社提供一条龙服务，稍微有点经济实力的都能接受。”这样的说法相当于将金色大厅完全置于商业之上，有失公允。

诚然，一个每年能够承接800多场演出，并大量接受自费演出的地方并非高不可攀，但金色大厅在维也纳当地好歹也算得上是个拿得出手的演出场所。虽然，若要说权威性，它的确逊色于隔壁的世界四大歌剧院之一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但每一年国家歌剧院光是政府的直接资助就高达50万欧元，因此每年国家歌剧院的外租时间仅仅只有15天，且对于自费团体的演出类别和水准也多有筛选。金钱是节操的保障。一向自谋财路的金色大厅跟国家歌剧院比起来一下子就显得先天不足了。

维也纳真正的音乐圣地

至于“音乐圣地”的称号，恐怕这两个地方都谈不上。这仅仅是许多人一厢情愿的想法。维也纳真正的音乐圣地是维也纳中央公墓。那里安息着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父子等20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他们的墓碑紧紧围绕着维也纳人的骄傲——莫扎特。这位音

乐神童生于奥地利，死于奥地利。之所以有区别于其他大师的优等待遇，也许正因为他是为数不多完完全全属于奥地利的音乐家。漫步在开阔肃穆的维也纳中央公墓，很难不被音乐之都的灵魂震慑。

走出历史的尘埃，那些街道上的鲜活的维也纳人也无不透露着对音乐的热爱。一位维也纳大学的教授曾经调侃自己的同乡："就算明天买面包的钱还不知道在哪里，维也纳人也会在今晚穿得体体面面，去剧院买一张歌剧的站票。"音乐是维也纳人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除了剧院里正儿八经的演出，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遇到流浪艺人。他们或许是当地的大学生，也可能是音乐爱好者，更有苏联解体时从东欧逃难而来的落魄演奏家。在露天的咖啡店，为街角演奏的人送上十欧元和一杯咖啡，他会微笑着点头示意，甚至问你想听什么曲子，然后吹响自己的萨克斯风。而你就可以手捧着手中温热的咖啡，坐在桌旁倾听独奏。在维也纳，街头艺人与路人的关系并非是施舍与乞怜，而是一种平等的彼此欣赏和交流。无论是歌剧院里的听众还是路边驻足的过客都藏龙卧虎，或许对莫扎特的某一乐章倒背如流，也或许从记事起就与某个乐器形影不离。要让这些实力不容小觑的观众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演出者自然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多一份敬畏，更下一番苦心。维也纳的街头艺人，无论谈吐、气质、表演水平，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都堪称奇迹。

真正给金色大厅加分的，正是维也纳普通人的音乐素养。这个城市孕育了无数大师更滋养了普通人的贵族气质。人们将对音乐大师的崇拜和维也纳的音乐盛名、以及对欧洲古典贵族气质的向往难分难解地捆绑在一起，然后将这一切与金色大厅不自觉地画上等号。国人的盲目崇拜和自费者的虚荣成就了金色大厅昔日的美名与财路。

南锣鼓巷曾经的“高干社区”

作 者:解宏乾












南锣鼓巷导览图
鼓楼东大街
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
小菊儿胡同
寿比胡同
南
原荣禄之父的宅邸
前鼓楼苑胡同
菊儿胡同
顾孟余故居
原奎俊府邸
茅盾故居
原蒋介石行辕
黑芝麻胡同
后圆恩寺胡同
洪承畴府
水准点石碑
镶黄旗官学建筑遗存
锣
沙井胡同
前圆恩寺胡同
原索家的府邸
景阳胡同
秦老胡同
婉容花园
冯国璋旧宅
可园
多贝子府
中央戏剧学院北区
帽儿胡同
北兵马司胡同
达贝子府
齐白石旧居
鼓
中央戏剧学院
雨儿胡同
东棉花胡同
蓑衣胡同
板厂胡同
僧王府
巷
福祥胡同
炒豆胡同
通惠河玉河遗址博物馆
僧格林沁祠
地安门东大街



/ 南锣街景

2014年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的突然到访，让原本就熙熙攘攘的南锣鼓巷再次火爆了一把。北京有句老话：东城贵，西城富，穷宣武，破崇文。南锣鼓巷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自古都是达官贵人府邸、宅院的聚集地，其中不乏王爷、将军、总理、大臣，以及一些社会名流，堪称名副其实的“高干社区”。

1990年，南锣鼓巷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后，北京市东城区投入大量资金，对其进行多次整修和环境综合整治，希望它依托胡同、四合院的历史人文特色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必去参观的一景。如今，南锣鼓巷确实已经变得人声鼎沸，但历史中的胡同、四合院却已不复存在了。

之所以南锣鼓巷如此名声大噪，正是因为在这不到一公里长的胡同中，浓缩着北京这座古都七百多年的历史。

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

南锣鼓巷全长786米，南北走向，北抵鼓楼东大街，南至平安大街，始建于元朝。元大都位于现今长安街以北，复兴门、西直门以

东，北土城路以南，东直门、建国门以西，合围筑城，至今约740年。元大都内建起皇宫、皇城的同时，延续了唐朝时的里坊制，将全城以棋格状分割成50个坊。现在的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东大街，南边是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由这四条街围合的这块长方形地块，正是元大都的两个坊。以现在的南锣鼓巷为界，东面是“昭回坊”，西边是“靖恭坊”，南锣鼓巷是两坊间的分界巷。在元大都“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的城市格局中， 南锣鼓巷是“后市”的组成部分。元大都里坊构造在近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早已面目全非，但是南锣鼓巷地区却还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

明代时，北京内城被分为28坊，“昭回”“靖恭”二坊合并，称“昭回靖恭坊”，南锣鼓巷是该坊的南北中心线。清廷接管北京古城，采用的是以八旗“拱卫宸极”，汉民被驱迁至前门外南城，由八旗分区替代以拱卫皇城。皇城外东北域城区由镶黄旗拱卫，包括其中的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东西各有八条胡同整齐排列着，呈“鱼骨状”， 又如同一条“蜈蚣”。因此， 南锣鼓巷也称“蜈蚣巷”。从南向北，西面的八条胡同是福祥胡同、蓑衣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景阳胡同、沙井胡同、黑芝麻胡同、前鼓楼苑胡同；东边的八条胡同是炒豆胡同、板厂胡同、东棉花胡同、北兵马司胡同、秦老胡同、前圆恩寺胡同、后圆恩寺胡同、菊儿胡同。这些胡同名称是明朝以后逐渐演变来的。比如菊儿胡同，明代叫局儿胡同，后来改称橘儿胡同，清代宣统时才称菊儿胡同，延续至今。

南锣鼓巷之名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其一，此地多为锣鼓商，又地处北锣鼓巷之南，因而得名。而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就将此处称为锣锅巷。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有两种说法：一认为有驼背者住此，巷以人名；一认为此巷路面中间高，两端低，形如锣锅。后《清乾隆十年京城全图》，将“锣锅”改为“锣鼓”。民国后一直沿称锣

鼓巷。“文革”中一度改称“辉煌街”，后恢复原名。

南锣鼓巷的达官贵人

紧依皇城根的南锣鼓巷自然成为历代官宦贵胄的居住地。南锣鼓巷中，现今保存下来的历史最长的故居当属明末叛将洪承畴的宅院。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派遣时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即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集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与清兵会战。1642年洪被俘降清，助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洪承畴建议清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帝采纳，加以推行，并多次率兵镇压抗清义军。1658年，洪承畴与吴三桂、卓布泰攻陷昆明，平定云南。次年，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回京后，他所居住的正是现今南锣鼓巷59号的宅院。

洪府按一品大员豪宅规模建于清初，原宅大门在靠近前海的方砖厂胡同，后门在南锣鼓巷，占据黑芝麻胡同与沙井胡同之间的大片地界。岁月变迁，现已变成10多个独立四合院和平房大杂院。这“洪家大门”不合时宜地夹在南锣鼓巷临街的商铺之中，院内为洪氏家祠，仅存北房三间，闭门谢绝参观。

横跨炒豆胡同71号至77号、板厂胡同30号至34号的僧格林沁王府则是南锣鼓巷唯一一座王府级别的大宅。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军队的主干，僧格林沁大概算是满清最后一个彪悍征战的旗人将领。1825年，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先后参与对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等战争，军功卓著，加封亲王、食双俸。

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由原本的郡王府扩建改建成了亲王府。

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剿捻的激战中死于乱兵之中，终年55岁。其灵柩运回北京后，同治皇帝陪同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曾到府中祭奠。此后，家道中落，其曾孙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了“僧王府”。

该府中的51间房屋以10500块大洋被朱家买进，东所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1954年社会主义改造，政府以人口限制住房面积，朱家将大部分房屋被动出让给煤炭部，自家只留了16间半房屋的一个院落，即板厂胡同34号。此朱家仍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后人，著名史学家朱家溍便生于此地。

除此之外，皇太极四子辅国公叶布舒、大清最后一个皇后婉容、清末大学士文煜、“后党”的中坚人物荣禄、内务府大臣奎俊、清末将军凤山、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伪军司令张兰峰、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等清代及民国高官都在此居住过。这些老宅的保存并不完整，有些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早已面目全非。现在这些宅院多为民居大杂院以及一些政府办公机构，并不对外开放。

一条畸形的北京胡同

对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北京的大多数胡同在经过了“文革”的损毁，唐山大地震的洗礼后，都不再有太大的差异。只能通过一些残留下来的拱门砖雕、照壁、影壁、门墩等，还能够依稀感受到这里原有的辉煌。

“文革”期间，南锣鼓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毁坏，胡同里的门墩、牌楼、砖雕、女儿墙、石碑等均遭受到破坏，所受损失难有精确数据。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影响，大量房屋倒塌，道路受

损。南锣鼓巷中的很多居民也因自己房屋倒塌，而住进搭建的简易棚。房屋修好后，居民们搬回原来的住宅，但是临时简易棚没有拆掉，致使很多四合院的格局遭到破坏。

虽然南锣鼓巷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入选了北京旧城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而且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菊儿胡同主持设计的四合院还得了个“世界人居奖”，但没能打破这些大杂院中老北京人宁静的生活。穿行其中，夏天一棵棵繁茂的古树将整条胡同都笼罩在树阴下，树下一些乘凉的老人下着象棋，邻里间客气且亲切的问候，时不时还有一阵阵鸽哨声飘荡其间；冬天，一根根铁皮烟囱从窗户或房檐伸出来，长的不过一米，短的只有十几厘米，冒出浓浓的白烟，透过结满冰霜的窗户，都能感到屋中的温暖；不时一辆自行车骑过，清脆的车铃声驱赶着追逐嬉戏的半大孩子。

2000年后，南锣鼓巷的南端，围绕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率先出现了一些在院落中经营的小酒吧、咖啡馆，坐在安静整洁的小院中，聊聊天、喝杯咖啡，确实是件很惬意的事。

让人没想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地富有商业头脑的人们便盯上了南锣鼓巷这片“棋盘式”格局的四合院建筑群落，很多民居一夜间成了商铺。2006年开始，东城区政府更是斥资三亿，对南锣鼓巷进行修缮，还铺设了一条仿古石砖路。使这条百年来幽静的老巷，彻底变成了人声鼎沸的商业街。

无论是从鼓楼东大街的北口，还是从平安大街的南口，一进入南锣鼓巷，便是人挤人黑压压一片，两旁商铺林立，但几乎和游客们慕名而来想要见到的老北京文化全无关系。吃着泡芙、奶茶、章鱼丸的外地游客们，满眼充斥的都是早已被符号化的廉价旅游纪念品。几乎所有名宅大院，也被稀奇古怪、不中不洋的店铺招牌所包裹。

据说，南锣鼓巷的租金几年来几乎是一年翻一倍，一间二三十平

米的小门脸房，租金每月都在三四万左右。以至于原本这里的老住户都成了房东，一间间临街的老房子，现在都成了摇钱树。

胡同中的人不在了，宅院也不见了，京腔京韵更是听不到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为发展旅游而复制出的商业景区。

吴中木渎乾隆六下江南必游之地

作 者:淮宸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籍的宫廷画家徐扬完成了一幅全长12.41米的巨幅画作《盛世滋生图》。此画又名《姑苏繁华图》，以散点透视技法描绘了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以赞乾隆盛世。这幅继宋代《清明上河图》后的又一宏伟长卷，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而《姑苏繁华图》中，竟有一半篇幅画的是吴中木渎之景象。这座与姑苏城同龄的古镇，在明末清初时，成为阊门外一个万商云集的重要商埠，也一直是苏州灵秀宁静的文化后花园。乾隆六下江南，唯有木渎让他六次驻跸，与老师沈德潜吟诗唱和，与江南士子茶棋相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

江南唯一园林古镇

木渎是一个沿用千年的古地名，可追溯到吴王夫差的年代。继“灭吴七术”的美人计后，越王勾践又向吴国进贡大量的巨木奇石，企图让夫差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夫差果真在灵岩山上为西施建造了一座宏大的离宫别苑“馆娃宫”。由于工程浩大，越国进贡的木材从水路源源不断运来，竟堵塞了山下所有的河道，以致“木塞于渎”，木渎之名由此而来。

木渎历史久远，但开发稍迟，1998年刚开始保护修复古镇时，周庄已经叫响了“中国第一水乡”，甪直号称“神州第一水乡”，同里则以“江南醇正水乡”自居。在水乡古镇大同小异的面貌、越来越同质化的竞争中，木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江南唯一的园林古镇。

木渎开苏州园林之滥觞。据方志记载，仅明清之交，镇上就有30

多处私家花园，至今仍存留了10余处，主要分布在西街、山塘街和下沙塘。虽不及苏州拙政园、留园的知名度，但绝对能算作江南私家园林中的小家碧玉，山水风光自有其含蓄精致。目前对外开放的园林有五处：严家花园、虹饮山房、古松园、榜眼府第和灵岩山馆，每个背后都极有故事与历史。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举行，著名文物古建专家罗哲文、郑孝燮等人，称赞木渎古镇的私家园林："这才是真正的文化遗产。"

严家花园的前身是乾隆的老师、《古诗源》编者沈德潜的寓所灵岩山居。乾隆南巡时至此，与主人沈德潜一起吟风咏月，还亲手种下一株玉兰树。1828年，沈氏后人将此院落出让给诗人钱端溪。钱氏叠石疏池，筑亭建楼，将其命名为端园，与自己的另两处所潜园、息园并称钱氏三园。端园北瞩天平山（范仲淹祖居处），近观灵岩山（即馆娃宫所在地），大有极目骋怀之趣。园虽小而构建颇精，五彩砖砌地花，蹊径曲折，有迷宫之谓。第三进的尚贤堂，为苏州罕见的明式楠木厅，迄今已有400多年。

历来文人墨客为它题咏颇盛，龚自珍就写下"妙构极自然，意非人意造"，"倚石如美人"等溢美之句。潜园、息园1860年毁于兵焚，惟端园尚存，于1902年被木渎首富严国馨买下，大加修葺，更名为羡园，别称"严家花园"。严国馨之孙是担任过台湾"总统"的严家淦，他就出生在此园中。他顾念故园，后出重资修缮，修旧如旧，再现往昔风貌。有多部电影、电视剧都曾在这儿借景拍摄。

虹饮山房的主人徐士元是个落第秀才，买卖经营得不错，在他的精心营造下，山房逐渐被打造成木渎最为大气的园林。其由秀野园和小隐园两座明代园林联袂而成，中路为门厅、花厅和古戏台，建筑体量宏大宽敞，房与房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既得江南园林之秀丽，又兼北方园林之大气，加之"溪山风月之美，池亭花木之胜"，难怪乾隆每下江南必到此游赏。

徐士元为人爽朗，常呼朋引伴在园中诗酒为乐，因酒量极大，被刘墉戏称其为“虹饮”，山房因此得名。如今可见的匾额由刘墉当年所题。园中的二层古戏台飞檐翘角，俨然立于中庭，台前是一片开阔的空地，两侧连以廊庑，应是当年皇帝和臣僚们品茗听戏之处。据说乾隆一时乘兴，还会在戏台上舞剑助兴，与众同乐。每每夜色降临，乾隆才依依不舍，顺着门前的山塘御道，返回灵岩山行宫。虹饮山房因而被当地人戏称为“民间行宫”。古戏台现在仍对外演出，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现场细品一曲昆曲，婉转悠长。

品美食赏苏绣

除了赏心悦目的山水园林，木渎的美食之富，让人声色愉悦间，兼得身心之饱足。到木渎，不可不尝中华老字号的石家饭店。石家饭店始创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该店善用太湖淡水鱼鲜烹调，历经数代，形成了以十大名菜为主的独特菜肴体系，世有石菜之誉。1929年秋，于右任夜泊木渎在石家饭店小酌，连饮三碗招牌鲃肺汤，兴之所至，挥笔题诗：“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此事为上海《新闻报》记者闻知，翌日便见诸头版，于是乡间土肴和木渎石家饭店一时声誉鹊起。黄金荣、杜月笙每次游太湖，都要光顾于此，李宗仁还曾为饭店书写“平等博爱、与民同乐”的题词。

另一家中华老字号乾生元，历史更早，始创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生产枣泥麻饼蜚声海内外。据说乾隆住灵岩山上行宫时，每天总听到寺里和尚的念经声，一天忽而诵经之声中断了，查问起来，原来是镇上的麻饼刚出炉，甜香四溢，惹得和尚没了心思念经。乾隆好奇买来一尝，果然香气可口，唇齿留香。传说只是传说，但木渎的枣泥麻饼确被列为清廷御膳点心，深受青睐。当地的农家土菜、太湖三白“船餐”，用木桶特别烧制的藏书羊肉，皆已成为苏州地道生动的美食名片。

苏绣名列中国四大名绣之首，木渎则是苏绣的发源地之一。清末刺绣皇后沈寿就是木渎人，其故居至今保存完好。1911年，她绣成的《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轰动该国朝野。之后的传承者，当代刺绣大师顾文霞、李娥英均是土生土长的木渎人。如今苏绣第三代传人姚建萍，在木渎专门建有刺绣艺术馆，那绵密针线间传达出的巧妙与智慧，让人一饱眼福。

身在木渎，往往感到震撼的是，空间里深蕴的历史人文信息之密集。2010年，“苏州木渎春秋城址”的发掘入选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吴文化的悠久灿烂又添厚重一笔。粉墙黛瓦，曲水流觞，漫步驻足间，白居易的诗句跃上心头：能不忆江南？

年历

16

1964年4月

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塔城等地活动，煽动中国边民外逃，新疆伊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和交涉，苏方拒绝允许被胁迫出境的中国边民返回中国境内。

17

1814年4月

清朝官修唐人总集《全唐文》编撰完成，收录唐朝、五代十国文章近两万篇。嘉庆年间，由文华殿大学士董诰领衔107名学者编校成书，并成为研究唐朝文学与历史的重要典籍。

18

1944年4月

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为挽救驻扎在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日军从河南发动了向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新的进攻。此役中国损失了60多万军队，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

19

1824年4月

年仅36岁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逝世。因为继承了男爵爵位，也被称为“拜伦勋爵”，代表作品《唐璜》。拜伦在诗歌中塑造了一

批“拜伦式英雄”，自己也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

20

1934年4月

经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合发起，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由宋庆龄任主席。该会制定简章，呼吁全体总动员武装进行抗日斗争，并发表了由1700余人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21

1944年4月

法国赋予50岁以上的妇女选举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男性公民普选的国家”，法国妇女获得这一权利却晚了近一百年。

22

1724年4月

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诞生。诗人海涅评价，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他的生活平淡规律，深居简出，未曾踏出出生地半步。

23

1974年4月

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尉官运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统治葡萄牙长达40多年的极右政权，确立了“多党民主制”，被称为“红色革命”。

24

前1184年4月

希腊发动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沦陷。在1871年其遗址被发现前，特洛伊一直被视为虚构的城市，存在于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

25

1904年4月

英美勾结，诱骗2000名华工，贩往南非。早在18世纪中叶，就有中国人到南非好望角做工，但是每年从未超过100人。

26

1954年4月

苏、美、英、法、中5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召开，讨论了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

27

1994年4月

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平等民主选举，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选举中获得了62.65%的选票，首次取得执政权。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

28

264年4月

刘禅被册封为安乐公后，获晋王司马昭设宴招待。宴席上的歌舞充斥着蜀中特色和哀婉的亡国之音，蜀汉降臣都很伤感。惟独刘禅无动于衷。几日后，司马昭问刘禅：“是否思念蜀地”，刘禅不假思索地说“此间乐，不思蜀”。成语“ 乐不思蜀 ”便出自于此。

29

1954年4月

这一天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提出。

30

1984年4月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美国正式接受美全国科学院授予的外籍

院士称号，他是美国全国科学

院120年历史上获得这个荣

誉称号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

自学成才的华罗庚，是中国

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等很多

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

科特·柯本逝世二十周年“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作 者:解宏乾



/ 涅槃乐队成员（左起）吉他手兼主唱科特 · 柯本、贝司手奎斯 · 诺沃斯里克、鼓手戴夫 · 格罗尔

第一次从五道口卖打口带的大哥嘴里听说“涅槃”（Nirvana）时，我还是个刚刚初中毕业、乳臭未干的半大孩子。回去抱着《新华字典》一通猛翻，见到释义中对于这个佛教用语的阐释，看得我更是云里雾里。听过那张名为《别介意》的专辑之后，我迷上了它。

不过，此时这支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之一的“涅槃”，早已在1994年4月5日，伴随着主唱科特·柯本射向自己太阳穴的一枪，而宣告解散了。在一些人看来，年仅27岁的科特，用他短暂的

一生为摇滚乐制造了一个永恒的神话。与此同时，他也被这神话所吞噬。

诞生

1967年2月20日，科特·柯本出生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一座名为阿伯丁的小城，距离西雅图不到一百公里。与很多摇滚乐手一样，他的童年并不幸福，且很早就展现出不同寻常的艺术天赋。小学二年级，他的画作便登上了校报的封面。小学三年级时，科特开始学习打鼓，想当一位摇滚明星，崇拜林戈·斯塔（披头士乐队鼓手）和列侬。14岁生日的时候，科特的舅舅送给他人生中第一把吉他。练琴一个星期左右，刚学会弹“ACDC”乐队的《回到黑暗》，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写自己的歌了。

父母离异时，科特年仅8岁。他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写下：“我恨妈妈，我恨爸爸，爸爸恨妈妈，妈妈恨爸爸，这真让人难过。” 此后，科特的父母分别成立了新的家庭，也减少了对科特的关心和管教。科特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小孩。上高中之后，他像许多美国中学生一样学会抽大麻、逃学，与身边的人难以交流，更不愿屈从于父母对他的期望，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听音乐和画画，摇滚乐成了他内心中苦闷与挣扎的出口。

1985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科特，在美术老师的帮助下，获得了两所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决定退学，去追寻他的音乐梦想。这让他最终被母亲赶出了家门。科特被继母收留后，父亲希望他参加海军征兵考试。科特的考分极高，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放弃，一个星期后从父亲家搬了出来。

无家可归、四处游荡，躲在阿伯丁北桥桥洞过夜的日子里，科特终于结识了第一个与自己同龄的摇滚乐团成员——“讨厌鬼”乐队（the Melvins）的麦特·卢金，此后又认识了乐队领军人物巴斯·奥斯本。“讨

厌鬼”是后来席卷全球的“邋遢”（Grunge）之风的真正创始人之一，正是他那融合了朋克、70年代的硬摇滚和无产者重金属的革命性乐风，为西雅图、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新一轮摇滚风潮注入了活力。

1985年底，科特在讨厌鬼乐队麦特·卢金和戴尔·克罗弗的帮助下成立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取名“臭大粪”（Fecal Matter）。也是在“讨厌鬼”的排练场，科特结识了奎斯·诺沃斯里克，他是科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两人童年经历惊人的相似。他们如同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见如故。自此，他们一起痴迷朋克乐，苦读从无政府主义到动物权利的种种著作，追捧“黑旗”、“弹弓”之类的乐队。

奥林匹亚距阿伯丁不过五十公里，但对科特而言，两地的区别如同天堂与地狱。这个华盛顿的州府所在地，由于众多摇滚青年的聚集，成为了美国地下音乐发展的圣地。科特的第一次现场演出便是在这里的GESCCO礼堂。

科特的乐队在一些小范围的演出中，逐渐也得到了一些乐迷的认可。在此期间，科特曾给乐队起过很多名字，最终选择了“涅槃”。他曾解释说：“我想给乐队起一个非常优美、动听、可爱的名字，而不是那种浅显、直露的名字，比如‘愤怒的萨摩亚人’之类的。我想要个与众不同的东西。”

涅槃，原意是指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指宗教修行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佛教建立后，将其吸收进自身教义中加以阐述，认为众生既受烦恼、欲望等诸苦的折磨，也受生死业力的束缚，涅槃就是对烦恼、欲望、生死诸苦的最后的断灭。众生通过宗教修行实践，可以获得涅槃的境界。 不久后，科特便率领着他的“涅槃”乐队，获得了他摇滚追求的涅槃。

青春

1987年，科特因为几个月没交房租再次被赶了出来，他搬进自己

第一个女友崔茜·马兰德的小屋。除了排练、练琴，他常常数天足不出户，在家中制作一些迷幻效果的磁带或是雕塑作品，但更多的还是画画。他的画作充满夸张的想象，常常会出现荆棘丛中的婴儿这类场景，可以看出那是科特的自我写照：无助的苦儿在遍布敌意的世界里孤苦伶仃、四处飘零。但是，为了筹够钱为乐队录制一盘像样的小样，科特不得已还是出去打工了。

1988年1月23日，“涅槃”乐队成功录制了第一盘小样，也因此被刚刚创立Sub Pop唱片公司的布鲁斯·帕维特和乔纳森·庞曼看重，并为他们制作发行了首张单曲《情话/大人物》和首张专辑《漂白粉》。从一开始，科特就有一种故意看轻歌词创作的倾向，他承认《漂白粉》中的歌词大都是急就章，但这恰恰说明了他是个天才的诗人，《漂白粉》中很多歌的歌词都很短，但却展现了一种警句般的光彩。

《漂白粉》于1989年6月正式发行，在短短几个月便卖出了三万五千张。1989年6月9日，“涅槃”同“泰德”、“密浆”一起参加了在西雅图摩尔剧场举行的“Lamfest’89”演出，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地下乐队还从来没能占据过如此巨大的演出场所，它标志着“西雅图之声”（即邋遢摇滚）开始真正浮出水面。

期间，“涅槃”分别在美国西海岸和欧洲开始巡演。此时，谁也无法阻挡“涅槃”这一新的声音去震撼世界。长期以来，美国的独立音乐一直是被东海岸的电台、俱乐部、歌迷杂志所操纵，大学及艺术院校的背景更是必不可少。但“涅槃”却代表着一股新生力量，他们没上过大学，但同样极富创造力、才华横溢、而且少有书呆子气。

1991年5月，“涅槃”开始录制新专辑《别介意》，其中便包括那首后来让全世界深受感染的《少年心气》。在著名乐评人郝舫的《灿烂涅槃》一书中，他曾如此评价《少年心气》的意义：“它标志着摇滚乐的又一个新开端。青春永远的无奈与愤怒，不是一个全新的信念，但在90年代，只有科特才把它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此地让人

回肠荡气。”

1991年9月24日，《别介意》正式上市。一个月后，它已成为金唱片（售出50万张），11月冲破白金唱片销量（售出100万张）。这样的成绩，对于非主流音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1992年1月11日，这张专辑已然成为排行榜的冠军，超过了U2的《注意宝贝》、“枪花”的《运用你的幻觉》，并且把迈克尔·杰克逊的《危险》也挤下了台。在此前后，它还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加拿大、瑞典、爱尔兰等诸多国家成为榜首专辑，在全世界其他主要市场也全部进入了前10名。不到三年，它在全世界的销量超过一千万张。

毁灭

早在第一次美国西部巡演时，科特便被剧烈的胃痛折磨得痛苦不堪。《别介意》发行后的欧洲巡演过程中，场场爆满的演出，无数镜头的追逐，让科特不胜其烦，他的胃痛也愈演愈烈。有时，当胃痛发作时，他甚至满地打滚，不停呕吐。

为了不让自己疼死，科特为自己找上了别的方式。“我决定还是活活看。即使我要自杀，我总不能以胃疼这个蠢笨的理由为借口吧，于是我决定立即使用让一切过量的方式。”科特沾染上了毒品。很多人都认为，胃痛其实是科特为吸毒而找的借口。他也承认吸毒后有点莫名的快感，但终其一生，他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为此而吸毒。

此时，科特早已同崔茜分手，且在洛杉矶录制《别介意》时，结识了柯妮·拉夫。柯妮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曾经加入过诸如“玩具城的宝宝”和“信仰破灭”等之类的乐队，还曾在亚历克斯·考科斯的电影《希德和南茜》中扮演南茜。1989年，柯妮组建了“洞穴”乐队。

二人结识不久，科特便迷上了她。随后，柯妮也同科特一起沾上了毒品。二人在洛杉矶租了一套高级公寓，每天科特都会从几个固定的供货人手里搞到“药”，除此之外，他们就在家听音乐、画画、弹吉

他、看电视。没想到，这样安稳的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1992年1月中旬，柯妮发现自己怀孕了。

不久，他们就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无数对于他们道德上的谴责接踵而至。柯妮坚称，她如果知道怀孕了，是不会如此胡来的。她后来说：“我那时是个白痴，可我并不是道德败坏。”他们打算要这个孩子，并咨询了畸胎专家，专家告诉他们，吸毒无疑会对下一代有害，但如果尽快戒除的话，对胎儿的形状影响不会太大。这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留下几分畏惧。随后，他们在一位医生的监督之下住进了假日酒店，严格按照戒瘾程序开始了疗程。

1992年2月24日，在科特巡演到夏威夷时，他们举行了婚礼。婚礼在一处可眺望海滩的悬崖上举行，新娘穿着一件旧绣花衫，新郎则穿着一件大睡袍，人人都按夏威夷式礼俗戴上了花环。

戒毒后，为了对付那已然顽固的胃痛，科特在巡演时常常会准备许多美莎酮药片，这是一种二战期间德国合成的替代吗啡的麻醉性镇痛药。但其实不久后，科特便再次沾上毒品，直至最终被拖进了无尽的深渊。

《名利场》杂志在1992年9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柯妮的专访。文章中不但处处暗示是柯妮让科特沾染上毒品，且称柯妮具有“毁灭性的性格”，在得知自己怀孕之后，还在吸毒。起初，科特对此并不在意，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困扰。

1992年8月19日，柯妮平安生下一个女婴，这似乎让一切谣言不攻自破。但没想到，女儿弗兰西斯降生后两周，科特夫妻就被洛杉矶地区儿童福利部起诉，剥夺了他们的监护权。科特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阴谋，“这是想拿我们杀鸡儆猴，因为我们支持一切反叛美国娱乐界的东西。福利机构对《名利场》文章照单全收一字不漏，还找来了柯妮怀孕早期的所谓尿样报告作为证据，要把我们的孩子抢走。”

自此之后，有关科特夫妇吸毒的文章被媒体大肆刊载，其中不乏狠毒与离奇的编造。柯妮分娩的医院，甚至将她的医疗记录擅自卖给了《洛杉矶周报》，以至于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

空前的成功与显赫的名声给科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此时的“涅槃”乐队，似乎也要各奔东西，他们都已经表达过想要录制各自作品的打算。1994年1月28日，“涅槃”乐队最后一次走入录音棚录制作品小样。此时的科特因为胃痛的折磨、长期服用麻醉性的镇痛剂而骨瘦如柴，身高1米74的他体重只有55公斤。

3月5日，科特在巡演到罗马时，因服用一种叫作“罗伊普诺”的药物而昏迷，后来医生从科特胃里找到了近50粒药片。据说，这种药可以起到安眠的作用，也可以用来治疗严重的抑郁症，戒除酒精中毒或代替美莎酮用作戒瘾药。

此后，科特又成了各种娱乐媒体的关注对象。人们纷纷传言说，“涅槃”已经解散，科特又一次昏迷不醒。这时，全世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步步紧逼将失去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大众满足了自己内心的好奇，却都忽略了科特曾无数次表露出的忧郁、惊恐与痛楚。4月5日，科特在华盛顿湖边的住处里，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傻子发出的声音，他其实更愿做个柔弱而孩子气的诉苦人”，他身旁的桌子上，有一张用红墨水写就的遗书，一支钢笔扎在了遗书上。他用这种最有效且最震撼的方式，最后向世界宣告，“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所以要记住，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至今，每年都会有新的年轻人开始听“涅槃”的音乐，科特早已成为摇滚乐队的试金石和标杆。他具有永恒的人气，就像是青少年时期的一种仪式。

《我的家庭回忆录》拒绝遗忘和回避钱理群：出书本身是一种赎罪

作 者:解宏乾


/ 钱理群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


/ 钱理群大姐（右一）和外祖父、舅舅、舅妈们在一起的合影



/ 钱理群在父亲铜像前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著有《心灵的探寻》、《人之患》、《漫谈文化》等

“对我而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是纯粹抽象的学问，而是有一种生命的体验在里面。”钱理群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时

如是说。不久前刚刚出版的《我的家庭回忆录》是《我的精神家园》的续篇，他把这本书称为“私人悼亡书”。书中展现的钱氏家族成员坎坷曲折与探索奋斗的人生经历，也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的缩影。

不同于其他回忆录，“我对形象、细节的记忆能力不是太强也是我的一个弱点。所以我的这本回忆录是带有一定研究性质，以我的家庭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以至于会有很多思辨、总结性的语言。”钱理群表示，他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家庭的影响使得他能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去看待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消失在记忆中的父亲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先生在中国大陆曾经被遗忘，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他的名字才出现在大陆出版的《中国科学专家传略》里，被誉为“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钱天鹤于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公费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攻读植物育种。学成归国，在国民政府先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经济部农业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联合国粮食组顾问、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业组组长。

钱理群的外祖父项兰先生是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创办了安定学堂，对浙江的现代教育、报刊、交通、银行事业均有开创之功。由于不满国民党的专制、腐败，项兰的子孙纷纷投身革命。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钱理群的七位兄长和姊妹也几乎均为知识界、文艺界名家：大哥钱宁是水利专家，曾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研究员、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渠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三哥钱临三曾是国民政府外交官；四哥钱树柏是多年来为党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最小的哥哥钱匡武是长期

从事金属材料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授；大姐曾是当年上海国际饭店的会计，后来到水利科学院做了图书管理员；二姐钱树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演员、创作员。

世事难料，特殊的时期，不同的政见和立场，造成了钱氏家族至今难以愈合的伤痛。

1949年，钱天鹤原打算一家人经广州飞往台湾，没想到却遭到了妻子娘家人的反对，最终只身到了海峡的另一边，把妻子和年龄最小的三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洞洞的大楼房里。自此，夫妻二人天各一方，直至去世再没有相见。这让当时年仅10岁的钱理群对于父亲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一片。

父亲身为国民党高官，出差公干是很平常的，很少有时间关心家里的事情。钱理群记得，一家人也没有把父亲的这次出行看得多么重要，“既然娘家人反对，母亲就说，先留下来等一等、看一看，让我父亲先去探探路。没想到，这却成了诀别。”也许是年近八旬的钱理群老人对于儿时的记忆模糊不清了，或许是对于常常出差的父亲拎着箱子远行的情景早已司空见惯了，在钱理群的记忆中，并没有送行的场面。

直至今日，他对父亲唯一的记忆，便如书中所述：“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细嚼慢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从此，父亲的形象几乎从他生活中消失了，仅留下母亲房间里父亲的巨幅肖像。

埋葬记忆中的父亲

“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钱理群在书中如此记述。

1949年后，年幼的钱理群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像变了个人似的，原本乐观开朗的母亲，却整天一脸愁容，寡言少语。还是家中的女佣悄悄告诉他，由于家中父亲的肖像，让当时在南京团市委工作的四哥因为“与国民党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不久，这种精神上的威压也降临到了钱理群的头上，加之母亲死一般的沉默，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整个家庭。

1953年，刚满14岁的钱理群提出“入团”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他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他永远都忘不了他的入团介绍人当时对他严肃地正告：“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他多次望着挂过父亲画像的白墙，抗击着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他甚至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

但最终因为不能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钱理群被下放到了贵州安顺。在他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也成为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但没想到，“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的箱底翻出了这张照片，他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让钱理群不得不低头认罪。以至于，后来学校革命师生为其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他时，他几乎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直到听说，1972年父亲

在台北去世的消息，他才猛然醒悟，“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全部的爱和期待……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母亲的沉默

相比远在台湾的父亲，钱理群的母亲作为一直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虽然没有过事业上的辉煌，但解放后她所展现出的坚韧和忍耐，并非常人能做到。

钱理群的母亲是杭州维新派实业家代表项兰的长女，从小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用钱理群的话说：“母亲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虽然没有外出工作，但把一家人都打理得很好。也许有人会误会，作为国民党高官，家中一定锦衣玉食，其实不然。

“我父亲是非常廉洁的，我家又有八个兄弟姐妹，因此我母亲这个家是很难当的，”钱理群解释道。他记得儿时的一件小事儿。每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就很紧张。因为过年时会有很多人来拜年，她就要给别人的小孩子压岁钱，这对钱家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所以，别人给钱理群兄弟姐妹的压岁钱，刚拿到手里就会被母亲收去，用这些钱再去应付来拜年的人。即使家中并不富裕，但母亲却非常乐观开朗、热情好客。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钱理群的母亲一夜间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以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母亲却能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并且从此不与任何人，包括她的子女，谈论父亲。

解放初期，钱理群的父亲每月都会通过香港的朋友给大陆的家中

寄钱。到1955年大哥钱宁回国后，在母亲的授意下，这种联系彻底断绝了。60年代，在美国的三哥钱临三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母亲断然拒绝。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上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原来为了怀念，在逢年过节时多摆出几副碗筷的仪式，后来也取消了。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一切人，对她提出的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款捐物，到大跃进捐铜捐铁，她都一律响应。居委会要求借家中的汽车间举办学习班，全家人都不赞成，母亲毫无二话地答应了，还去旁听，学唱革命歌曲。后来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她将家中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凡有争执，母亲无不退让了事。

1949年后，母亲的很多做法，都让包括钱理群在内的几个子女不能理解，觉得她过分小心，甚至过于软弱。但母亲总是不作任何解释，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编织毛线，缝补衣物。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平安度过。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为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依然织作不歇，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虽然，大哥钱宁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最后，钱家居然逃脱了抄家之灾。后来钱理群才知道，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母亲。

1974年，母亲因身体衰弱病倒，钱理群从数千里外赶回来探视。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断断续续地说：“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

这让钱理群猛然一震：在这历史的大风暴中，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自己的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

钱母至死仅保留着她与父亲结婚时的一张照片。远在台湾的钱天鹤也终身未再娶妻。

拒绝“遗忘”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一篇篇文章被从尘封的报刊里发掘出来，钱理群对父亲的形象由模糊逐渐清晰。但他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遗忘’——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怪事为什么会在20世纪屡见不鲜？……同时涌上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面对遗忘，我应该作怎样的精神的承担？……我常常为此而惶惑不安，即渴望着出书——如我一位哥哥所说，这本身既是一种赎罪；却又恐惧于出书——它的每一页都将展示我的被扭曲的灵魂与狭窄的学术眼光，使我无地自容，无论作为人之子或者学者……”钱理群在书中如此写道。

《我的家庭回忆录》中，钱理群不仅对亲人做了深情的刻画与回忆，同时见证了彼时中国社会的变迁，更用理性的视野灌注了自己的深刻反思。起伏不定的历史进程中，钱家个人与家庭命运与之休戚相关，由之受到的影响，甚至心灵的烙印，在钱理群的笔下亦不动声色地显现着，引人深思。

政治家、历史学家们经常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在各个场合谈论20世纪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的历史，但却很少有人关注这段历史对于参与其中或受到牵连的个人与家庭的影响。在钱家的反应是，夫妻、儿女、兄弟姐妹至死的离别，至今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作为家中最小的成员，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钱理群表示，“国共两党在不同时代都吸收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但也都各有各的经验教训。这就决定了我的价值立场，我对两党都抱有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同时也注意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教训。我对于这一百年的认识是比较复杂的，虽然我这样的立场不容易得到中国知识界的认同，很多人的态度都是非此即彼的。”

“我们在回顾、总结历史时，最需要追问的，正是长期支配我们行为背后的基本观念、历史观、伦理观等等。面对这样的对前提的质疑，需要的是正视的勇气，理论的彻底性，而绝不能遗忘与回避。”钱理群在书中郑重说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家庭回忆录》正是一部拒绝遗忘和回避的勇气之作，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群游走中西的艺术“剑客”

作 者:蒋波



/ 朱德群为妻子董景昭画的肖像

朱德群描绘了一个只存在于他画中的国度，一个既是想象又是真实的国度。它源自画家一生中多次体验过的感动，联系着他记忆中的中国

“人生满是屈辱和痛苦，一切将人生和幸福联系起来的线索都先后一根根地在人类的手里断掉，尤其是金钱这根线索”，在《三剑客》中，法国文豪大仲马一针见血地写道。金钱本应给人类带来幸福，可是在很多人那里却变成了奔向幸福道路上的“绊脚石”。

“作品天价，与我无关！” 作为“留法三剑客”（另两位是赵无极、吴冠中）中的最后一位大师，朱德群却对此毫不在乎，“凡·高去世之前只卖了一张画，价格很便宜，现在他的画则价值连城，对艺术家而言，作品本身并没有改变。”这位在2014年“胡润艺术榜”中排名第二的艺术家，年度作品的总成交额已超过2.8亿元人民币。3月26日，这位94岁高龄的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在法国巴黎溘然长逝，空余世人太息掩泣。

颠沛

1920年12月3日，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白土镇，隆冬的淮海大地一如既往的寒气逼人。一个叫朱德萃的男婴选择这一天降临人世——这是一个诗礼之家，当医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传统书画的忠实拥趸，幼年的朱德萃也因此有机会接受中国画的水墨滋养。

很快，朱德萃进入县立小学读书，课余跟着堂兄练书法。他没有按照堂兄的既定要求从楷书练起，而是直接写起草书。朱德萃激越奔放的个性，如纸张上肆意挥扬的墨迹一样，孩提时便可见一斑。

朱德萃到徐州念中学，他身高马大，老师建议他考体专。可倔强的朱德萃不干，15岁时就决定报考杭州国立艺专。为此，尚没毕业的朱德萃只得借来堂兄的毕业证，并冒用他的名字报名考试。怎料朱德萃一举高中，从此后，他只得将错就错，借用堂兄的名号——“朱德

群”继续深造。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所坐落在西子湖畔的学校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艺术院校之一，由留法归来的林风眠先生主持筹建。林风眠在此践行他“艺术之眼光当不能以国门为止境”的思想，因而拥有留法背景的吴大羽、刘开渠、雷圭元等教授，和潘天寿、郑午昌等一批学养深厚的中国画教授共聚一堂，一时人才济济。正是这种中西合璧、有容乃大的教学法，让稚气未开的朱德群大受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在杭州艺专，朱德群遇见了正在军训的吴冠中。当时杭州各高校集中军训，朱德群个子高在排头，吴冠中矮小被分到排尾。每次做完操后，朱德群就跑到排尾归列，朝夕相处中，二人很快熟悉起来。当时吴冠中学电机专业，但他却对绘画抱有很浓厚的兴趣，为此颇为苦闷。在朱德群的鼓励下，吴冠中决定放弃本专业，并凭着自己的能力成功考入杭州艺专。多年后，吴冠中每每提及此事时，总会说：“如果没有朱德群，就没有画家吴冠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之大，却再难放一张安静的画桌了。朱德群随校西迁，一路颠沛流离，漂泊西南山水间。艰难顿阻，抑或是物质资源的短缺，都没有让朱德群放弃在艺术事业上的狂热追求。最终，胜利号角吹响全中国，此时的朱德群以中央大学建筑系教师的身份随校东归，过三峡、经武昌、万里长江、烟云浩瀚。“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朱德群在群山万壑、松石峻崖间，对范宽、李唐等人画作“师法造化”的山水意境顿生觉悟。

多年后，朱德群仍坦言，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所表现的磅礴气势对其艺术创作有极大影响，“中国的绘画最接近抽象画，中国宋代的范宽、李唐或其他画家，他们笔下的山水，与真正的自然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就带有抽象的意义”。

西行

1949年，朱德群携家人匆匆离开南京，经上海乘船赴台北。由于行李杂冗，不便托运，临行前，朱德群将在南京所作的数十幅油画作品寄留在同学家中。可惜的是，该同学由于躲避战火，离开南京，朱德群所存的油画竟全都不知下落。1949年以前的作品一幅都没有留下，这也成了朱德群一生最大的遗憾！

初到台北时，朱德群执教于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前身）艺术系。当时的台湾艺术教育界，几乎是印象派的天下。朱德群主动打破了这种僵局，给学生们讲解塞尚、野兽派等现代绘画风格和理论，大受欢迎。五年后，在台湾画坛逐步站稳脚跟的朱德群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首次个展，由于黄少谷、张道藩、罗家伦等名家的提携和支持，画展出奇成功。五十多幅作品悉数卖出，有了经济基础，朱德群终于可以到艺术之都巴黎圆梦。

1955年3月29日，在阳春细雨中，朱德群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经香港、西贡（今胡志明市）、苏伊士运河、开罗等地，一个多月的航行后抵达马赛。与35岁的朱德群同船抵达的，还有一位名叫董景昭的姑娘，她后来成了朱德群的妻子。在漫长的旅法岁月中，董景昭与朱德群二人相伴相随，白首偕老，成为佳话。

抵达巴黎的当天，朱德群和董景昭便迫不及待地拜谒了神往多年的卢浮宫，一些以前只是在画册上才能看到的世界名作，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在“回力球场国家画廊”，朱德群惊喜地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偶像——塞尚的作品，顿时陶醉其中不能自拔。

“塞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驾驭主题的能力，此外他在空间和光线中用富于表现力的符号构筑形体的法则也给我以启迪。和宋代画家相似，塞尚揭示宇宙的构造和它的宽广，与它的虚实同呼吸，转化为画布上的隐现和疏密，这些都使他的作品充满智慧和诗意。”回家后，朱德群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走出朱德群，走进塞尚”。

朱德群还对斯塔尔“自由奔放”的绘画风格崇拜有加。为此，他毅然扬弃业已娴熟的古典写实风格，摆脱掉物体形象的约束，转型到对抽象艺术的探索之中。他不再画有形的山水、花鸟、草木、人物，他尝试把自己的梦想、人生观和对宇宙的情怀，用抽象的画面来表现。

1956年4月，朱德群为妻子董景昭创作了一幅肖像，在随后参加的“国家春季沙龙”展览中，此画荣获银奖。此时，朱德群的古典写实作品引起了法国人的注意，也奠定了他日后事业的基础。这幅画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朱德群20年的古典写实绘画风格的终结。

尼采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巴黎是最理想的家园。”朱德群浸淫在自由、开放、多元的巴黎，一面感悟西方艺术的真谛，一面体味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之奥妙。成功转型后，朱德群便以破竹之势跻身法国现代绘画的主流，成为连接东西方艺术的一座桥梁。

“朱德群描绘了一个只存在于他画中的国度，一个既是想象又是真实的国度。它源自画家一生中多次体验过的感动，联系着他记忆中的中国。”法国艺评家皮埃尔·卡巴纳曾坦言，“他不是作为流亡者或移民居住在巴黎，这位成熟的艺术家准备由此跨入另一种文化，又不抛弃祖辈文明，二者之间有路可通，那就是他的创作。”

回归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自1949年离开，朱德群已经有33年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的土地。转机发生在1983年，他以外聘教授的名义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班学士考试的评委会委员。期间，应北京美术家协会的邀请，朱德群与画家基依诺夫妇前往中国大陆。在三周的时间内，朱德群访问了北京、大同、西安、南京、黄山，以及他在杭州的母校。在北京，朱德群与二哥朱德华相逢，又得以和老友李可染、吴冠中、彦涵等人重聚，故园山川，景色依旧。

法国艺评家皮耶卡班曾说：“真实的绘画来自回忆。”多年后的重

返，让朱德群记忆中魂牵梦绕的影像与现实激烈地碰撞出火花，耳顺之年的他也愈发体会到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的话：“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这份感悟体现在他1989年的作品《大地苏醒》中。朱德群以深邃悠远的表达方式，描述着令他朝思暮想的前尘往事：拂面的春风、芳香的泥土、柔弱的柳枝、蒸腾的雾气、湍急的流水都让整个作品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在另一幅代表作《一缕黄光》中，大雪纷飞之势若浑然天成，飞扬的雪花与舞动的线条纵横交错，浓缩成无数飞旋的白色、褐色和灰色。在这种狂放的构图中，朱德群对于传统中国山水的诗意和书法性的追求，却显得更加令人敬畏，让冷峻严寒的画面中，透露出丝丝暖意。

此时朱德群的抽象绘画已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西方绘画中丰富的色彩与中国传统书法、诗词和绘画的巧妙结合，在他的笔下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他的作品兼具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性与康定斯基作品的音乐性。在对比、变换、组合、韵律、跌宕的审美体验中，实现观者内心的物我交融，进而走入一个超客观的意象世界。

对于朱德群多年后的这次“回归”，更多意义上应被视为“螺旋似的上升”，这种“上升”又折射出朱德群由对于西方抽象艺术的迷恋到中国传统文化主线上的“回归”。可以说，对西方的理解愈深入，他对中国的认识就愈发深沉，最终在现代文化的层面上实现了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

1997年12月，朱德群成功当选为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也是法兰西学院成立两百多年来的第一位华裔艺术院士。1999年2月3日，在象征学术最高荣耀的法兰西研究学院的穹顶下，78岁的朱德群穿着拿破仑时代的绿底金线刺绣院士大礼服，在法兰西共和国仪仗队的鼓声中登上讲坛，佩戴上了象征法国国宝级荣誉的法兰西院士宝剑。

在典礼上，著名雕塑家让·卡尔多这样称颂朱德群：“在当代艺术中，您的作品所表现的丰富内涵是无可比拟的。在我们的眼中，您是

一位创造力雄浑博大的艺术家，您驾驭和完成了如此多的极其稀有和高品质的作品，您卓越的智慧和性格给我们学院投进了一片新的光辉。您的作品是世界性的，因此，这片新光辉所照耀的范围也已超越了法国国界。”

2001年，应上海大剧院邀请，朱德群创作了一幅7.3×4.3米的巨幅抽象画《复兴之气韵》，这是他迄今为止所创作的最大一幅作品。作为一份由中法两国共同分享的献礼，《复兴之气韵》完美地将两种文明熔于一炉：一方面是诗意与静观的结合，另一方面是西方绘画中体现的思考——一阴一阳，这种双重的智慧正如朱德群曾说的：“我是来向世界传达《易经》哲理的，这是我作为汉家之子的一个使命”。

一个民族两个阵营纳粹乌克兰VS红色乌克兰

作 者:朱世巍



/ 1944年，希姆莱视察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党卫军第14“志愿”师。该部战斗力远不如其他党卫军，几乎一战即溃





/ 1942年，苏联士兵与德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激战

在1941年6月22日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中，德国以300多万陆军部队的庞大兵力沿着漫长的苏德国境线发动全面进攻。战场南部的乌克兰地区成为两军重兵争夺的焦点。经过一番极为激烈的大规模装甲会战，开战一周后的6月30日，乌克兰古城利沃夫（也称为伦贝格）落入德军第1山地步兵师之手。入城德军中包括陆军第277高射炮营，后来的西德高级政客——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任西德国防部长），正是该营一名下级军官。在德军前进道路上，到处是蜂拥而来欢迎的乌克兰民众，以至于延迟了一天的行军时间。入城后，德军得知利沃夫此前爆发了一次反苏暴动，但遭到苏联内务部队的坚决镇压，数千人被杀死，尸体丢到地下室里浇上汽油焚烧。接下来，获胜的德军也把大量犹太人和共产党驱赶到一起，让他们自己挖好坟墓，然后集体枪杀。

事实上，德军所进占的这个地区，原本属于旧苏波国境地带，而利沃夫城，则是著名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中心，早已见惯了腥风血雨。

利沃夫的“东斯拉夫人”

利沃夫古城建立于1256年，得名于建立者加利奇大公达尼洛的儿子利夫，后逐渐成为加利奇-沃伦公国（古乌克兰国家）的中心。1340年，利沃夫遭到波兰军队侵略，9年后沦入波兰统治之下。15世纪，在利沃夫形成了反抗波兰统治的兄弟会，开启了此后持续数百年的民族地下斗争的序幕。1772年，波兰被第一次瓜分后，利沃夫又落入奥地利之手。1848年，当地爆发了反奥地利起义，随即被镇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崩溃，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布该地区独立，建立所谓“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但波兰军队很快又开进了利沃夫。至此，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利沃夫这个乌克兰人的城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多次易主，却从未被纳入与乌克兰人同为“东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也没有被征服了大片东斯拉夫人土地的蒙古人统治过。

所谓“东斯拉夫人”，也就是现今所谓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统称。1000多年前，东斯拉夫人形成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称为基辅罗斯。12世纪下半期，基辅罗斯分裂为众多公国。在1240年，基辅城被蒙古人摧毁，一度被金帐汗国统治，后来又被立陶宛和波兰所占有。“东斯拉夫人”至此彻底地四分五裂。一般来说，处于立陶宛和波兰治下的东斯拉夫人，就是现今所谓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曾试图使他们接受天主教而同化之，虽然没有完全成功，却造成乌克兰人较为“西化”的传统——尤其是乌克兰上层，而与长期处于蒙古人统治下，且坚持东正教的另一支东斯拉夫人——也就是所谓俄罗斯人，形成了难以名状的隔阂。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行为模式极为蒙古化的俄罗斯人，正逐渐崛起而成为一个强大帝国。这引起了长期遭受波兰人欺压的乌克兰人的共鸣。1654年，包括基辅在内的大片乌克兰地区摆脱了波兰人的统治，选择与兄弟民族的俄罗斯合并——但前述如利沃夫等地区却不在此列。俄罗斯所控制的乌克兰疆域变化不定，时大时小。甚至有些乌克兰地区长期处于拉锯状态——比如罗夫诺地区，也曾被波兰长

期统治，直到十八世纪才并入俄罗斯。帝俄崩溃后一度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不久又被波兰吞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一度放弃了帝俄所控制的东乌克兰，可随后又给抢了回来。所谓西乌克兰依然四分五裂——一般指沃伦州、外喀尔巴阡州、伊万—弗兰科州、利沃夫州、罗夫诺州、捷尔诺波尔州、切尔诺夫策州等地。如前所述，这一地区的历史相当动荡，不断被各路强权占领和瓜分。大体来说，在一战前，西乌克兰主要分属于沙俄和奥匈帝国。两大帝国崩溃后，又遭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国的瓜分。其中利沃夫为中心的地区再度落入波兰人之手。在这个时期，利沃夫是欧洲最落后地区之一，工人只有4万。状况可谓暗淡至极。

在苏德夹缝中生存

在长达数百年的异族统治下，利沃夫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直非常活跃，并且鼓吹要建立统一乌克兰——而且显然是不从属于俄罗斯的乌克兰。一个名叫斯捷潘·班杰拉的西乌克兰人登上历史舞台。1929年，时年20岁的班杰拉开始参加各种反对波兰统治的暴力颠覆活动。30年代，班杰拉被波兰人逮捕，并因为杀害波兰内务部长等罪名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终身监禁。

此时，苏联的新领导者斯大林也希望能够统一乌克兰，但前提与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恰好相反——乌克兰要全部纳入苏联的疆域。1939年9月1日，德国大军在坦克和俯冲轰炸机配合下，大举进攻波兰。半个多月后，苏军也攻入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任何一个沙皇都没有统治过的利沃夫，终于第一次并入沙俄继承者苏联的疆域。对这次带来重大争议的行动，苏联宣称是为了“拯救” 那里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居民。实质上却是斯大林统一全乌克兰的重大举措之一。他或许认为，这可以换取乌克兰人对他的更大忠诚，但后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趁着苏军进驻所带来的混乱，班杰拉逃出监狱——按赫鲁晓夫的说法，也许是被苏联所释放的。赫鲁晓夫宣称这是一个巨大错误，事实也的确如此。班杰拉随后就溜到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开始为德国军队服务，包括组织各种破坏分子在并入苏联的西乌克兰地区制造各种暴动，或者大搞破坏。

德军入侵乌克兰后，班杰拉分子一面配合其行动，一面匆匆发布声明，宣布成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并服从于纳粹的新秩序。但他们对希特勒的效忠并未获得认可。仅仅几天后，这个德国刺刀保护下的乌克兰“政府”就连同其领导者班杰拉等人一起，被德国人投入监狱，此后又改为软禁状态。取代所谓“独立乌克兰政府”的，是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为乌克兰专员的纳粹德国高官科赫。此人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来到乌克兰不是为了传播幸福，他的全部目标仅仅是把这个地方彻底榨干，即使一个最卑微的德国工人，也要比乌克兰人“贵重一千倍”。至于某些德国官员如罗森堡提出的建立独立乌克兰国以牵制俄罗斯的意见，科赫也好，希特勒也好，都毫无兴趣。尤其是希特勒又将西乌克兰的加里西亚和利沃夫划入了“总督辖区”（也就是德占波兰地区），这等于把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魂都给抢走了。

旗开得胜的德国人利用完了西乌克兰独立分子，就毫不客气把这些他们心目中的“劣等民族”一脚踢开。

乌克兰战场上的乌克兰人

德国军队的坦克履带正迅速碾过乌克兰的土地，不仅占领了西乌克兰，很快也占领了传统上就属于俄国的东乌克兰。但随着德军的深入，所遭到的抵抗也逐渐激化。到1942年初，乌克兰大地上已经遍布反抗德军的苏联游击队。到1943年，一些地方60%-80%的林区或农区都处于游击队控制下，很多德国派来的行政官员被杀掉。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部队则以对乌克兰日益残酷的扫荡和屠杀加以报复。

实际上，德国人在乌克兰的统治是极为短暂的。即使是最顺利的1941年和1942年，战线也变化不定。到了1943年，在达到了所谓巅峰状态后不久，战局就变得对德国人压倒性的不利。1943年2月，德国第6集团军三十万大军在斯大林格勒覆灭。此前，反攻的红军已经在1942年12月重新杀入乌克兰境内。1943年夏季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后，红军收复了爆发过多次激烈争夺战的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该城也是苏联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还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接着红军又发起第聂伯河战役，于1943年11月6日收复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随着东乌克兰重新回到俄国人手中，红军开始指向西乌克兰。

与此同时，乌克兰地区不仅活跃着支持苏联的共产党游击队，也有众多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武装组织——所谓的乌克兰起义军。他们几乎和一切人为敌——苏联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特别是在1942年到1944年，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织了对波兰人的大规模屠杀，据说有不少于10万人被杀害，包括大量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

1944年2月29日，西乌克兰武装分子袭击了苏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瓦图京一行人。瓦图京腿部（膝盖以上）受伤且大量流血。他先被送到罗夫诺，后来送到基辅治疗，却还是在4月14日夜死去。莫斯科为此鸣炮20响志哀。这当然不是西乌克兰独立武装给予苏军的唯一伤害。在此前后，苏军为了剿灭西乌克兰独立武装，投入了大量兵力且损失了数千人。

比较来说，西乌克兰武装分子虽然有时和德国人也有冲突，但勾结与合作更多。即使被软禁的班杰拉等人也依然在为希特勒服务。他们甚至鼓励一些乌克兰人直接参加纳粹德军。其中以党卫军第14步兵师（也称为乌克兰第1师或“加利奇纳”师）最为著名。该师于1943年4月开始组建，主要由西乌克兰“志愿者”组成（尤其是那些曾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西乌克兰地区）。1944年6月该师被投入前线，隶属于纳粹德军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另一个以“乌克兰”命名的德国重兵

集团是撤退到罗马尼亚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这个重兵集团的任务是阻止红军夺回西乌克兰地区。但“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连同党卫军第14步兵师很快就遇到了红军的反攻而被打垮，该师只有3000多人逃回德军防线。经过这次战役，西乌克兰也重归红军之手，红军于1944年7月27日占据利沃夫。

此后党卫军第14步兵师又被重建起来，但因为战斗力太弱，一般只能用以执行诸如对捷克起义的镇压和剿灭南斯拉夫游击队之类的次要任务。这个师前后大概有25000人参加。还有一些乌克兰人被编入德军，参加镇压白俄罗斯地区的游击队，其手法极为残暴。

“乌克兰独立事业”的终结

1944年9月，大势已去的纳粹德国为了垂死挣扎，居然又想起了软禁中的班杰拉，把他放了出来，负责组织西乌克兰独立分子，他们被空投到苏军后方进行破坏活动。但德国败局已定，已不是此类小把戏所能挽救。1944年11月，苏联军队最终占据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在最初收复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和最后攻取的外喀尔巴阡，红军竖立起了方尖碑，以宣示全乌克兰地区纳入苏联版图。斯大林至此完成了任何一个沙皇都没有做到的统一乌克兰大业。

但是经过德军撤退时的疯狂摧残，乌克兰大地已荒芜一片。被占领的两年多时间内，仅仅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地就有19.5万名居民被德军杀害，另有10万人被掠走充当苦力。尤其是在基辅郊区的娘子谷，红军发现了大量腐烂的尸体。

早在1941年9月，德军刚刚占领基辅，党卫军C特别行动队就入城大肆捕杀犹太人。配合其行动的还有德军第45和第305警察营，以及乌克兰“辅助人员”。9月29日-30日，德国人在娘子谷实施大屠杀。根据他们的报告，短短2天内，就用机枪射杀了33771名犹太人。此后的占领岁月里，娘子谷继续成为德军的杀人场，还建立了集中营。

苏联战俘、共产党员、神父甚至还有击败德国空军足球队的苏联运动员，以及大量平民，均在此遭到杀害。除犹太人外，遇害者还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吉卜赛人等。

1943年夏季，德国人预感到失败。8-9月，为掩盖罪行，他们强迫300名囚犯花费六周时间挖掘并焚烧谷地内的尸体。但2个月后，红军在当地依然发现了大量腐烂尸骸。根据掩埋尸体的工人的证词，被害者约7万-12万人。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为10万人。但回避了屠杀的具体细节。尤其很少单独提及犹太人的情况。这一点后来成为西方和苏联内部犹太知识分子的宣传把柄。

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则跟着败退的德国人一路向西奔逃，直到纳粹完蛋。1945年5月，党卫军第14步兵师在奥地利投降。他们中很多人逃到了由美国控制的西德地区，另外一些顽固分子与西乌克兰反苏武装合流，继续与苏军战斗。他们一直活动到1956年。斯捷潘·班杰拉也逃到了西德，在美国人和西德的庇护下继续他的“乌克兰独立事业”。1959年10月15日，班杰拉突然暴死于慕尼黑。后来西德官方宣称他死于克格勃的暗杀，下命令的据说正是赫鲁晓夫。

悄然间乌克兰做大做强

本文写到此处，几乎都是以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中心。而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如俄国人所说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多数乌克兰人依然站在俄国一边参战。

数百万乌克兰人参加红军，数十万人参加苏联游击队。尤其是战争后期，苏军从收复的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大量补充兵员。很多部队中乌克兰人占到了总员额的四成左右。4年战争期间，10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于战火和德军的屠杀。而全苏联死者约3000万左右。

斯大林统一了乌克兰，却也为苏联的崩溃埋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隐患。作为苏联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变得过于膨

胀，以至于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60-70年代，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乌克兰人）醉心于乌克兰地盘的广大、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文化艺术的悠久发达，开始公开鼓吹彻底乌克兰化的乌克兰。虽然勃列日涅夫下手赶走了谢列斯特，乌克兰的自大情绪却已无法遏止。

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与俄罗斯更是渐行渐远，却又藕断丝连。以利沃夫为中心的西乌克兰势力咸鱼翻身，在美国和德国支持下竭力扩大在乌克兰全国的影响力，鼓吹抛弃俄国彻底倒向西方。在这股风潮下，班杰拉被吹捧为乌克兰独立的先驱和殉道者。

2010年1月22日，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尤先科追授班杰拉为“乌克兰英雄”。然而此举不但引发了俄国人以及亲俄的东乌克兰势力的不满，也激怒了曾遭到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屠杀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愤怒与抗议。到了2011年1月，相对亲俄的新总统亚努科维奇又宣布撤销班杰拉的英雄称号。时至今日，亚努科维奇被亲西方势力驱逐下台，亡命于俄国。动荡中的乌克兰至今也没有建立起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正式政府，却身陷地缘危机之中。

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甚至打出了当年党卫军第14步兵师的旗号，与犹太人和俄罗斯族发生冲突。动荡的局面下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未来的历史又将如何评价二战中乌克兰人的恩怨是非呢？

反乌托邦电影播撒自由的种子

作 者:时间之葬



/《移魂都市》剧照,外星统治者每天晚上重启世界,抹去人们的记忆





1 / 《少数派报告》剧照，汤姆·克鲁斯饰演的预防犯罪小组领袖自己蒙上了不白之冤
2 / 《黑客帝国》剧照，尼奥雨中大战100个特工史密斯，后者是Matrix中的程序，具有复制自己的能力
3 / 《我是传奇》剧照，人类被病毒感染，整个纽约变成了一座空城，只剩下威尔·史密斯饰演的科学家在废墟般的城市中独自游走

3月17日，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雪国列车》在国内公映，影片改编自法国漫画《Le Transperceneige》，通过一列行驶在末日灾难过后的列车，将整个人类社会缩影其中。位于车厢尾端的是饥寒交迫的底层人民，车厢往前依次是隔离厢、监狱厢、生产厢、守卫厢……直至列车前端还有包含了各种高级餐厅和医疗休闲设施的高等贵宾车厢，最前端的则是列车的主宰者威尔福德单独居住的引擎车厢。在这幅等级森严的图景中，末日之后的乌托邦气息跃然纸上。列车是人类最后的生存寓所，为了让列车能够正常运转，威尔福德不断地给列车上的乘客灌输着秩序的重要。他所谓的秩序，是列车前端的富人骄奢淫逸醉生梦死，末节车厢的穷人则食用蟑螂制成的恶心食

物，在肮脏逼仄的空间里如蝼蚁般求存。为了维护这一秩序，暴力镇压、谎言瞒骗等等一切极权政府会用到的手段必不可少，甚至不定期以“无间道”的方式引诱底层民众起来反抗，来达到短时间内消灭大量人口的目的。

《雪国列车》的以上种种设置，呈现出一幅典型的乌托邦世相——一个在末日浩劫之后残存的人类文明，被极权统治者凭借一己“崇高理想”，推行等级森严的血腥统治。而影片所传承的，正是从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等反乌托邦文学中衍生出来的反乌托邦精神。反乌托邦文学旨在反映一个虚构的理想社会，物质文明发达得近乎完美，然而在这样的“天国”中人们的精神却受到严苛的控制，毫无自由可言。由于20世纪的独裁政权此起彼伏，对“乌托邦”的质疑成为一股潮流。而电影，则适时地继承了对乌托邦理想的批判精神，并运用想象力将其发扬光大。反乌托邦电影用最直观的视觉冲击包裹着严肃且不乏深刻的思考，将自由的种子播撒到亿万人的心中。每有一部反乌托邦电影上映，我们距离独裁的危险就少一分。

《雪国列车》早已不是第一部被贴上“反乌托邦”标签的电影。早在1927年，德国表现主义大师弗里茨·朗执导的《大都会》就用超越时代的想象力表达了对乌托邦理想深刻的忧虑。纵览形态各异的反乌托邦电影，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相似元素。

末日：是天灾更是人祸

自从启示录问世以来，末日二字就是徘徊在人类上空的魔咒，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曾以各自的形式表达对末日的预言和警示。在反乌托邦电影中，末日的例子比比皆是，毕竟浩劫过后的破败世界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质感。

末日，时常是一场天灾“速成”，《12只猴子》（1995）《生化危

机》（2002）《我是传奇》（2007）都大同小异，造就末日的原因乃是致命的病毒施虐全球，人类社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也有些时候，末日是由外星人带来，例如在曾影响过《黑客帝国》（1999）的科幻片《移魂都市》（1998）中，就是天外来客们以征服者的姿态降临，动用灭绝性的科技和武力打造出巨大的黑暗都市，每晚都将人类的记忆进行移植并且将城市景观进行变换，世界就这样被不断重启，人类再也记不清曾经的自我和世界。而在《人类之子》（2006）中，末日更像是上帝的一个恶作剧，他在DNA上动了一点手脚，就此剥夺了人类的繁衍生育功能，于是看不到未来的人类社会，顿时陷入集体无政府状态。

但在更多反乌托邦电影中，末日往往是人类咎由自取的产物。之前提到的各种病毒施虐，看似天灾，实则人祸，是野心家和阴谋者试图研发超级生化武器的结果。《雪国列车》的末日，也是人类自身一手造就。为了抵御全球变暖（这还是人类做的孽）发射的代号CW-7的冷冻剂，却将地球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极寒深渊，绝大部分人死于寒冷与恐慌。

另一种常见的人祸式末日则是核战，对于曾处于冷战阴影下的人想必都不陌生。《撕裂的末日》（2002）中，一场全球核战让世界化为乌有，战后组建的政府基于对战争的恐惧，为了不让末日重演，甚至强迫所有人服用压抑情感的药物，美其名曰“扼杀仇恨的种子”。在我们更为熟悉的《终结者》系列中，最后的“审判日”正是天网系统启动之时，一个按钮按下去，全人类在核武器的洗荡下完成新的“创世纪”。

人类对地球家园的肆意破坏、予取予求造成的末日图景则更为普遍地出现：梅尔·吉布森的成名作《疯狂的麦克斯》（1979）中的世界，石油早已耗尽，习惯了物质充沛的普通人立马化身为不惜一切争夺资源的暴徒，血腥的枪战和搏斗，每天在这个蛮荒颓败之地上演；《未来水世界》（1995）中，文明直接倒退回前工业时代，人们衣衫

褴褛，蓬头垢面，曾经毫不起眼的一口淡水、一把土壤，都成了比黄金更稀缺的珍贵资源；《人工智能》（2001）中，人类虽然发明了智能机器人以应对恶劣的环境，然而一个淹没在海底的世界终究还是到来。面对人类对环境的巧取豪夺，末日似乎是上帝给出的应有惩罚。

虚构：谎言编织的真实

在《楚门的世界》（1998）的结尾，当痛苦的楚门（金·凯瑞饰）决心走出镜头，走出17亿人长达30年的集体窥视之时，宛若上帝一般的真人秀导演克里斯托夫如此挽留他："桃源岛一切都会十分美好，你会像过去一样过着皇帝一般的神仙日子。外面的世界或许真实，但那也意味着外面会有更多的苦痛和折磨。那么，你是否还会选择出去？"

《黑客帝国》尼奥（基努·里维斯饰）被按在一把椅子上，他被告知："你所处的'现实'世界，其实是一个叫做Matrix的计算机系统——一个被高级智能计算机操纵的'梦境'。人类就像它们饲养的动物。现在你面前有两颗药丸，吃下蓝色的那颗，我会很快消失，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继续过你的日子。吃下红色的那颗，我会带你去看看什么叫他妈的'真实'！"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已知道，楚门仍然选择走出了桃源岛，而尼奥吞下了红色的药丸。就某种意义而言，桃源岛就是Matrix，都是一个被某个更高的主宰建构的虚幻世界，那里其乐融融，极尽美好，只可惜一切都是假的。几乎每一个具有乌托邦情结的人，尤其是统治者，都会憧憬一个属于自己的桃源岛，在那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实现最完美的社会体制和人类目标。人们不需要思考，他们只需不停地做梦。

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们而言，一旦意识到这一虚假的层面，便会像楚门和尼奥那样产生深深的反感。当你周围的家人朋友，一切的一切

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那么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从何谈起？所以楚门和尼奥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走出去，虽然诚如导演所言，真实的世界可能更加污秽不堪（如《黑客帝国》中真实的锡安）。如今，相似的问题再度摆在《雪国列车》的主人公柯蒂斯面前——威尔福德对柯蒂斯声称，他可以选择继承自己的位置，在永不停歇的列车上成为全人类的最高主宰，而走出这趟列车则只有死路一条。有那么一刹那，被巨大的权力包围让柯蒂斯产生了眩晕，但当他看到这架完美的机器是以无数孩子永世的奴役为代价时，还是选择了摧毁列车。

上世纪末，一大批此类思考世界真实的影片集中出现，除《楚门的世界》和《黑客帝国》外，《攻壳机动队》（1995）《移魂都市》（1998）《感官游戏》（1999）等影片最终都指向于此。时刻提醒着人们，当有一天完美的乌托邦真的驾临，那或许仅仅意味着——这一切都是假的。

科技：通往奴役之路

如果说完美是一切乌托邦的目标和诉求，那么对于日趋进步的人类文明而言，高度发达的科技就是实现乌托邦理想的最佳手段和途径。各种具备未来感的高科技成为反乌托邦电影中最常见的元素，反乌托邦电影在许多时候也属于科幻电影的亚类型。

在《发条橙子》（1971）中，库布里克试图用一个根除人们暴力倾向的疗法将犯罪行为一劳永逸地根除。这一疗法最终不但彻底失败，而且用极端手段的消除邪恶的方式，本身就是最大的邪恶。

与根除暴力旨在消灭犯罪行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通过预测未来从而预防犯罪的设想。斯皮尔伯格的《少数派报告》（2002）中就有这么一套“先知”系统，它成功地预防了一起起即将发生的犯罪，但也让预防犯罪小组的领袖约翰·安德顿（汤姆·克鲁斯饰）自己蒙上了不白之冤。最终，约翰被证明并非系统预言的凶手，幕后的黑手实

则是系统的缔造者。如果人们陷入对这套系统的盲目迷信当中，类似的冤狱或将泛滥成灾。

无论是根除暴力还是预测未来，都不如创造一个完美的人种来得最直接彻底。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到纳粹狂人希特勒，完美人种的梦想从未消失。在《千钧一发》（1997）里，基因技术已经实现了“完美人种”的构想。每一个用强化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人类都可以彻底远离各种缺陷与疾病。但完美的基因并不意味着完美的人类，灵魂，是科技鞭长莫及的层面。“不完美”的主人公文森特（伊桑·霍克饰）可以实现“完美”的杰罗姆（裘德·洛饰）和弟弟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他始终都在为心中的梦想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后者虽然拥有完美的身体，但却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和希望。

完美基因或许离我们还有点遥远，但克隆技术如今已经几乎成为了人类的现实。在以克隆人为题材的反乌托邦电影里，无论是《逃离克隆岛》（2005）还是《银翼杀手》（1982）又或是《月球》（2009），克隆人往往都逃不开被人类视作可利用的低等工具的悲惨处境。他们作为被复制的“赝品”，是否应该又或能够被当作人类一视同仁，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在这一悖论被攻克之前，克隆技术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始终都是危险的潘多拉魔盒。

相比克隆技术从未止息的争议和质疑，人工智能技术从一开始就被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人类的双手和大脑都将史无前例地得到解放，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将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们幸福水平一劳永逸的良方。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1968）里已经表达了对机器的忧虑，无所不能的HAL用高于人类的智慧企图杀死人类，只为了完成自己最初被下达的终极指令。而到了新世纪，机器更是有成为人类公敌的趋势：由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小说改编的《机械公敌》（2004）如是，《黑客帝国》和《终结者》（1984）亦如是。拥有超高智商的机器人奴役人类的未来，不断在银幕上上演。

无论是机器还是人类，若想真正实现对人的奴役，洗脑都是必备的手段。《移魂都市》中的洗脑方式是外星统治者每天晚上不断重启世界，抹去人们的记忆。《全面回忆》（1990）简单得多，只要一架机器，你就心甘情愿地被清空了过去。而《雪国列车》则传统得多，列车上专门设置了一个教室，在那里，威尔福德钦定的老师们将会对年幼的孩子们灌输自己的一切主旨，未来，他们就是维持秩序的接班人。

极权：幽灵般的至高存在

无论是人祸造就的末日，还是主宰编造的现实，又或是危险与便利并存的科技，最终都是为极权统治服务。因此，在各式各样的反乌托邦电影中，极权统治者就像是一个幽灵般的至高存在。

《楚门的世界》中的克里斯托夫、《黑客帝国》中的“机器大帝”、《移魂都市》中的外星人、《饥饿游戏》（2012）中的总统、《V字仇杀队》（2005）中的舒特勒、《撕裂的末日》中的主席以及《雪国列车》中的威尔福德。如果罗列完这个名单，估计一天的时间未必够用。

但所有这些独裁者，又都几乎可以化为一个人的身影：他会像《1984》中的老大哥那样不断地在大屏幕上出现，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宣讲自己的政策和理念；他还会像《饥饿游戏》中的总统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恐吓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只不过在《饥饿游戏》中它以一种全民娱乐至死的方式上演，在《雪国列车》里则演变为一场深不可测的阴谋。对于他们而言，底层民众的死活从来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乖乖停留在自己本来的位置，安心地屈从于他们施予的一切安排。至于思想，则是万万要不得。

打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天起，完美世界，就成了一些人最孜孜以求的信仰和梦想。于是，再自然不过地，很多沉浸于自己理想世界的

独裁者们，正是乌托邦精神的最佳继承人，他们相信世界在他们的手中，终于可以达到柏拉图曾冀望的完美境界。以至于“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的每一位20世纪的独裁者以及21世纪的每一位恐怖分子都被贴上了乌托邦主义者的标签。”

在20世纪一个个独裁者缔造自己乌托邦美梦的背景下，许多优秀的反乌托邦电影，并不止于宣扬推翻一个独裁的统治，而在于让这种反抗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V字仇杀队》的最后，恐怖分子做派的V将炸药的引爆器交到了艾薇（娜塔莉·波特曼饰）手中，让她那未曾沾染鲜血的双手去选择世界的未来。而在《雪国列车》的最后，柯蒂斯毅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右手，拒绝了一个让独裁循环往复的诱惑。这，或许正是反乌托邦电影最动人的地方。

中法建交50年

作 者:宋义东

2014年3月27日，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在巴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共同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中法关系50年来的成功经验。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追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奥朗德总统也提出了法国梦。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法国的机遇，法国梦也是中国的机遇。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他希望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和法国梦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共同实现“中法梦”。

左图/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图为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左）向戴高乐总统（中）递交国书后合影

上图/1975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法国，两国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1979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问法国，这是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法国。1980年，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中国，两国在上海和马赛互设总领事馆。双方还谈论了在广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项目问题。图为1981年6月1日，中国，工人骑车经过法国埃尔夫·阿奎坦公司在华建设的工地

志愿军将士回家

文|宋义东

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中国志愿军，只有少数回到故土，多数安葬于朝鲜，韩国境内亦有阵亡的将士。60年后，他们终于开启回家之

路。2014年3月28日，载着韩国交还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车队缓缓驶进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这是195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遗骸送还。目前，朝鲜半岛仍有多达13万战殁者遗骸等待挖掘，韩国从未放弃对他们的搜寻，在韩志愿军遗骸的发现也得益于此。中韩双方达成共识，今后两国将继续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挖掘、鉴定，每年清明节前进行一次常态化交接，更多的烈士遗骸将通过这一途径返回故土。英雄们为国捐躯时，抱的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迈，但后人们更希望他们叶落归根。

左图/1958年，志愿军撤离朝鲜，仅留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在板门店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善后，包括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志愿军遗骸。1991年9月，7人小组撤回。至此，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图为1958年中国志愿军官兵向上甘岭英雄阵地告别

下图/　2014年3月28日上午，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礼兵抱起覆盖着国旗的遗骸灵柩登上回国的专机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1954年后，战争双方均进入非军事区搜寻战争留下的遗体，志愿军62师组建了民政警察队伍，提出的口号是：不遗留每个烈士一件遗物，不丢掉每个烈士的一根头发。图为在战场寻找战友遗体的志愿军战士拒绝记者拍摄

/战事最为激烈的第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区域。部队作战后撤时，对遗体进行了就地掩埋。停战前的最后一役金城战役，纵向推进至三八线以南，伤亡2.3万余人，其中不少埋骨韩国境内。图为1953年6月14日，铁原哈里前哨，美军掩埋志愿军战士遗体

/ 1958年，归国之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前往烈士墓地扫墓，

向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告别

一年就为这几天探访2014欧洲艺术与古董博览会

作 者:陈茫







1 / 马蒂斯《侧卧的裸体女像》
（图片来源：慕尼黑国家平面艺术收藏馆）
2 / 阿米戈尼《年轻女子头像》
（图片来源：慕尼黑国家平面艺术收藏馆）
3 / 凡·高《煎饼磨坊》(图片来源：Dickinson 艺廊)





1 / 基希纳《死亡之舞——玛丽 · 魏格曼》(图片来源：Henze & Ketterer艺廊)
2 / 达 · 芬奇《伊莎贝拉 · 德斯特》(图片来源：慕尼黑国家平面艺术收藏馆)
3 / 伦勃朗《拿羽扇的长裙女子》(图片来源：慕尼黑国家平面艺术收藏馆)

那是一座“代售的博物馆”，里面有“散落一地的珍宝”，“一年就为这几天”……

谈起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一年一度的欧洲艺术与古董博览会（Tefaf），即使是最挑剔的艺术收藏家也不吝赞美之辞。

的确，Tefaf以27年的博览会历史，聚集世界绘画、古董、现当代艺术、手稿、顶级珠宝、设计、纸本艺术等领域，从人类早期文明一直到今天的三万多件艺术珍品，吸引全世界20个国家的最杰出艺廊经纪人、古董收藏家前来举行“年度集会”，其规模与艺术水准的确当

得起“古董与艺术的盛会之尊”这一华丽称号。

今年3月14日至3月23日，这场艺术收藏界的盛典再度拉开帷幕，迎接从全球各地赶来的近8万名艺术及收藏爱好者，在马斯特里赫特展开他们的朝圣与圆梦之旅……

“永恒的美丽”特展——35位艺术大师笔下的女性美

步入马斯特里赫特展览大厅，只见绘画、古董、现代艺术、手稿、顶级珠宝、设计、纸本艺术等不同门类的艺术品在这座占地面积超过3万平米的建筑里汇聚成一片珍宝之海。位于展厅二楼的纸本展区别具匠心的特设外展《永恒的美丽》更是吸引了众多观展者驻足欣赏。

这一场特色展览展出了世界专业绘画藏馆——慕尼黑国家平面艺术收藏馆珍藏的35件来自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多位绘画大师的真迹。这些作品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美丽的女性，时间上跨越了从15世纪至20世纪的六百多年。它们涵盖了六个多世纪以来画家们对女性的精彩诠释，为参展者近距离欣赏达·芬奇、格吕内瓦尔德、伦勃朗、马奈、罗丹、毕加索等欧洲顶级绘画大师作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在西方绘画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可谓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由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画师这一职业几乎是男性的天下，因此，绘画中的女性形象无疑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反映。细细品味每一幅画作，我们在惊艳于大师高超画技的同时，多少也能感受到蕴含在杰作中六个多世纪以来男性对女性审美、欲求的变化以及不同历史时代社会状况、思想观念的差异。

黑暗的中世纪，沉重的宗教氛围笼罩着整个欧洲的艺术领域。人类本能的美感和欲望被忽视，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多为圣经中的女性和信教女子，她们无论相貌身材都不具备美感，而且画师在画面的处

理上显得平面化而缺乏体积感。这种宗教的束缚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慢慢打破。在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对曼图阿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斯特的素描中，画面不再是单一的平面化，而是加入了三维空间的处理方法，立体感使人的美感更加真实。而且除了典雅、庄重的风貌，也开始具有了人性的生动感，不再像宗教时期那样呆板而死气沉沉。这种对人物生动性的重视同样也出现在德国画家笔下。马提亚斯·格吕内瓦尔德是德国文艺复兴绘画中最不可思议的画家之一。在《祈祷的女人肖像》素描中，他以细致的手法着重勾画出女子狂热兴奋的面部表情，其力度尽现的表现手法，直到20世纪仍是许多现代艺术家的学习对象。

达·芬奇的时代，豪门贵妇是画作中女性形象当仁不让的主角，但在17世纪，尤其是在重商主义的荷兰，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把平民女子作为了绘画的主题和对象。在伦勃朗和他的学生们笔下，出身商贾家庭的女子以温柔娇俏的形象出现在了画作中。

18世纪，在当时“女性是为了取悦男性而生”的流行观点影响下，这一时期绘画中的女性多以天真、柔媚、极富女性美的年轻形态出现。意大利画家阿米戈尼是这段时期风格的代表者。

不过，当20世纪各种现当代艺术流派风格兴起时，欧洲的画家们也抛弃了传统概念中女性丰满、白皙、妩媚的肉体形象，改为以直率、粗放的笔法勾勒女性形体，以求更为主观和强烈的艺术表现。

价值千万欧元的凡·高画作

TEFAF因其古典大师作品而声名鹊起，在现当代艺术方面，TEFAF也展出了许多艺术珍品。

由伦敦及纽约艺术经销商Dickinson带来的凡·高作品《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极可能是本次博览会价值最高的艺术珍品。1886年，凡·高来到巴黎与他的弟弟提奥一起生活，在这两年期

间，他的艺术风格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受到弟弟提奥模仿印象派画风的启发，凡·高也开始大胆使用色彩，以求创作出最具感染力和创新性的作品。《煎饼磨坊》画于1887年4月，正值凡·高风格转换过程中的顶峰。

“这是一幅具备所有重要元素的绘画”，Dickinson艺廊的詹姆斯·伦戴尔（James Roundell）介绍，“它创作于巴黎，这是凡·高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凡·高的风景画从忧郁黯淡的荷兰乡村生活主题转变为色彩明快的后印象派风景。这幅作品上有清晰的凡·高签名，这在该时期的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目前凡·高描绘蒙马特地区风车的系列油画作品中只有两幅仍属私人拥有，这幅就是其中之一，它曾在1965年公开展览过。”

据展商透露，这幅画的价值达上千万欧元，参展完毕后，它将被一位美国富豪收藏。有趣的是，这位富豪正是英国作家伊恩·佛莱明《007系列之金手指》中大反派的原型。

德国表现主义经典之作《死亡之舞——玛丽·魏格曼》

德国艺术画廊Galerie Henze & Ketterer带来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代表作《死亡之舞——玛 丽·魏格曼》吸引了众多观众的注意。基希纳的这幅作品用生动强烈的色彩对比描绘了表现主义舞蹈先驱玛丽·魏格曼的动人舞姿，是德国表现主义的经典代表作。

基希纳是20世纪初叶德国三大艺术运动之一“桥社”的成员。桥派画家受野兽派画风影响，却比野兽派要更为激进。野兽派即使是最狂放的作品，也总是注意保持构图的和谐性、色彩的装饰性与抒情性，而桥派画家则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基希纳曾在1913年写道：“我们相信，所有的色彩皆直接或间接地重现纯粹的创造冲动。”因而，桥派绘画往往以扭曲的造型与浓烈的色彩，呈现一种粗犷及狂风骤雨般的气势。

中国古董备受瞩目

古董区是TEFAF最大和最多样的展区，这里汇集了16到19世纪成千上万的古董珍宝。今年的TEFAF，来自中国的古董展品，受到了世界各地藏家的青睐。

由香港展商Littleton and Hennessy带来的元代钴蓝釉碧海蛟龙纹瓷盘，是本次TEFAF最具吸引力的展品之一。这件瓷盘盘身厚施珍贵的钴蓝釉，绘以皎洁莹白的蛟龙纹饰，二者对比鲜明，搭配天衣无缝。据展商介绍，这种装饰风格在元瓷中极为少见，与其近似的大型瓷盘全世界仅有两件，而且均在博物馆珍藏。单就其样式来说，这件龙纹瓷盘便已堪称中国陶瓷在元代向新纪元迈进的圭臬之作。展商告诉我们，这件瓷盘的售价为1600万欧元。

在伦敦展商Rossi & Rossi幽暗雅致的展厅里，一幅稀有的11世纪西藏曼荼罗唐卡静静吸引着过往客人的目光。曼荼罗又译为坛城，它起源于印度佛教密宗，系密宗本尊及其眷属聚集的道场。古代印度密宗修习“密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遂筑方圆的土坛，安请诸尊于此以祭供。本智为主尊，道果功德为眷属；眷属环绕本尊游戏庄严，是为轮圆。这幅曼荼罗唐卡由外到内以圆形和几何体形式层层相套构成，正中间为主尊，外面图形以水图案及火焰图案装饰，第二层起用圆形的金刚图案、水图案、莲花图案装饰，表示大海、风墙、火墙和金刚墙、莲花墙、护城河。内套正方形图案表示城墙、屋檐，层层深入，最后到达主尊殿，并用红、黄、白、蓝表示东南西北四方，图案结构复杂，抽象和具象手法并用。这幅唐卡不仅极其稀有，而且尺幅惊人，达125x125厘米，价值高达220万美元。

来自荷兰的古董商Vanderven Oriental Art 专营中国古玩。在他们的诸多展品中，一尊战国时期的三蛇青铜鼓座着实令人惊艳。鼓座上部以盘蜷的三条蛇为造型，蛇身满饰细密的鱼鳞状纹，三蛇首上昂集聚于座顶中央围吻一方孔立柱，立柱当用以承插鼓具。鼓座下部呈

巨型直腹盆形，腹壁四周置三个铺首衔环，并以龙纹衬地堆塑有姿态各异的神兽。展商告诉我们，该鼓座直径71厘米，高37厘米，器型浩大，纹饰繁复，铸工精良，在战国时期青铜铸品中尚属罕见，售价250万欧元。目前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尊类似的三蛇鼓座，但整体规模要小于此尊。

TEFAF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 中国，待成熟的新兴市场

除展出的艺术瑰宝之外，TEFAF每年发布的《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也因其调查的独立性以及对艺术品市场的指导性而备受推崇。在今年的报告中，主笔人克莱尔·麦克安德鲁博士对于连续两年蝉联全球艺术品交易第二位的中国进行了深度聚焦。

在报告中，麦克安德鲁博士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中国市场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现象，例如付款拖欠、高流标率、中国买家的知识结构尚需提高等等。

麦克安德鲁博士认为，2013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总交易额虽增长缓慢，但仍以115亿欧元的成绩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下一个十年将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大于发达国家的阶段，如能尽快规范行业，中国必将成为全球艺术品市场最为耀眼的新兴力量。

毕加索版画展，你看懂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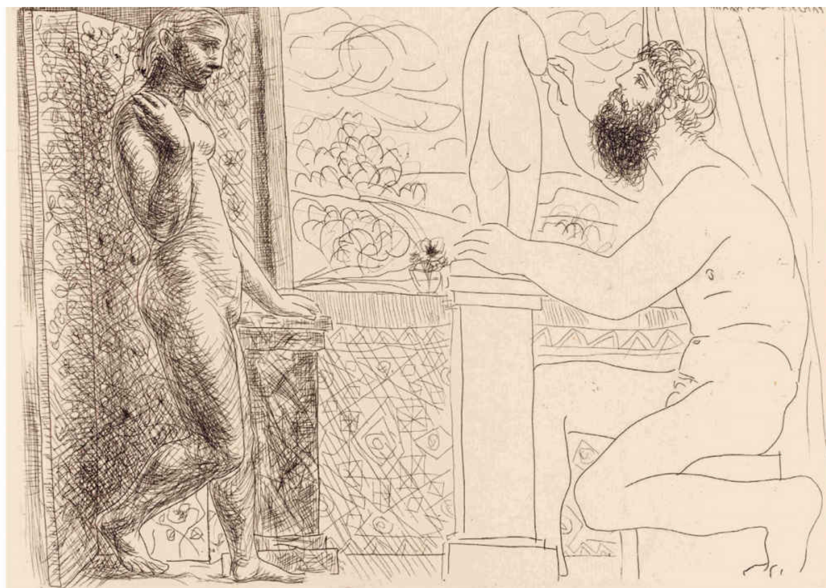
作 者:李崇寒



/《牧神发现一个女人》1936 年 铜版画 飞尘法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 年，布面油画



/《雕塑家和他的模特在窗前》1933年 铜版画 蚀刻法

“爸爸，这些画里怎么有那么多没穿衣服的人啊？”

“因为她们都是模特啊。”

“电视上的模特不是都穿得很漂亮吗？难道，模特也可以不穿衣服吗？”

“对呀，她们需要让画家来画自己。”

“可是，这些画看起来都好丑啊。”

“……”

2014年3月16日下午，中国国家博物馆南4展厅内，一个10岁的小女孩站在毕加索的版画前，同她爸爸的对话。很显然，这已不是第一次有人看不懂毕加索的画了，更何况此次展览主题为毕加索版画，而非众所周知的油画系列。

三年前，陈丹青做客“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面对“毕加索的画很经典，但却看不懂”的困境时提到，读不懂毕加索，是因为知识准备不足。对此，陈丹青建议，从非洲艺术、塞尚的艺术、新古典主义、安格尔的艺术与希腊艺术中去找寻毕加索的文脉，了解它们以后，再来看毕加索可能会情况不太一样。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

2014年2月28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西班牙国际合作发展署、西班牙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的“毕加索：沃拉尔系列版画展”在西大厅隆重开幕。展览共展出100幅毕加索版画珍品，包含毕加索创作完成的97幅作品，以及1937年增加的3幅沃拉尔的肖像版画。

这些作品均为毕加索于1930年9月至1937年3月间创作完成，以毕加索的朋友兼代理商安布鲁瓦茨·沃拉尔的名字命名，自1991年由西班牙官方信贷局基金会收藏，被誉为20世纪版画的巅峰之作。

业余爱好者画版画如“写小说”

在毕加索总计近37000 件的作品中，版画占了一半以上。一位钟情于毕加索的收藏家乔治·布洛克将其版画作品编了一份完整的目录，发现“他已发表的金属版画作品与淹没的作品相比，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当布洛克在毕加索的工作坊见到数不清数量的版画从未付梓时，内心既迷惘又沮丧。

为什么毕加索会有如此惊人数量的版画作品？对此，人们探讨过许多原因。汉斯·博林格的理由最为有趣：这种艺术给毕加索带来文字而非绘画才能提供的欢愉——既可叙述，又可说明及保存所有阶段“故事”的机会。

一来，毕加索可以让自己创造的人物出现在一个个场景里，以独特的方式“写小说”；二来，在版画制作的不同阶段，毕加索可以随时将其拓印下来，以检视自己“写小说”所经历的每一步，就跟看电影不

断回放之前的情节一样，确保思路的连贯性。

神奇的是，毕加索在版画制作方面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培训，纯属“业余爱好者”。19 岁时，他在第一幅蚀刻版画的顶部题上“左撇子”，随后又用颜料将其覆盖，无法辨认。据说，这种掩盖“罪证”的行为是因为，毕加索在印出后才明白，版画印在纸上与创作时是相反的。此后，毕加索不断进行尝试，迅速从一位门外汉跻身为20世纪最具创造性的版画匠。

1930年，49岁的毕加索在巴黎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他享用着第一部国王级座车西班牙苏伊莎（Hispano-Suiza），雇佣穿着制服的司机为他效劳。这一年，画商兼出版商沃拉尔找到他，以雷诺阿和塞尚的画为交换，请他为书籍创作插图。一想到自己的首次画展就是由沃拉尔一手操办的，毕加索热情地接受了建议。

很快，毕加索完成了两本书的插图，一本是巴尔扎克的《不为人知的杰作》，另一本是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著作《变形记》。

沃拉尔系列版画的正式制作始于1933年的春天，至 1937 年毕加索总共创作了 100 幅版画。巴黎印刷工罗格（Roger Lacouriere）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大部分版画的印、制任务。然而随着沃拉尔的不幸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这套版画的出版计划只好付诸东流。直到20世纪50年代，它才重新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

你降生在我心里 我从此获得新生

也许有人会问，毕加索19世纪30年代最伟大的作品是什么？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格尔尼卡系列。当然，也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这不，《卫报》记者、艺术评论员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就发文直称，毕加索19世纪30年代的杰作当属沃拉尔系列：“没有其他作品能像这套蚀刻版画一样显示出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即使毕加索的所有作品都消失了，只剩下这个系列的作品，他的天才也能单单凭此昭然

于世。他提出没有沃拉尔系列，就没有格尔尼卡。”

在“沃拉尔系列版画”的创作阶段，毕加索以一种神秘的讲述方式，挖掘了自己内心深层的矛盾和冲动，他以“画笔”直抵心中最幽暗的地方，渲染出由性和暴力构成的魔幻效果。

这些情思可按六个部分划分：各种主题、伦勃朗、爱之战、雕塑家的工作室、牛头人身怪和安布鲁瓦茨·沃拉尔肖像。丰富的主题、较长的创作时间跨度，是这一系列的重要特点。采用刻刀、蚀刻、飞尘和干刻等不同技法，使该系列版画妙趣横生。

奇怪的是，这些版画既没有文学来源，毕加索也没有给单幅作品加上名字，甚至大多数作品还没有签名。对此，有人分析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毕加索的版画受到了巴尔扎克小说《不为人知的杰作》的影响。

在巴尔扎克的故事里，画家弗朗霍费有一个持续多年的愿望：使他杰作中的女人获得生命。“十年来，我与她朝夕相伴，她属于我，属我独有，她爱我，不是吗？我每画一笔，她报以一次微笑。她有灵魂，一个我赋予她的灵魂。我画的不是画，是情，是爱……她诞生在我的画室，应该永远圣洁地生活在这里……”如同弗朗霍费创造他画布上的女人一样，毕加索在他的版画里创造了玛丽·泰雷兹。

在毕加索的一生中，他永远都不会忘记1927 年1月8日那个寒气逼人的下午。当他于加勒里拉法耶附近漫无目的地行走时，一位金发女郎——玛丽·泰雷兹的出现，照亮了他的整个星空。英国著名艺术史家约翰·伯格将此次邂逅列为毕加索生命中最重大的情爱事件。多年之后，毕加索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这一天的重要性：“今天是1944年7月13日，你的生日。17年前，也是这一天，你降生在我心里，我从此获得新生。”

当时的毕加索被古代壁画、宗教雕塑、古典主义的人体美深深吸

引。玛丽·泰雷兹浑身上下透露出希腊式的古典美恰好与毕加索脑海和画布上曾出现过的面庞如出一辙，他知道，他将会改变她的存在，而她也将带给他过去任何女人都比不上的创作灵感。

1930年，毕加索购买了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为他和玛丽筑起了爱巢。在这个新家兼工作室中，毕加索以超人的精力与欲望创作，“雕塑家的工作室”就是毕加索在1933年3月到5月之间完成的。

对毕加索而言，工作室不仅是一个宁静的避风港，容他享受喷涌而出的创作和恋爱激情，它也映射出毕加索这一阶段甜蜜的个人生活和创作上的丰产。在这46幅作品里，玛丽通常以裸体的形象出现，画面干净，风格平和，单纯线条的勾勒下，女孩曼妙的身姿呼之欲出。艺术家对情人的款款深情清晰可见。

但很快，安静平和的工作室变得黑暗神秘，狂乱复杂的感情充斥其中，线条中恣意燃烧着强烈的激情与诱惑。一个沉睡的女子赤裸地躺着，被一个裸体男人偷窥，这个男人酷似毕加索本人。无数个毕加索以各种分身的角色被安排进艺术家的“小说”里：有胡子的画家、有角的农牧神、粗鲁的米诺斯牛，他们有时在作画，有时在攻击美丽姑娘。欲望不停冲撞着现实，性爱的欲望、痛苦、幽闭恐惧症等等感觉，被艺术家以变形的方式，增强了效果。

牛头人身怪：有意识的黑暗力量

在沃拉尔系列版画中，温柔、忧郁又时而戏剧化的牛头人身怪（又译米诺斯牛）是另一宏大主题。它于1933年5月现身于这组形象日记中，被视为毕加索用来隐匿地展现其私生活的另一个自我。因为那些年里他和第一任妻子俄罗斯女舞蹈演员奥尔加·柯克洛娃的婚姻依旧在维系中。

当时，毕加索正接受一项委托任务，为新的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斯牛》提供一幅封面，他以此为契机创作了神牛的形象。在古代寓

言中，米诺斯牛是生活在地下迷宫里的吃人怪兽，它象征着躲藏在人们潜意识迷宫中的野兽。

在毕加索的一幅拼贴画中，米诺斯牛正夹着生殖器奔跑逃命，它巨大的脑袋与腿融为一体，无法区分。这一形象恰好是毕加索当年生活的写照。为了回避奥尔加，排遣自己的负罪感，毕加索从与玛丽疯狂的性关系中寻找解脱。

对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者来说，米诺斯牛代表着无意识的黑暗力量，但在毕加索看来，这股黑暗力量已经有意识地渗透进他的身体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它暗示着一种文明的批判，文明先是压制他，然后排斥他。但牛头怪不是悲哀的动物，它是国王，有它自己的权力，它在性爱上的胜利，甚至连端庄的美女都要垂涎。

最初，沃拉尔系列版画近乎质朴，蓄着胡子的雕塑家懒散地躺在床上，身边有年轻漂亮的女模特相陪，他专心致志地欣赏着周边的风景，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安宁。这时，米诺斯牛出现了，他暗送秋波，与雕刻家一起纵酒狂欢。他奸污了甜睡中的裸体模特，在斗牛中败北而死，然后又复生，钻进雕刻家的工作室更加无节制地酗酒、纵欲。

有人曾经问过玛丽·泰雷兹，对毕加索来说，快乐意味着什么时，她答道：“他先是像雷诺瓦所说的那样玩女人，然后工作，无论对我或其他人，总是如此。”

在牛头人身怪系列里，有一幅名为《一个小女孩在夜晚领着瞎眼牛头人身怪》的作品，描绘的是失明的米诺斯牛挣扎着在海滩上寻路时，一位手捧鸽子的小女孩小心翼翼地为其指点，女孩看上去酷似玛丽·泰雷兹，她是引领失明者毕加索的向导。米诺斯牛的身上，弥漫着绝望的哀伤。

如同何塞·玛莉亚·华兰斯指出的，这段失明期在1934年12月底或

1935年初终结，那时玛丽·泰雷兹怀孕了。女儿玛雅在次年9月出生，毕加索开始跟奥尔加办理离婚，失明的牛头人身怪从此再未出现在毕加索的作品中。

毕加索创作沃拉尔系列版画期间，法西斯主义蔓延，西班牙内战爆发，种种紧张情绪都能在版画中找到对照。所以当你看到整个系列最后一幅绘有失明牛头人身怪的版画时，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从最初阳光明媚的世外桃源里，跳入到另外一个不同情感的世界里。那里充满着灾难与伤痛的暗示，在暗无天日的宇宙里，你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这一切，都预示着通向《格尔尼卡》的创作道路。

因此，无论你能否看懂毕加索，这终将是一场精彩的展览。

江西古代文物精品展赣水流韵 辉耀千载

作 者:湘北



/ 青花釉里红堆塑楼阁式人物谷仓

公元675年，25岁的王勃南下探亲，路过南昌时，恰逢洪州都督

（洪州牧）阎公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不谙世事的他“好意”接下写序的包袱，朱笔一挥，文惊四座。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把赣水流韵描绘得有声有色。

当时唐人对江西的认识尚停留在汉代以前，江西是蛮荒之地，全然不知商王朝时，赣江流域即已存在过高度发达、璀璨夺目的上古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那是一个失落已久且神秘玄幻的青铜王国，作为商文化的一部分，它在黄河之外，同四川广汉三星堆一样，为殷墟文化过长江后的“又一春”。

两千多年后，满载着辉煌和希望，它越过长江、黄河，带着“天下瓷都”的精品、人杰地灵的美誉，宋明文韵的宝物踏春而来，只为在首都博物馆与你见上一面。在那里，你将看到来自江西省多家博物馆的160余件（组）精美文物。身临展厅，在以大洋洲商代青铜器、景德镇瓷器和八大山人朱耷书画为代表的部分国宝级珍品面前，你将感受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字字真义，那是赣鄱大地上最为重要的文化财富，它将先民的古老智慧与这片土地的灵魂永远地凝聚在了一起。

“一把雨伞”出来的青铜王国

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一带，流行着这样一种传说：不知哪朝哪代，有几个富商巨贾或达官显贵择土冢葬于此，墓冢中陪葬九缸十八瓮的财宝，每个封土堆犹如一把雨伞，后来只剩下“三把半伞”，随着长期的取土和垦殖，“三把半伞”已夷为平地。

1989年9月间，为了维修赣江大堤，大洋洲乡组织数千民工在程家大队周家村旁的涝背沙丘掘取沙土。不料这一挖，竟把传说中的“一把雨伞”找了出来。经辨别，这是一处大型商代遗存，埋藏着475件青铜器。

学者们对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归属各持己见。有人认为这是独立

于商王朝的“虎方”、“戈族”或“句吴”等部族的遗物，也有人认为这是商王朝为掌控青铜资源派贵族南征开疆拓土的佐证。不管定论如何，这些器物凭借其高超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向我们说明了江西曾经在青铜时代有过和中原文明并行发展、平分秋色的历史阶段。

此次摆在首都博物馆展厅最醒目位置的是有“甗（yǎn）王”之称的青铜重器——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它通高105厘米，重78.5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最大的连体青铜器，也是商代唯一的四足青铜甗。

甗是古代蒸煮容器，下部鬲用于煮水，上部甑用来放置食物。在这件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的双耳上，雌雄二鹿立于其间，它们回首瞭望，乖巧可爱。器身立兽是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地域特点，整器一次浑铸成型，说明当地在商代就已掌握高超的青铜范铸工艺。

在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中，虎的造型见得非常多，光是虎的形象，就出现了多达56个，可谓虎多成群，蔚为大观。“这说明当地不单是把虎作为一种象征，他们很有可能将虎作为一种民族图腾加以膜拜”，首都博物馆青铜器专家冯好介绍道，“比如这件伏鸟双尾青铜虎，你看它这种单提虎、并未和其他器型相结合的造型，在国内还没出现过类似的。它上面还有一只小鸟，隐隐约约有种以小扩大的意境。因此，它不可能只是一件简单的装饰品，应该是作为一种文化、或是宗教信仰的象征而存在。”

如果你以为酷似外星人的青铜面具只会出现在三星堆遗址里，那就大错特错了。展厅一角，一件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獠牙、圆目、阔鼻、尖耳、双角，这种青铜头像五官虽拟人，但拼凑在一起后，给人一种神秘诡异、威严慑人之感。有人认为，这种两面对称的头像可能是象征通行于人与神之间的巫师，顶上圆管、下部方銎，与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不谋而合。

天下瓷都：落霞与蛟龙齐飞

江西的陶瓷生产史，从上饶万年仙人洞出土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算起，已有两万多年的岁月。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后，景德镇逐步成为古代中国的制瓷中心。

1980年江西高安发现一个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釉里红瓷、卵白釉瓷、龙泉窑青瓷、钧窑瓷器239件，为全国出土元青花最多的地方。

“除了19件元青花外，江西高安还出土了4件釉里红残品。釉里红是元代创烧的一种工艺，它是用铜红釉来作为着色剂的一种瓷器，在釉下用铜红画好之后，再上一层透明釉，然后在高温下还原烧制而成。这种瓷器是非常不容易烧的，但烧出来的颜色很好看，可见其珍贵性。”首都博物馆瓷器专家裴亚静说道。

在“天下瓷都”的展览单元里，我们将看到元代釉里红瓷器之绝品——釉里红彩斑贴塑蟠螭龙纹的高足转杯，它的特色在于杯与杯把可自由转动，当杯身旋转时，杯内红色彩斑仿佛天边晚霞，映衬着杯身上的堆塑龙，似蛟龙在落霞中翻滚。好一派落霞与蛟龙齐飞！

而另一件让人叹为观止的瓷器当数青花釉里红堆塑楼阁式人物谷仓了。它为墓主人储存粮食之用，由上下两层和中间的活动式仓门组成，可拆卸，造型复杂，烧制难度极高。四周门廊上还有18个姿态各异的堆塑人物，活灵活现。为什么它能烧出这么好的东西呢？裴亚静认为，这是因为墓主人的父母是景德镇的官吏，所以他们有这个烧制的特权。

古代江西名人辈出，说其人杰地灵实不为过，因此展览的第三部分以人文荟萃为主，希望今人在先人遗留下来的清幽书画之中品味到那个时代清雅高洁的文士情趣。如果你想亲身感受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的话，那就移步来首都博物馆吧，展览从2月25日一直

持续到5月25日。

乌合之众何以可能

作 者:李舫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历史价值在于，他用影像的方式再次提出并回答了古斯塔夫·勒庞的问题：乌合之众究竟何以可能？

残垣断壁，残肢横陈。

废墟，暴雨，静夜。一只黑色的大狗穿越镜头，凌空而降。黑狗嘴里叼着一只皮开肉绽、筋骨毕露、全无血色的断手，一束光诡谲地照射在断手上无名指的戒指上，戒指反射着冷艳、哀恸的光芒。

这是俄罗斯电影《12怒汉：大审判》的一个镜头，硝烟未尽，平静中的惨烈令人不敢直视。战争粉碎了一切——国家、城市、婚姻、家庭、爱情、思想、生命，乃至灵魂。

我们还有灵魂吗？还需要灵魂的救赎和自救吗？真理真的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吗？多数人的民主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在《12怒汉：大审判》中，俄罗斯天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试图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尼基塔·米哈尔科夫1945年出生于莫斯科艺术世家，父母是诗人和作家。他的作品真诚、厚重、深沉，带着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原始和粗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爱情的奴隶》、《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欧布罗莫夫》、《五个夜晚》、《亲戚》、《没有证人》、《黑眼睛》、《西伯利亚理发师》、《愚蠢的肥兔子》……诞生于1994年和2010年的《毒太阳》和《毒太阳2》奠定了他在世界影坛的坚实地位，他甚至被誉为“俄国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12怒汉：大审判》翻拍自1957年的美国影片《12怒汉》，却几乎看不到改编的痕迹。后者讲述的是炎热的夏天涉嫌杀父的贫民窟

男孩，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聪明地将故事的情境放置于车臣战争的背景之下，使得影片更加生动、悲壮，对人性的开掘更加具有史诗的意味。演员出身的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善于经营影像，用出色的画面叙事传情。

这部完成于2007年的电影堪称俄罗斯当代电影的一部杰作，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成功地展示了顽强坚韧、锋芒毕露的俄罗斯文化性格。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车臣战争中，一个车臣男孩的双亲死于战争，他被一个俄罗斯军官收养。后来，养父母突然被人杀害，车臣男孩作为第一嫌疑人，被指控谋杀。为了证明事件的真伪，十二位来自不同职业、此前素不相识的人组成陪审团展开了讨论。他们每一个人的意见都有可能决定男孩的命运。提醒各位看官注意，为保证审判的诚实公正，这十二位审判员是随意抽取并组合在一起的。在这个类似于乌合之众的陪审团成立之初，每一个陪审员压根就没有想到要履行职责，他们不由自主地相信检察官的职业判断，他们急着想要完成的，就是将这一件走过场的审判赶紧结束。这一刻，车臣男孩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仅是一个被抽干、符号化的判断。

人证、物证、作案动机、杀人工具、行凶时间，一切线索似乎都很清晰，检察官举证车臣男孩，按照司法程序，陪审团投票认可，按照大多数原则，这个男孩就要受到极刑，毫无疑问，陪审团几乎不约而同地认定这个男孩有罪。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物理研究员站了出来，投了关键性的反对票。“对于一个生命，我们是否有权如此草率？”出于本能的疑惑，他提出最初的质疑，恰恰是这质疑唤醒了其他人内心沉睡的良知，将所有人拉入到集体责任之中。在随后的辩论过程中，十二位陪审员开始真正直面、认真分析这桩案件，一个个开始相信车臣男孩的无辜。这是一个冗长却并不乏味的过程，每个人都开始回忆自己的故事，然后从自己的故事中去努力体会别人的情感与现实，让人性与责任从沉睡

中唤醒。这是一场审判，十二位审判员在决定男孩命运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个故事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一个简单的故事外壳中装载重重叠叠的细琐生活和微小故事。最大的故事——陪审团辩论发生在一个临时体育场，大多数镜头都集中在这个并不宽敞的室内。由十二位陪审员的交流、冲突、劝解、对峙、妥协、争锋从而延宕出来的所有剧情、他们复杂的人生和人性，都是以室内对话为背景。镜头短暂的穿插和闪回仅仅限于几幅象征性的战争画面、男孩被杀的现场、男孩在监牢里跳舞的场景。无疑，这对导演功力是个考验，而这部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恰恰是导演以纯粹的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力量。在长达150分钟的电影里，十二位陪审员的性格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导演对每个人动作和表情的细致入微的设定堪称完美，紧张和张力贯穿始终。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努力表达的，是人性的沉沦，同时努力唤醒的，是人性的复苏。现代社会的疏离和隔膜，让每个人对彼此的命运漠不关心，恰如萨特所说“他人就是地狱”，冷漠、隔离、陌生有意无意地导致了人性的集体沦陷。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个十二位陪审员人性集体复苏的故事，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高潮恰在不期然间出现。不要忘记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还是位优秀的演员，在这部电影中，他饰演了陪审团主席。在电影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他将主席放在镜头的角落，甚至他的座位时常游离于镜头之外。就在十一位陪审员达成一致，认为车臣男孩无罪之时，他却站起来，以最有震慑力的理由历陈男孩何以有罪。剧情再次跌宕起伏，同时也将故事的深刻内涵向更深处开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这场惊心动魄的辩论背后更加惊心动魄的车臣战争，这是电影得以拓展的宏阔的背景。

车臣战争是指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及其下属的车臣共和国分

离分子之间爆发的两次战争。车臣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民族因素。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于1994年12月，1996年8月停火，车臣获得非正式的独立地位。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于1999年8月至2000年2月，俄罗斯控制了绝大部分车臣土地，获得胜利。

两次车臣战争的发动者是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与普京，宗旨都是为了维护俄罗斯的统一，防止车臣地区从俄罗斯版图上分裂出去，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普京的铁腕之下，车臣分裂势力得到了弹压，但车臣的恐怖活动依然频繁。两次战争导致数万名官兵伤亡，数十万无辜平民死亡，一时间，俄罗斯和车臣百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

在这种背景下，影片巧妙地暗示了法庭上由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判断失误，将民族矛盾纳入影片的体系中，无形中也提高了审判结果的高度。

我们不难理解陪审团主席所做的有罪陈述。他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车臣男孩是无辜的。但是必须得判他有罪，因为男孩的亲生父母在战争中已经死去，养父母也被人杀害。给了他自由，他却无处可以投奔，这无异于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监狱可以说是他在目前的境况下最安全的地方。陪审团应该先宣判其有罪，再去捕获真凶，只有这样才能给男孩真正的安全和真正的自由。

陪审团主席其实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命题：人性复苏的陪审团有没有责任和能力救助这个濒临绝境的男孩？陪审团陷入新一轮讨论。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一致认为，应判车臣男孩无罪，至于他日后的生活，应该由他自己去选择。

影片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法律是永恒，至高无上的，可如果仁慈高过法律呢？”故事的结尾同样开放大胆、充满正义：担任陪审团主席的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站了出来，决定去救助车臣男孩。但是，大

家想知道的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在良知沉睡的时刻、在每个人都难以自保的氛围中，陪审团主席如何以一己之力，救助生命？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也是留给世界的思考。

《12怒汉：大审判》提出了一个令人反思的问题：集体表达与乌合之众的伦理法则。这不仅让我想起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所着力描述的大众心理的产生与运行、充满变数的大众非理性的心理世界。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895年，被誉为大众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勒庞经验性地探讨了大众心理的产生与运行，有力地展示了大众非理性的充满变数的心理世界。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历史价值在于，他用影像的方式再次提出并回答了古斯塔夫·勒庞的问题：乌合之众究竟何以可能？

合作时代

作 者:李开周

“同志”、“革命”、“合作社”、“反封建”、“消除剥削”等等词语在历史上并不完全是红色政党的专利，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夕，国民党也一直在频繁使用

进入主题以前，首先让我们穿越一下，回到1938年。日军正在侵华，国人正在逃难，大江南北炮声隆隆，这些我们都不要管，我们要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福建南平。

南平有个南雅镇，南雅镇有个八仙乡，八仙乡有个合作新村。我们从南雅镇向南走，步行，不出十分钟，就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的名字就叫“合作新村”。

这个村庄刚建成不久，两排平房，一条街道，平房整齐，街道笔直，宛如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子西口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北边是一个大食堂。

时间是凌晨，操场上响起钟声，村子醒了，村民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沿着主街到达操场，升旗，唱革命歌曲，做广播体操。做完早操，天已经大亮，村民们又一窝蜂冲进食堂集体就餐。吃完饭，大家回家拿农具，然后在村长和劳动组长的带领下集体劳动。当他们劳动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会计同志拿着小本子给每个人记工分，据说到了收获季节，村干部会按照每个人的工分来分发粮食。

集体上操，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所有家庭生活在一个大集体当中，这样的场面不应该发生在1938年，而应该出现在1949年后。为什么这种生活早在1938年就已经出现？是我们穿越错了年代，还是当时福建南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让农民提前过上了集体

生活？都不是。那时候福建南平南雅镇八仙乡仍然是国民党的地盘，而在当地成立合作新村，将农民纳入集体生活，也正是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的一项政策。

我必须说明，“同志”、“革命”、“合作社”、“反封建”、“消除剥削”等等词语在历史上并不完全是红色政党的专利，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夕，国民党也一直在频繁使用。而把农民乃至更多的群体拉进集体生活，也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努力实践的一个方向。

在打倒旧军阀以前，蒋介石就强调要大办合作社，因为他相信“合作事业是我们推进民生政策的基本方针”。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要进行七大运动，其中一项运动就是“合作运动”。1934年，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通过了《合作社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又制定了《合作事业五年计划》。抗战前后，共产党在根据地成立了大大小小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国民党则在国统区成立了更多，当时村里有“保农合作社”，乡镇有“乡保合作社”，县城有“县合作联社”，城市社区有“消费合作社”，各大工厂有“职工合作社”，买不起房的居民则在国民党扶持下陆续成立了一批“住宅同志合作社”。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相信，多成立合作社这样的集体，可以增加财富、减少浪费、消除剥削、化解通胀，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遗憾的是，国统区的合作社大多失败了，特别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合作新村，由于分配不公和干部贪污，村民普遍产生惰性，他们就像建国后的生产队社员一样消极怠工、偷盗公物。还有各大城市里先后成立的那些住宅同志合作社，最后不是变成开发商偷逃税费的工具，就是沦落为小官僚私分救济金的手段。

住宅合作同志社简称住宅合作社，其宗旨本来是帮助社员齐心协力自建房，或者齐心协力跟开发商谈价，以此把居住成本降到最低，这种合作社本来在欧美等国发展得很好，可是一引入中国就水土不

服：一方面是民众素质低下，不擅长团结和共赢，只喜欢想方设法占别人的便宜，尤其那些开发商，居然为了少交税款而把公司注册成合作社；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太腐败，以住房合作社的名义把联合国支援给中国贫民建房的救济款截留私分。以抗战后成立的“杭州市住宅第一合作社”为例。该社共有社员100人，全是国家干部，“省政府秘书长雷某”、“省交通处处长杨某”、“省合作管理处处长唐某”、“市政府秘书长徐某”都参加了这个合作社。该社成立后，一不团购住房，二不团租住房，只是让杭州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国有土地50亩，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经济处申请了大笔救济款，凭着这些钱和地，顺利建成100套小别墅，然后人手一套分完。

政改主将袁世凯

作 者:雪珥

务实而不务虚，这正是袁世凯等体制内改革者所追求的务实。袁世凯本人就曾告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袁世凯是唯一一位跻身中央政改领导小组的地方官。在1906年9月2日发布的圣旨中，宣布立即进行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官制改革），作为“立宪之预备”，并在中央成立相应的机构，负责相应的顶层设计——即“官制编制”。参与“官制编制”的，除袁世凯外，均是中央机关的精英成员。袁世凯之外的其他封疆大吏，诸如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等，圣旨仅仅要求他们“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

这样的安排，除了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身在京畿，相对便利之外，更有高层对这位年轻总督在政改方面给予的绝大期望。在此前的讨论中，袁世凯在支持立宪政改的同时，提出了很多需要注意的“技术”细节。应该说，他的来自第一线的意见，对于改革方案能够避免浮躁、切合实际，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中央成立了官制改革的常务机构——“官制编制馆”，办公地点在恭王府朗润园，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总司馆务。孙宝琦是袁世凯的姻亲，杨思琦则是袁世凯的故交。“官制编制馆”之下，设立了“起草”、“评议”、“考定”、“审定”四课，40名工作人员，多为袁世凯亲信。因此，袁世凯实际上主导了这次官制改革的常务工作。

在宣布成立官制编制机构的前一天，中央正式发布了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宣示中外，将“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

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在这份宣告中，也明确指出：“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在大清国政改的顶层设计中，“积弊”重重的官僚机器，被当作第一障碍。官制改革，入手处是政府机构的调整，而着眼点则是政府职能的转换。从官制下手，推行政改，是戴鸿慈、端方等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后，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对于官制改革，基本思路体现在戴鸿慈、端方两人回国后提交给中央的报告《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在他们看来，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政权是人治还是法治的大问题。

对于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积弊及解决之道，他们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些，最终被以庆亲王为首、袁世凯为主的“官制编制馆”，在《厘定中央各衙官制缮单进呈折》中基本吸纳，最终针对中央机构改革提出了三条原则：“分权以定限、分职以专任、正名以核实”。官制编制馆提出，“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宜正名为军谘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拟正名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在这一方案中，实行内阁制、裁撤军机处，是重中之重。

1906年11月7日，中央正式公布了《内阁官制及办事章程》，基本认可了“官制编制馆”提交的方案。吊诡的是，中央虽然认可了责任内阁制，却并未同意取消军机处。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认为晚清搞的是“假立宪”，甚至也有不少人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赞同废除军机处，是因为他本人想当内阁总理。总之，无论是左的右的，都拒绝承认这场前无古人的政改探索的有益性，而其中很牵强的理由是因为政改将令袁世凯本人受益。

不过，当时的媒体对保留军机处还是给予了很大的理解："今乃仍设军机处，而罢设立内阁之议，得毋于预备立宪之道相背驰乎？虽然，是无妨也，有其名而无其实，何如求其实而异其名。"务实而不务虚，这正是袁世凯等体制内改革者所追求的务实。袁世凯本人就曾告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这种务实，推动了政改的有序推进，也招致了各种激进者及野心者对政改、对袁世凯本人的极大不满。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纪实（下）

作 者:刘统



/ 1938年左右，正值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冈村宁次（左）在东京的照片

中国军事法庭除了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外，还对与其相关的一些

案件进行了审理。

对日本侵华以前和侵华战争期间，以外交官和各种身份在中国从事特务间谍工作的日本人，国民政府都将其列入战犯。1946年9月，军统局长毛人凤致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敌伪期间在上海日领馆工作之清水及广州、香港两地领事户根，皆系负责之特工。闻仍在外务省照常任职，我方并未要求盟军逮捕。2、台湾人杨某抗战期间在厦门开设大新旅社，内设特务机关为敌工作。该犯已解福建高等法院，当为汉奸处置，应否将其改为战犯。”这些情况表明，国民政府对追查日本特务间谍罪行的工作，是重视和抓紧的。

因此，各地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都受到严厉惩处。广州军事法庭于1947年4月审判日本驻澳门特务机关长泽荣作。判决书称：“自（民国）三十年至日本投降止，该战犯利用在澳门之特殊势力，专事搜刮物资搜集情报，监视各国驻澳人员活动。并收买汉奸黄公杰组织密侦队，供给枪械，专事暗杀我方人员。”在泽荣作策划指挥下，先后将国民党驻澳门情报人员梁彦明、林卓夫，中山县侦缉队长黄仪，第七战区第三纵队情报主任李秉元、鲍家琪等杀害。据此，法庭宣判泽荣作及其下属山口久美宪兵少尉死刑。

审判外籍共犯

在抗战期间与日本人合作或共同犯罪的外国人如何处理，1945年12月4日战犯处理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外籍人士与日人勾结，危害中国及盟邦，构成战罪者，系属共犯，可依战争罪犯处理办法第14条处理之。”

1946年5月底，广州行辕将海斯等7名纳粹德国间谍引渡到上海，交美军法庭审理。德国陆军大尉海斯在华南主持谍报工作，直属上海阿尔哈尔的德国特务总机关。该谍报机关于1943年在广州设立，常窃听由重庆拍至外国之电报，中印军运无线电报，其工作至1944年

已达到最高峰，所得情报每十日向上海总机关通报一次，并与日军联络，刺探我方军情。该机关设立公司为掩护，勾结奸商套取物资。企图建立敌伪华南经济基础，破坏我战时经济体系。罪行查实后，这些德国间谍都受到应有的判决。

外籍间谍的线索，主要是美军提供的。1946年1月，美军葛雷中尉检举法国维希政府驻澳门领事西门及意大利女子贝安加谭有间谍嫌疑。广东高等法院将贝安加谭拘押审讯，“对其于战争期间，往来沪粤港等地，与日敌周旋，及与西门领事同居各经过，均做详细之研讯。”美女间谍上法庭，引起轰动。后因证据不足，广州行营将贝安加谭关押在拘留所一年多，最终没有判决。

日军侵华战争中，作为占领地的韩国和台湾有很多人被征召参军，与日军一起对中国军民犯下罪行。战后国民政府下令将这些人与日本战犯同样处理。1946年12月，武汉军事法庭公审韩国籍战犯李炳华。该犯系鸭泽部队翻译，1941年贺胜桥附近遭到破坏，李带队将附近居民13人拘捕，酷刑拷打、羁押月余。日军投降后，李途经贺胜桥，为当地民众扭送当地乡公所，再移送军事法庭起诉。被害人到庭作证，伤痕累累，李无法抵赖。12月28日武汉法庭宣判：李炳华对非军人施以酷刑，处有期徒刑12年。

1947年4月，广州军事法庭判处台籍战犯李安死刑。李安原系日军驻广东增城警备队翻译，1944年间因强买不遂，将平民陈光痛殴，致其重伤身死。又因勒索平民蔡森未遂，指其为游击队，指使日军将蔡残杀。军事法庭以勒索残杀罪指控李安。经法院审讯，蔡森之母出庭作证，法院判处李安死刑，于4月18日在广州执行枪决。

类似这样的案例，各地法院均有判决。在审判过程中，有人对台湾籍战犯与日军等同身份提出质疑。1947年5月13日，广州《中山日报》发表崔龙文的文章《战时台籍人犯不应作战犯论》，指出：“台湾人犯作为战犯论，实有不当。因敌人始称战犯，台湾人根本是我国

同胞，不是敌人。台湾人在战时若有为敌人做爪牙，倚其势力加害民众的行为，即应作汉奸论罪，不当作战犯论，其中界限不可不分清。”

在战争期间为日本侵华提供战略物资和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日本商界和产业界人士，也被军事法庭以战犯罪名审判。1947年2月武汉法庭审判一批为日军制造军用品的日本商人。藤冈规中，武藤幸定为三井、三菱洋行收集军粮；小本芙雄为日棉实业洋行收集棉花；本吉谷市太郎为日华麻业洋行收集麻类；赤座真龟太、岩本松本、矶田泰为儿玉机关、万和洋行、昭和通商收集钢铁；高山突、高冈光男为瀛华银行、吉田产业、三井洋行收集军用一切物资；由山定雄则经营中山制钢洋行，以所营铁工厂供给军用器具；伊藤静夫经营日东制粉公司专为日人制粉，以供军用。上列各犯被捕后，送武汉行辕军事法庭，以战争犯及侵占罪起诉。还有一些日本金融界人士，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汉口分行顾问上田龟次郎、远藤进均，扰乱中国金融，为汪伪发行储备券1481亿元。封锁汉口资金，不准人民自由汇兑，管制各商业银行无法营业，致使国民政府货币贬值。武汉军事法庭将二人各处有期徒刑12年。

另有意大利籍人巴达底尼，原系意大利海军驻沪指挥官。日军占领上海后，巴达底尼及其所属百余人转至日本人控制的江南造船厂，为日军生产军火。上海法庭于1947年2月8日，判处巴达底尼无期徒刑。

太原审判走过场

在肯定国民政府对日审判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指出：由于国内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内各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进展参差不齐，留下了许多遗憾，甚至是历史的错误。

例如东北行辕法庭的工作，始终没有真正展开。东北是日本侵略

时间最长，日军犯下的罪行数量很大的地方。对日审判开始后，战争调查委员会到东北搜集证据。1946年10月16日，战犯处理委员会东北督导组组长邹任之少将到上海，向各界揭露日军侵占东北十四年所犯罪行。他列举了几项重大事件：1934、1938年“东边道”大讨伐，1935年敦化地区大扫荡，日军残杀抗日武装和百姓数千人。还有日军制造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和万宝山惨案，都是震惊全国的屠杀国人事件。调查组还揭露了大连日本“关东州”警察局档案中对中国人的抓捕和酷刑，以及在东北经营贩毒等罪行。这些罪行，本应由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审理。但是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将几十万日本“关东军”战俘押往远东。1945年12月4日，战犯处理委员会请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请求引渡日本战犯，但苏联方面未予受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才将东北地区日本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195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的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太原第二战区的对日审判。在这里受审的日本战犯多数来自日军驻山西的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徕四郎中将在战争期间，对八路军作战很有经验。日军投降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策划将日军编入他的部队，以增强战斗力。

1945年8月31日阎锡山返回太原后，亲自拜会澄田徕四郎，劝说他们留下，作为雇佣军同共产党作战。两人密谈后，阎锡山还亲自去日军营地视察，演讲，允诺种种优厚待遇。澄田中将与部下密谋：回国可能被当做战犯审判，不如留在这里，起码生活上有着落。这些将领的密谋决定了士兵的命运。2600名日本官兵被改编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纳入第二战区（后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队编制。

在澄田和阎锡山策划下，第一军来了个假解散。部分遣返回国，留下来的宣布去修铁路。实际上日本军人并没有去修铁路，而是分配在国民党军中担任技术兵，如炮手、坦克手、机枪手、军械修理等。这些留用的日本军人，号称“蚂蚁部队”。

有这样的秘密交易，可以想见，太原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判决都变成了走过场。这些日本军人后来参与阎锡山部队与解放军的作战。1949年太原被解放军攻克，澄田徕四郎提前潜逃，残存的一千余人被俘，后来被解放军关押在河北永年的劳改农场和山西大同煤矿进行改造。1954年，新中国政府将大多数战俘遣返回国，少数战犯留下来，1956年受到公开审判。

国内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国民政府一直和美国保持一致。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后，为了将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最可靠的盟友，提出对日本的宽容政策，包括保留天皇，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放弃对日的战争索赔等。蒋介石配合美国政策，也提出对日本的宽容政策。因此，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在南京国防部召开会议，白崇禧主持会议并讲话："本会集议之目的，在决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我国战后对日政策。本'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故处理日本战犯，亦当秉承昭示。"根据白崇禧的定调，会议作出六项决议。由于上级要求限期结案，各法庭的审判不可能深入细致，出现了成批审判，匆忙结案的现象。到1947年下半年，北方因国共内战日趋激烈，审判日本战犯工作也受到影响，一些法庭只得草草收场。

最大败笔：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

国民政府对日审判的最后一幕，是对冈村宁次的审判。

冈村宁次，1884年生。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战史课参谋。1915年2月第一次来中国，赴青岛搜集资料。1924年到上海任日本领事馆武官，后被孙传芳聘为军事顾问。1932年8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关东军进攻热河等地，并代表日方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任日第11军司令官，指挥进攻武汉作战。1940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1941年7月任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1944年11月就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指挥除东北和台湾之外的全部侵华日军。

冈村宁次在华北是共产党、八路军最强劲的对手。1941年，冈村宁次调集数万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造成约270万平民的死亡。八路军丧失了一半根据地和人口，平原地带全部变成游击区。太行山深处的前方总部被日军特种部队突袭，参谋长左权牺牲。彭德怀1945年2月在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水平突然降低，敌特、K（国民党）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而落后的更加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

彭德怀还说：“冈村宁次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彭德怀对一个日军将领评价如此之高，是很罕见的。

日本投降后，冈村执行重庆国民政府的命令，指挥日本军队统一向国军投降，不向八路军投降，受到国民政府的欣赏和嘉许。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冈村充当了国民党的军事顾问。冈村被捕之后，延迟到1947年8月23日，才首次出庭受审。国民党高层酝酿为冈村开脱罪责，作无罪判决。为执行命令，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费尽心机，起草判决书。1949年1月26日下午，石美瑜庭长宣读判决书：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论知无罪，以期平允。”

对冈村的判决，是非常牵强的。特别是把冈村的定案，仅仅局限在他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这不足一年的时段内。那么冈村此前在关东军、华北派遣军的经历，为什么连提都不提？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国民政府从来没涉及日军在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犯下的战争罪行。特别是冈村指挥的华北大扫荡，其罪行是非常明显、证据确凿的，但法庭有意忽略不谈，表现出明显的袒护。这个判决书实际是为冈村提供的辩护书，其行文用词，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是站不住脚的。

冈村被判无罪，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1949年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南京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和1949年2月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将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斥之为“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这两个声明都是毛泽东撰写的，上海《申报》2月1日转载了中共1月28日声明全文。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发表中共的言论，是很罕见的。表明上海新闻界对国民党的判决敢怒不敢言，而

借中共声明表达自己的心声。

对冈村的无罪判决，是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最大的败笔，因此也抹杀了其他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成绩。中共中央的声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国民政府对日审判被否定，很少有人提及。国人几乎已经将它完全遗忘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并给予客观的评价。第一、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侵略者的正义审判。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从借鉴国际经验入手，结合本国具体情况，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从制订审判法规、组建军事法庭、搜集证据、对战犯的界定和罪行认定等方面，为后来的审判奠定了基础。在审判过程中，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协商，修订政策，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审判。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众多审判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第二，中国审判是对东京审判的重要配合。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为主要表现在中国境内，因此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构成了东京审判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国方面搜集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为东京审判裁定日本战犯犯有反人类罪、反和平罪提供了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同时，东京审判也引导了国内审判，使国内审判由最初的复仇审判转到对重大犯罪事件的审判，惩办了一批日军高级将领战犯，提高了审判的质量。在相互协调和引渡战犯等方面，中美双方的合作也是好的。

三、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对审判有很大的影响。在组织审判、搜集证据时，国民政府没有涉及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范围，致使日军的许多罪行没有被收录，造成很大的缺陷。由于国共战争，阎锡山需要日本军人的帮助，将大量日军官兵纳入自己的编

制，致使太原的对日审判流于形式。国民政府不顾事实，竟然宣判冈村宁次无罪，是完全违法的行为。因为这个错误的宣判，使共产党全面否定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审判。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历史的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红色政坛的黑色流星《王明年谱》寻找失意者的历史

作 者:李响



/ 1939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左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王明、刘少奇、邓发



/ 1937年12月，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合影

“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

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这是曾经的延安知识青年司马璐的回忆，被党史学者郭德宏收录在他最新出版的《王明年谱》中。那是1938年春天，王明34岁，刚刚结束在共产国际六年的工作回到中共大本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他时，把他比作“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他熟读马列经典，帅气聪明，口才卓越，浑身散发着苏联的金光，在“土八路”领导人中鹤立鸡群。郭德宏说：“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是政治权威，王明是理论权威，周恩来是美男子，这三个人在青年中是很受敬仰、很有魅力的人物。”

这也许和现在人们心中的王明形象有很大不同。王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但他的面孔，如同《王明年谱》的封面，只是黑暗迷雾中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1949年之后，甚至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他就从历史舞台消失了，曾红极一时，如流星般耀眼而迅速寂灭于时空深处。

失误和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学术研究盛年的郭德宏对王明产生兴趣。“中共党史上这么多犯过错误的人物，材料大部分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王明不同，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怎么犯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的谜团。”郭德宏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

幸运的是，当时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开放时光，学者几乎可以看到想看的一切档案。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很羡慕郭德宏等前辈学人，“只有极少数学者抓住了档案开放的黄金时间。”

档案馆把与王明有关的几乎全部材料都拿出来，交给郭德宏和他的合作者、《红旗》杂志编委周国全。“材料很多，非常不成系统，有的一大篇材料中只有关于王明的一句话。一个1942年就被打倒的

人，谁会给他保存系统档案。”郭德宏说。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说：“党史不仅是毛刘周朱这些开国者的历史，也是失意者的历史。梳理失意者的历史，才能看出党史的立体感和丰富性。失意者也同样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无论他们的失误还是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郭德宏在错综复杂、零零散散的材料中，一点点抽绎王明的人生脉络。1995年，他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和书刊，远东研究所还送给他一套俄文版的《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不知不觉，郭德宏在王明身上投入了二十多年时间。他的扎实态度使他获得王明家属的信任，王明儿子王丹之送给郭德宏一套《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是由王明妻子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以及王明的一些单篇回忆录。

72岁的郭德宏身体状况欠佳，长时间住院疗养，他说：“我活不了几年了。这么多档案资料，大部分只有我一个人看过，我垮了以后，别人可能就看不到了。我得抓紧在有生之年，把这些材料印出来，提供给需要的人去阅读和研究。”于是便有了这本88万字的《王明年谱》。

27岁的领导人

王明受到批判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布满负面评价，只有他的少年时代是“干净”的。他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老家人都说他早慧。在中学同学的印象中，王明很有语言天赋，白话文写作出色，勤于练习英语口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王明在武昌读书，他被推举为学生领袖。假期回老家时组织游行示威，被当局注意，扬言要抓他。王明的姨夫得到消息，连夜送来盘缠让他逃到武昌。到武昌不久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为了躲避追捕，他随姨夫改姓王。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屡次改名，王明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代替了他的本名。

王明1925年10月入党，几天后就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下旬和张闻天、王稼祥一道赴苏。一加入组织就被“公派留学”，政治生涯开端一帆风顺。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半年就能用俄语流利对话，对列宁主义理论如数家珍，中大校长米夫将王明视为天才，在众多留学生中对他格外器重。王稼祥在批判王明时说，王明一到苏联“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

米夫不仅是中山大学校长，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对王明的火箭式上升的确起了重大作用。王明1929年回国，带头批判李立三错误，“立三路线”是左的，而王明的批判比之更左。他的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都是在苏联形成的，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激进，他也亦步亦趋，比如提倡平分富农土地，加紧组织赤色工会，不承认自由贸易等。

1930年9月中共召开第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第二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主导了第六届四中全会。当时中共中央青黄不接，瞿秋白李立三都犯了错误，曾执行他们路线的人也被排斥，领导层需要换血，而王明等人作为新鲜出炉的理论精英，自然成为米夫和共产国际的首选，当初苏联吸纳他们去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共培养骨干。那一年王明27岁。郭德宏说：“看待历史人物时可以多一些理解，一个刚刚27岁的年轻人就当上了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他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难免的。现在的年轻人27岁时在干什么？”

王明最早提出纠左

“提到王明，我脑海第一个蹦出的概念就是‘两条路线’。”华东师

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一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发言《两条路线》，批判立三路线，开始掌握中共领导权；二是自王明时代开始，中共建构了一套叙述党史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两条路线’：即党史是一条正确路线和诸多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位，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左倾）、张国焘，然后又是王明（右倾）。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甚至延续到现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说，关于王明，她印象最深的说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郭德宏认为传统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王明路线“统治党内四年之久”，是从1931年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算起，至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由《王明年谱》列举的多方面史料，可以清晰看到，1931年2月的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增补为常委，10月在共产国际安排下赴苏联。“他在中央决策层只有半年，其中还有很长时间由于被悬赏抓捕东躲西藏，无法正常工作。”

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苏回国，王明在苏联整整六年。王明出国后，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在苏联期间，以当时的通信条件来说，他鞭长莫及，权限也不足以指挥国内事务。把1932年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错误冠名为“王明路线”，非常牵强。

由《王明年谱》整理的文献可以看出，王明本人从1933年思想就

开始转变了，他频繁写信、写文章，批评博古及临时中央的左的政策，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在苏区暂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等。郭德宏说："事实上，他是中央领导层中最早提出纠左的，当时国内的领导人都在执行博古政策。但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来信不予理睬。"这恰恰证明王明对国内事务的影响非常有限。

郭德宏强调，王明的转变是由于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王明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运用他的才智，忠诚地服从和宣传共产国际的政策。王海光说："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王明那一代革命青年，信奉的是'工人阶级无祖国'，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物质上、理论上都给予中共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共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所谓的"右倾错误"

1935年7至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参加会议后，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1935年6至7月间，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在巴黎《救国报》上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客观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联军。

这也许是王明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八一宣言"受到国内外广泛瞩目，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1937年11月，王明离开苏联，来到延安，衣锦还乡，意气风发。很多人认为，王明回延安是共产国际专门派来向毛泽东夺权的，

当时毛泽东刚在延安巩固了领导权，他的独立自主态度也令共产国际不爽。从《王明年谱》可以看到，在苏联的六年中，王明多次提出回国参加抗战，因为国共关系紧张无法实现，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才得以安全入境。王明并不是“赶在”这时回国，而是条件刚好在这时成熟。至于回国后他要起的作用，共产国际的说法主要是帮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还有一种说法是让王明在理论上“帮助”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包括王明本人看来，毛泽东在军事和政治上很有能力，但是理论薄弱。

到延安不足一个月，王明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批评“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郭德宏在《王明年谱》中引述了张国焘的回忆：“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实际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王明有没有想过要“斗过”毛泽东，是值得商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发言为他的“右倾错误”埋下伏笔。他提出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后来被指为右倾投降主义。王海光说，王明提出的三个“一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有约束，建立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中共作为弱小的一方，强调我们是合作不是投降。”跳出中共党史范畴，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对抗日大局颇有功劳。

1937年底，为了便于推进与国民党的抗日合作，王明、周恩来等人赴武汉成立长江局，直至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王明一直在武汉主持统一战线工作。王海光说，在

抗战初期，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为维护抗战大局做出相当大贡献，但是后来批判他时也就墙倒众人推了。

王明的这段经历，曾经被指为“把持长江局与中央分庭抗礼”。有几大标志性事件证明王明“对抗”延安。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延安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立即重新起草一份，王明在国民党会议结束后才把新电文送达。郭德宏说：“王明在共产国际‘太上皇’当惯了，以前他想发什么文章发什么。在长江局时，90%以上的文章都请示过延安，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请示，但延安无法接受。”

还有一件事是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

郭德宏在《王明年谱》中呈现了学者郭国祥、丁俊萍的解析：1938年7月，正是武汉会战关键时刻，社会上需要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论持久战》指出的抗战前期失败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不合时宜。8月下旬，当武汉失守已成定局，王明马上就为《论持久战》出了单行本，并在8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37次广告，将它誉为“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

毛泽东直到1958年成都会议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在陈伯达发言时，他几次插话批判王明：“他从国际回来……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办了一个报纸，叫‘党报’，叫‘新华日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因为我的一篇文章他不登，说太长……出个小册子解决……我

是要出卖我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汉推销我这个货物的，但是那个地方他不卖，你有什么法子？”

医疗事故引发的中毒悬案

王明大概是党史上唯一一个两次为错误路线“冠名”的人物，一次是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一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清算批判两次“王明路线”，构成了延安整风的重要导火索。需要整肃的不仅是王明路线，还有延安崇尚苏联、洋理论、“言必称希腊”的风气。

1941年5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邓力群回忆：“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邓力群和绝大部分听众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批评在内。”

整风的矛头很快明确指向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作为“左倾路线”继承者和发展者的博古、张闻天都在延安做了彻底检讨，而“创始者”王明始终不肯“老老实实认错”，无论毛泽东私下找他谈多少次，大会上多少人向他“开炮”，他仍然“推卸责任”。至于右倾错误，韩钢认为，很可能是为了批判王明建构起来的。“中共历史政争与权争交织不清。”

1944年，整风运动已经接近收尾。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与王明谈话，再次系统指出他应该反省些什么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不能理解这些错误，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

人（指三十年代初苏维埃时期）……关于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不管王明认错与否，党内已经对他两次路线错误做出结论。1944年7月16日，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写道：“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

在延安整风期间，王明遭遇汞中毒，1948年6月因护士拿错药再次中毒。两次中毒使王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长期卧床。他至去世仍然坚信，是毛泽东指使人下毒害他。之前许多学者认为，中毒是王明捏造出来诬蔑毛泽东的。郭德宏综合1943年延安医生写的医疗总结，和最新的研究考证成果，证实王明确实中过两次毒，但都是医疗事故造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师徐进说：“王明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了，毛泽东怎么可能用这种手段害他？”

至死不认错

1948年底，王明出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与谢觉哉等开始为新中国立法工作做筹备。从这时至1950年参与起草《婚姻法》，王明充当了“立法大臣”的角色。有人说婚姻法是他一人口述秘书记录的，还有人说婚姻法根本不是他起草的。韩钢说：“关于王明参与立法的材料，披露太少，史料少，也就无法对王明的作用做出评判。王明研究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出版、发掘和整理史料。”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胜利。王明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肯定毛泽东的报告，但这个发言与会者都不满意，因为他没有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王明又做了一次检讨发言，据杨尚昆回忆：“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

但因为王明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很多同志纷纷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点仍难收场，只好延长一天。”

二中全会最后决定让王明写书面检查，他不肯写。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再次提出要王明写检查，王明称病不写。1955年，毛泽东又一次提醒王明写检查。王明说自己得了严重胆结石，希望手术后再补课。这期间他的肝胆炎确实恶化，几次住院。

王明深知书面检查一旦写了就是铁板罪证永不翻身。早年的同学同事常说，王明是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的。他斗争过瞿秋白李立三，两次迫使瞿秋白写书面检查，现在他体验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管他的“错误”已经过去十余年，检讨之路远未终止。

1956年初，王明似乎决定结束这一切。他去苏联治病，从此一去不返。晚年他写了大量攻击毛泽东的诗词、文章和回忆录，临终时写完《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在苏联出版。1981年作为内部读物引进大陆，改名《中共五十年》。这本书有大量不实之处，但郭德宏还是在《王明年谱》中屡屡引用，也许是为了给王明一个“自辩”的机会。

郭德宏说，很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愿意出版一部这么厚的著作。他自称年谱不同于传记，没有什么可读性。其实稍微翻阅一下《王明年谱》，就能体会到这本书与一般的年谱有很大不同，用韩钢的话说，这是一本“带有学术回顾性质的年谱”。郭德宏不仅详细梳理了王明的生平活动、思想理论，也把20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回忆录都融合其中，引用书籍250多本、报刊70多种。众多学者及当事人的说法和评论，往往有很大不同，甚至完全对立，郭德宏一一呈现这些观点，但不做出评判分析，把空间留给读者，这赋予这本看似枯燥的年谱以极大的“可读性”，使一些有“定论”的问题又有了探讨空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说：“王明身上有很多油彩，《王明年谱》可以帮助我们剥去油彩了解更真实的王明。”这也是郭德宏编著此书的初衷。然而，读者恐怕不会很容易有拨云见日的感觉。王稼祥、师哲、杨尚昆、沈泽民等中共元老对王明的回忆中，不时可见“阴险，傲慢，顽固，独断专横，野心，丑恶灵魂，居心不良”等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断语。黄道炫说，王明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中共党史叙述有这样一个倾向，当一个人倒霉之后，所有错误都会指向他，所有责任都归结于他。后来人在研究和阅读时会发现，一切材料、论述都指向既定的结论，越看越板上钉钉。”如果不去除成王败寇的思维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反而会加深误解。黄道炫承认，“这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要求比较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开玩笑地说：“可惜的是王明没有留下日记，他的心路历程我们无从知晓。”

1974年3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他是客死异乡，也可以说是魂归精神故里。他在苏联学习和成长，确立一生信仰，他在这里得到的赏识和认同，比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多。

王明埋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公墓中长眠着俄罗斯和苏联的著名人士，包括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乌兰诺娃、米高扬、赫鲁晓夫……王明和他的妻子、女儿，是这里仅有的中国人。